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 10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第31卷 第10期 (总第161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军 尹坚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李洪天

张广才 张勤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本刊特稿】

论全球化中的焦虑及其解除之道

——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张康之(1)

【核心价值观研究】

论“和谐”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李安林(9)

“四个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引领…………… 张琴芬(1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王静波(18)

关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李东晓(22)

【经济研究】

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组织总部的双向选择动因…………… 王锐兰 茅磊江 王恬(28)

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制度探析

——基于法制保障视角…………… 赵艳(33)

建国初期“斯大林模式”下我国工业化战略问题的思考…………… 时攀(37)

【历史研究】

梁启超新民史观及其对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启示…………… 崔恒秀 韦茜(41)

1927—1937年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状况初探…………… 吴琼(45)

南京大屠杀前后《东京朝日新闻》的宣传策略探析…………… 赵佳鹏 刘继忠(49)

【文艺评论】

论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的系统功能作用…………… 张利群(54)

重识、重建与重塑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危机、抉择与担当…………… 许诺(59)

于深渊看见天上: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 陈舒劼(63)

追求尊儒与宗道的协调

——缪播《论语》注的学术影响 蒋鸿青(69)

【外国文学研究】

英雄心灵的成长

——《年轻小伙布朗》与《阿拉比》比较研究 叶青(73)

《郊区佛爷》主题意义的认知诗学视角解读 陈俊(78)

李翊云小说中异化与归化的语言策略 李冰(81)

19 世纪与 20 世纪女性书写中女性欲望与女性多重身份构建对比

——以《呼啸山庄》与《BJ 单身日记》为例 黄思(87)

城市中的荒岛求生

——《摩尔·弗兰德斯》的荒岛小说特征分析 胡汶涛(91)

【美术研究】

绿色绘画

——再论玄色体系绘画 熊炜(95)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发展分期 刘凯(98)

复述与创新

——明清绘画品评中的崇古标准及价值 高阳(104)

【编辑学研究】

浅谈教育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几种关键意识

——以《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为例 颜莹(108)

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 2005—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的计量分析

..... 沈秀 赵青 李娟(112)

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四维度分析 章诚(118)

2015 年总目录 (121)

Main Contents

The Problem of Anxiety and Solutions in Globalization

——Comment on *Society Under Siege* by Zygmunt Bauman ZHANG Kang-zhi(1)

Approaches to Implement the Values of “Harmony” LI An-lin(9)

Reflection o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f Stalin Model in the Early China SHI Pan(37)

Systematic Functions of Assessment System in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Li-qun(54)

Re-understanding, Rebuilding and Remodeling

——On the Crisis,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 XU Nuo(59)

To See the Sky from the Abyss: On the Narrative of “Unmentionable Disease” in the Novels by Lu Min

..... CHEN Shu-jie(63)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in *The Buddha of Suburb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 CHEN Jun(78)

Language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Li Yiyun’s Novels LI Bing(8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Desire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in the Female Writings between the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Wuthering Heights* and *Bridget Jones’s Diary* HUANG Si(87)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in the City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ert Island Stories in Moll Flanders* HU Wen-tao(91)

Ecological Painting

——On Black Color Painting System XIONG Wei(95)

The Periodization of Palace Painting Activities of Yuan Dynasty LIU Kai(98)

Repet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Worship of Ancient Criteria and Value of Painting Appreci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GAO Yang(104)

论全球化中的焦虑及其解除之道^{*}

——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受到了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冲击,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改革中,是包含着解除焦虑的内容的,但是,由于人们囿于工业社会的思路去开展社会建构,不仅未能开拓出创造幸福生活的道路,反而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陷入更为紧张的状态,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其实,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人走出家庭而进入社会后,就陷入了焦虑不断增强的过程之中,由于社会与家庭的分离又使人能够在家庭中医治社会活动中生成的焦虑。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家庭的衰落却意味着医治人的社会焦虑的场所逐步走向消失的方向。现在,关于焦虑问题的解除将不是在家元共同体以及家庭的重建中去谋求出路,而是需要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中去消除焦虑。事实上,由于对差异的承认以及在流动性的条件下开展行动,将使焦虑无从产生。

[关键词] 全球化; 后工业化; 文化; 焦虑; 合作行动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01-08

一、全球化中的焦虑与幸福追求

历史进步就是这样无情,当它迈开脚步时,那些伟大的社会发明就会逐渐变得黯然失色。鲍曼认为,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受到冲击的时代,人们深深地陷入了某种焦虑之中,“自主游戏被逐出公共舞台之后,它把家庭生活变成了它的另一个战场。受到紧密监视的邻里关系也是这样,人们希望主宰‘排除游戏’,而不是成为它不幸的目标。工作场所也是这样,它们很容易地从团结与协作的庇护所变成了残酷的竞争场所。”^{[1](P.57)} 所有这些,反映到人这里,或者说给人带来的,就是严重的焦虑不安。应当说人们也发起了向焦虑的斗争,但是,“解决由不确定性和无助产生的焦虑的备用手段,加深和强化了它们想抵制或消除的焦虑,而非减缓了这种焦虑。它们通常损坏或撕破了相互承诺的纽带,而这种纽带

是协同行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它,焦虑的真正根源既不可能被找到,也不可能被改变。”^{[1](P.57)}

这的确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学者们对这一现实的产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比如,关于幸福指数的提出就包含着解决这类问题的努力。然而,正如鲍曼所说的,“它们根本没有触及痛苦的真正原因”,“它们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大量深层的焦虑都无法回避真实的原因,都在迫切地寻求其他的出路。”^{[1](P.57)} 实际上,深深困扰着人们的焦虑是来自社会转型的,是因为旧的生活模式已经变得不可依靠了,而新的生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是因为作为人的心灵依托的文化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可以托付,文化的冲突和碰撞让人无所适从;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以领导我们的名义而对我们进行支配和控制的权威显得失力了,而我们在没人领导的情况下又不知

^{*}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项目编号:12XNL003)。

[收稿日期] 2015-08-20

[作者简介] 张康之,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道如何开展行动。所以,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那个曾经无比充实的世界现在变得空旷,那个曾经让我们闭上眼睛也知道每一个物件摆放在什么地方的世界变得瞬息万变,那个起先通过占卜后来通过定量分析就能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现在变得捉摸不定……总之,我们变得越来越手足无措,陷入了心灵焦虑之中。

诚如鲍曼所说,曾几何时“普遍幸福的诺言,以及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幸福的诺言,使现代国家参与了某种社会协定。国家答应交付货物,公民期待接受它们。作为利益交换,公民答应忠诚于国家;作为对自身服务的交换,国家期望公民遵守它的命令。对幸福和更多幸福的期待,不仅逐渐变成了社会整合主要的合法方案,也逐渐变成了任何个体参与协作行为和共同事业的首要动因。而且,国家有能力证明,这种参与是值得的——它是划算的。”^{[1](pp.125-126)}的确如此,自从近代早期搭建起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后,这样一条追求幸福的道路就被开拓了出来。如果说在前近代的社会中人们把幸福的期望寄托于家庭或信仰,那么,随着现代国家的生成,人们则把这种期望寄托于国家了,而且国家也向它的公民作出了这种承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现获得幸福的路径,“那时,工业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手段。据希望,它能够结束匮乏、饥饿、痛苦和贫困。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轻松和更安全。它总是想实现这个目标,但至今也‘尚未实现’……既然人类的独立和自力更生已经被宣布,它的自足已经被假设,那么,人类的命运总是存在于未来……一旦被流放到了未来,它注定是永远停留在那里,幸福注定依旧是一个假设和一个期待:它的实现总是离现实有一定距离的那个诺言。事实上,恰恰是幸福的这个位置,敏锐地解释了‘前’与‘后’的现代区别,导致了对‘所谓的’合法事物的责难和怨恨,导致了对‘未来’事物的兴趣。”^{[1](p.126)}

应当承认,这种永远指向未来的幸福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避免了安于现状的懒惰。但是,就这种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来看,又是社会治理者的梦魇,使社会治理者总是承载着沉重的期望之压力,不断地遭受因幸福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而引发的埋怨。根据鲍曼的看法,“只要‘幸福’和长期未被定义的‘未来’纠缠在一起,不确定性(急剧的不确定性,无法改变

的急剧的不确定性),就成了徘徊在社会中的最可怕的幽灵——如果这种社会凭借幸福权而被凝聚在一起,如果它围绕着对这种权利的追求被组织起来,如果其成员的忠诚取决于它答应的进步的实现。这使得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有时令人不安的、通常令人痛心的任务。它导致了永恒的风险。它涉及了抵押未来,承担了大量责任,并面临着为这种责任付出沉重代价的前景。”^{[1](p.127)}如果说在集权国家中描述一个美好前景是出于渡过某种暂时危机的需要,一旦风息浪歇,也就可以面对曾经许下的诺言而一笑置之,那么,在民主国家中,诺言无法兑现则被转换成了合法性流失的话题,除了在选票经营上需要调整策略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

我们看到,20世纪60、70年代,当费瑟斯通、鲍德里亚等人提出了“消费文化”、“消费社会”等概念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们准确地揭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特征,从而让人豁然开朗。此后,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持续升温。这说明通过社会建构去开拓追求幸福的道路已经成了一条断头路,而是需要在自我的消费中去体验幸福。所以,使社会获得了消费文化的特征,有了费瑟斯通和鲍德里亚等人所描述的消费社会。鲍曼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传统心理学把‘需要’界定为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一旦需要得以满足,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最终消失。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恰恰相反,它即使在得以满足之后也不会消失——如果有可能的话,它将变得更加强烈。”^{[1](p.173)}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和途径,在这里,消费就是目标。“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认同的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尽管欲望是一系列连续而短命的物质对象,它是‘自恋的’:它把自身视为首要的目标;由于这个原因,它注定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不管其他的目标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最重要的‘生存’,不是消费者身体或社会认同的生存,而是欲望本身的

生存:恰恰是欲望——消费消费的欲望——造就了消费者。”^{[1](P.173)}消费着的就是幸福的,不再是出于某个目的而消费,而消费过程就是目的,消费证明了人的存在,消费也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意义。然而,在每一个人都把他人作为消费对象对待的时候,却发现世界变得那样的复杂,消费对象变得那样的捉摸不定,在对符号的消费和对他人的消费中所实现的瞬间满足还未来得及回味就已经消失,然后陷入空寂的惆怅之中。更何况消费本身并不是为了使需要得到满足,而是为了制造需要,在无尽的需要中所形成的是欲望的层层叠加和无限增长,人们成了欲望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收获幸福呢?

鲍曼形象地用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描述了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认为他(它)们间的联系与共在表现出了一种“轻轻地来匆匆地去”,“它们仅仅是不能、也不会被完全拥有的商品的样品。抽样活动从随机抽样中赢得而不是损失了利益。”^{[1](P.25)}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占有为目的的全部社会活动都丧失了发生的基础,人们是因为无法占有而陷入失落和变得焦虑不安。更为重要的是,“有效行动,特别是集体的有效行动,尤其是长期有效的集体行动的机构正在消失,而且,人们也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式来复兴或重新培育它们。”^{[1](P.58)}不过,鲍曼认为这并不是坏事,他说,“集体行动的消失并不值得悲伤,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它同个体福利和幸福的增加毫无关系,甚至还会成为增加个体福利和幸福的障碍。”^{[1](P.58)}但是,我们也看到,毕竟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塑造这种集体行动模式,一直在强化集体行动的领导机构,一旦由近代以来数百年努力所建立起来的这些领导机构陷入了功能失灵的状态,对人们心灵的撞击必然是沉重的,难以避免让人们陷入担忧和焦虑之中。事实上,这是因为传统平衡的打破而引发的极度不适应。对此,鲍曼所持的是一种乐观态度,认为现代性的集体行动模式被打破将是新的行动模式建立起来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像鲍曼一样乐观,将这些社会异动看作是重建的机遇,并切实地启动社会重建的步伐,那么,解除焦虑和谋求幸福的道路就不再是近代以来所走出的这条道路,焦虑与幸福之间的矛盾和悖论都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显而易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以及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切既有的社

会建构都不再能够满足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的要求,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运动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对既定制度框架进行修补的方案,但是,引发人们焦虑的紧张状态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实,综观世界各国的改革,其中深蕴着一种承继于工业社会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受到这些思维、行为和习惯性的支配,总是囿于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去努力对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为制度的完善就是一切社会生活平衡的基础。可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优先完善制度然后采取行动的方式不再适用。认识到了这一原因,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着不同于20世纪以来的行动方案,而是去致力于社会重建,即把重心放在行动上来,确立起行动优先的原则,让制度不再成为行动的先验性框架,而是成为从属于行动和支持行动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应当被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方面的考虑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行动就是政治以及生活的全部内容,唯有行动,能够解决人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唯有行动,能够使人们走出一切困境;也唯有行动,能够解除焦虑和开拓出幸福生活的空间。

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古代也曾有过文明的多样性,如中国、东南亚、印度以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秘鲁的印加文明等,其中,欧洲文明也算作是独立成类的后起之秀。但是,这只是在现代性的视角中所作出的解读,实际上,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封闭性的地域中独立成长起来的,由于它们并不相交,因而并不适用于使用“多样性”和“多元化”等概念来描述。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是在人们打破了地域界限并共处于同一共同体条件下的社会现实,在古代社会是不曾有过了。也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我们是无法将其与古代那种互不相交的各地域性文化进行比较的。严格说来,在古代的每一个封闭地域中,只有一种文明和文化,没有所谓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文明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作为需要关注和值得研究的问题恰恰是滥觞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而在20世纪后期开始全球化运

动中,对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问题的探讨甚至出现了热潮,吸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学者,这是因为,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表现出了激烈的冲突,而且也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和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引发了更多的焦虑,以至于必须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问题有一些的确是源于古代传统的,是在地域界限被打破后由不同的人群带入到一个交融互动的社会中的。正是这些源于古代的文明和文化交会并碰撞后,产生了所谓文明冲突的问题。人们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学者们为了迎合听众、读者,也往往对此作出了添油加醋的夸大描述。的确,这些文明冲突对于现实的政治过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认为它们是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概念中的最基本内涵,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最为深刻的现实是,不断生发出来的文化以及文明因素促进了文明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新的族群不断涌现,每一个新的族群都用自己的主张、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去推动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化,而且,这是发生在同一社会同一共同体之中的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化过程,也一直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并始终指向未来的过程。也正是因为文化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形塑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才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古代社会也可以称为农业社会,一般说来,都会在地域范围内生成一种家元共同体。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地域边界被突破,人的流动导致了家元共同体的瓦解,代之而兴的是族阈共同体。族阈共同体与家元共同体的区别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或边界是否清晰,而主要是在共同体构成要素上完全不同。家元共同体是无法还原为个人的,或者说,家元共同体之中并无个人。尽管作为自然的个体也确定无疑地存在于家元共同体之中,现代学者也往往误以为他们是家元共同体的载体,实际情况则是,作为自然的个体并不具有社会功能,或者说,家元共同体中尚未生成社会化的个人。在家元共同体中,家就是基本的单元,共同体无非是家的扩大和延伸,因而具有家的属性和特征。就家的成员溶化在家之中而

言,实际上也融合为了家元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然个体的人也会产生焦虑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而共同体恰恰是治愈所有这些心理问题的基本途径,而且共同体也极力通过贴近自然的方式和确立自然神圣性的观念去解决个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甚至会让人们树立起一种只要融入自然就能实现永恒的观念。这一点也是几乎所有古代文明及其文化共有的价值。

族阈共同体中虽然也处处存在着家,但是,由于家已经演变成生活场所而不再承担生产职能,从而把人们从家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而成为社会化的个人。人在社会中开展活动时,不再带着家的印记,而是以个人的面目出现,以独立的社会性个体的形式参与到交往和互动之中,并谋求组织化的方式开展社会活动。或者说,从家中解放出来的人是社会化的个人,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却以社会性的个人形式出现,他们处在社会之中却保留了个人的个体性,而且,他们时时把个人放在极其突出的位置上,甚至要求社会从属于个人。同时,他们又把自己自然的方面安放在家中,在他从家中走出时,以社会化个人的形式出现,而他的自然属性和自然需求还是要在家中实现。所以,族阈共同体中包含着家,但家与共同体之间并不具有同质性,并不是家成为族阈共同体的构成要素,而是既存在于家又走出了家的个人成了族阈共同体的构成要素。这样一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在人穿行于家与社会之间时交替出现在人身上的,人的自然需求的满足可能需要得到来自于社会的某些资源的支持,但这些资源只有在转化成为家的要素时才能够使人的自然需求得到满足。同样,人有着社会化的要求,在家中也可能宣示或主张自己的社会观念,但是,如果不走出家的话,他的社会观念并不能转化为社会行为。家不仅不是社会活动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的。当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性的行为也会出现在家里,但那必然是对家的破坏,一旦把家变成社会活动的场所,也就改变了家的性质,使家不再成为心灵的港湾,而是成了你争我斗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是家与社会的分离,使人有了社会性的焦虑等心理问题,或者说,社会成了人的各种各样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而家则成了治愈这些心理问题的休养生息地。可以认为,族阈共同体并不是完整的人的共同体,而是由社会化的个人所

构成的共同体,当人实现了社会化的时候,其自然方面则被剔除了。所以,族闾共同体中的人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人,是人的异化形态,人只要置身于社会之中,就必然会感到焦虑不安。

族闾共同体是从属于分析的视角的,所以,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在对族闾共同体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政治生活领域。如果说经济生活因其功利性而显得较为单纯的话,那么,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更高的社会性则使这个领域中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复杂。首先,政治生活被认为是开放性的生活,它要求把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到政治生活过程中来;其次,在政治生活受到了精英把持的时候,被纳入到政治生活中来的所有人都只不过是精英加以利用的工具;第三,政治生活要求把全体社会成员整合成一个有机性的共同体,而政治生活得以开展的方式则是竞争性的,既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前提又不断地强化人的自我意识,要求把人在家中所获得的一切因素都完全剔除掉,从而成为纯粹社会性的存在物。就此而言,所谓政治生活完全是非生活性的,或者说是完全反生活的。虽然学者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解析出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实际上,离开了家,也就没有生活,总体而言,“社会生活”的词语本身就是对社会活动及其生态的一种误读,它的准确含义应当是指社会化的个人在族闾共同体中生存和开展活动的状态,所谓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都无非是这种理解的延伸或殊相。

正是因为政治不具有生活的内容,学者们才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构想一种“生活政治”,希望通过政治的改造而使之像生活场所一样而适应于人的完整性的保存。但是,这个政治改造方案是不成功的,因为它并不是在对个体性的人作出反思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一项设计方案,而是把个体性的人作为一个无需怀疑的前提接受了。所以,“生活政治自始至终都被封闭在个体性的框架之内:个体的身躯充满了‘内在自我’,充满了要求得到并同意给予的个体认同,充满了个体通常拥有‘更多的’、避免他人干扰的‘空间’。”^{[1](P.159)}结果,个人的孤独感与社会活动的群体性无时不处在冲突之中,并不断加剧社会性个体的焦虑感。同时,家却在此进程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的功能上都日益式微,以至于人们在社会中所产生的焦

虑已经无法再到家中去加以排解了。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了新的变化,虽然家庭的衰落已经无法恢复,但社会却有可能成为解除焦虑的场所。

我们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把我们领进一个全面而充分开放的社会,逐渐剥除掉了原先那层紧紧地包裹着个体的茧壳,隐私权已经成为谁都不会在意的过时了的设置,以至于个体曝露在阳光之下并开始消融,这可能意味着个体逐渐走向消失的前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都似乎是残酷的,却又是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想一想走出中世纪的历程,经过了那么惨烈的运动才把个体从同质性的家元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才赋予了个体以独立的地位,而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直接地把矛头指向了个体,宣布个体存在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当然,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走向同质性的家元共同体恢复的方向,随着个体的存在形态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作为行动者的形象将被建立起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行动者的再造运动,人的行动而不是存在将进入哲学思考的中心。在行动的意义,人与人的联系与交集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从而不再以存在意义上的个体形式出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宣布个体的消失,即个体消失在行动者的身影之中。如果说人在行动中也会产生焦虑的话,那么,行动本身也同时是解除焦虑的最佳途径。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社会建构重心的转移,如果说此前我们在社会建构中总是要谋求某种结果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行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内容和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行动本身就是目的。也正是因为行动本身成了目的,所以,人们更关注行动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性质和功能,进而把人们导向合作,即导向证明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当人们拥有了共生共在的观念时,当人们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去开展行动时,引发人的焦虑的社会因素就会大大地减少,个人也因融入到了合作行动中去而不再焦虑。在上述考察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工业社会后期曾一度拥有了消费至上的观念,把消费作为人活着的目的。那是工业社会走向没落的标志,是社会的没落引发了普遍性的焦虑,又试图在消费中去忘却焦虑。然而,通过消费去医治焦虑却是无效的,因为,消费本身又会使人陷入另一重焦虑

之中,即陷入消费消费的无意义之烦恼之中。你可以把旅游看得非常神圣,会努力证明旅游对于你的身心有着无限多的好处,但是,当你的旅行遍布全球而最终回归到了出发点时,你发现你既没有成为徐霞客也没有成为马可·波罗,你因而陷入了无尽的失落感之中。也许你可以说你不会想到这些,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思想功能的肉体为什么又要去旅游,你的旅游无目的,或者说你把旅游本身就作为目的,岂不是徒劳无益地消耗了许多宝贵资源,而这些资源可能恰恰可以解决一些人的饥饿问题。

其实,在晚期希腊甚至每一个社会转折点上,都可以看到及时行乐得到推崇的社会现象,消费社会的出现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时尚。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走向没落的过程中出现了消费文化甚至消费社会是不难理解的,既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许多盛世衰落过程中有过的类似现象都会在新的社会建构方案提出后得到终止,那么,工业社会没落过程中出现的消费主义也会在人类走上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征程时而得到矫正。可以认为,消费社会是在工业社会没落期中出现的一种消极社会现象,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消费就是目的的观念和行为都将被抛弃,人们将会用积极的行动主义观念取代消费至上的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将会把消费至上的非理性行为转化为追求幸福和实现幸福的理性行动。这就意味着将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之相伴随,这种文化根源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却又不同于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包含着业已存在的每一种文化却又实现了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它将是一种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拥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就可以治愈那些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性焦虑。

三、全球化中的差异与流动性

索绪尔说:“语言首要且普遍的特点是靠差别存活,唯有差别。差别不可能弱化,不是说在某时刻引入某个肯定的词项就能达到弱化的目的。”^{[2](P.232)}这应当说是一种客观性的本然状态,社会的发展也应反映出语言的这一特点,应当是在保持差别、维护差别之中走向未来的。但是,近代以来社会建构中的科学追求却表现出了使差别弱化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分析性思维对同一性

的追求而弱化了社会差别。就社会治理来看,对同一性的追求,对差异的轻视,往往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事实上,在任何一处出现了消除差异的做法,都必然会导致和引发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表面看来,分析性思维对同一性的追求是成功的,而且也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社会的制度等,即建构起了基于同一性的普适性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所取得的成功也是令人眩目的。然而,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当危机事件频发时,我们是否想到它与同一性追求之间的因果关系。同一性追求在社会建构中是以消除差异为指向的,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差异扩大化的趋势在每一个领域中都极其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社会风险以及危机事件都是因为差异的扩大化与维护同一性之间的冲撞而激发出来的。分析性思维忽视了差异的价值,或者说,在同一性追求以及基于同一性的社会建构中排斥了差异,以至于受到了报复。由于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都是在分析性思维的主导下加以建构的,因而,所有社会设置也都极力去抹杀人们之间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客观性又是不可改变的,结果,就把人置于与社会设置的对立而上了,几乎一切社会设置都表现出了对人的压抑和对差别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可能不在自我的存在中生成焦虑?

假如同一性追求是同等地对待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即同等地承认和尊重差异而不是认可人以及事物的等级差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应当说是正确的。但是,假若如此,那么同一性和普遍性也就不应成为社会建构的原则和基础了,更不应在差异不可能得到消除的情况下无视差异和排除差异。然而,工业社会恰恰走上了在同一性追求中对社会进行形式化建构的方向,让制度以及一切社会设置都从属于形式同一性和普遍性,并陷入与实质性差异的冲突之中。事实上,由于对实质性差异的无视、忽视和排斥,也使形式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追求经常性地表现为非合理性,从而使合理性成为一种短暂的、临时性的存在,一旦时过境迁,合理性就转化成了非合理性。总之,工业社会的全部社会建构都将自身引向了同一性与差异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也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在20世纪后期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而在个人这里,则以焦虑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因为,个人是差异的载体,而社会则按照同一性的原则

去建构,同一性对差异的排斥和压制给予个人的是深深的创痛,使人变得焦虑。再者,人天然地倾向于服膺合理性,一切非合理性的事物都会使人变得烦躁不安,当社会用形式合理性掩盖了实质上的非合理性时,人又因为其心灵中的玄妙感知而深深地感受到非合理性的存在,特别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人去接受形式合理性时,给人所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焦虑。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社会重新建构的课题提出来后,特别是在我们对社会治理的制度、体制、运行机制进行重新安排时,必须充分考虑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的问题,而且,要认识到,这种差异并不是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也不是事物等级序列中的差异,而是在人的平等以及平等地对待一切事物的前提下对那些实质性差异的承认、尊重和包容。其实,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事物等级序列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都是人的外在性的表现形式和对人的外在性规定,是应加以祛除的。如果同一性追求在对人作出外在性规定的时候就止步的话,那应当说是积极的,然而,当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去看同一性追求时,则发现:在近代早期,特别是在启蒙时期,虽然可以认为是在理论上正确地处理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而在其后的社会建构以及理论探讨中,差异的方面却被阉割了,从而走向了片面的形式同一性追求的方向,并沿着这个方向建构起了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当我们重新思考同一性与差异的关系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可以部分地接受近代早期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的。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近代早期的思想属于启蒙工业社会的范畴,而我们则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赖以展开全部思想的现实基础。所以,我们在思考同一性与差异的关系问题时,就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投向差异。在差异得到承认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的差异都会得到尊重,人在这种尊重之中所获得的是自豪感,继而,所生成的是参与到共同行动之中去的热情,并在行动中进一步证实自身所拥有的差异的价值。那样的话,焦虑何以产生?

也许人们会以为全球化将消解多样性,其实,全球化不仅不会抹平差异和使多样性的世界趋同,反而会促进世界的多样化。因为,多样性并不会因为系统范围的扩大而减弱,反而会在系统边

界外移的同时迅速增长。全球化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系统,也就必然会带来世界多样化的结果。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多样性的根源恰是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化将人类引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因而也必将向人展示出—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的世界。世界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有着无限扩展的趋势。在此情况下,社会治理变革也就必须反映世界多样化的要求,特别是应防止用同一性去对待多样性的思路。可以断言,如果那样做了,肯定是愚蠢的。不难想象,全球化将使许多东西消失,比如,许多方言将会被人们抛弃,但这绝不能理解成所有差异都将被抹平。在我们看来,那些形式方面的、表象层次的趋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而在实质性方面,在价值深层,差异将继续存在,而且会有更多方面的更多差异亦如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样迅速地涌现出来。每日每时都会有大量的差异被抹平,同样,每日每时都会有大量新的差异生成。所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比工业社会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具差异特征的社会。但是,所有的差异都不是因为人对人的压迫、排斥、歧视等原因造成的,也不是竞争的后果,而是由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赋予人的。也正因为差异不是由人以及人造的制度因素所派生出来的,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人们更能包容差异,更愿意在差异中共生共在。如果说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会给人带来焦虑的话,那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则可以使—切焦虑得到解除。

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鲍曼所说的—种情况,那就是,“‘稳固的现代性’的雄心就是把短暂转变成持久,把随机转变成规律,把偶然转变成惯例,把无序转变成有序。它想使人类世界成为透明的和可预测的,并且它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1](P.165)}然而,工业社会的人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领域中都没有实现鲍曼所描述的这些追求,尽管人们总是假设—个理想状态,然后求助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式去实现它。应当承认,在工业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种提出理想状态的假设并作为行动的目标来对待的做法的确赋予了社会发展以巨大的动力,推动了工业社会加速前进,但是,所有的假设都无法实现,或者,在人以为已经实现了的时候又遭遇了挑战,这种情况又怎能不以人的心理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

呢?事实上,它带给人的是普遍的焦虑。我们也承认,鲍曼所说的这种“现代性的雄心”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具有合理性的,而且在制度安排、科学认识、行为模式建构、创制秩序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假设不再有效;它们几乎不值得相信。”^{[1](P.166)}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流动的世界,纷至沓来的事件都似乎是偶然的、突发的和随机出现的,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从哪个方位来,又会消失在哪个方向上,都无从把握,更不用说去作出准确预测了。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偶然的事件,这些事件因为失去了对原因和后果的把握而不再有关联,甚至很难在这些事件中去发现出现与消失的逻辑,在这些孤立的事件之间,“顺序可以很容易地被颠倒或改组:顺序并非真正重要,因为偶然的联系或逻辑并不是必然的;相反,次序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预示了世界的变化莫测。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个事件都足以引起注意,但又迅速地消失。”^{[1](PP.163-164)}然而,也正是因为事件的顺序已经丧失了意义,使我们过往用以把握事件的线性思维变得不再适用,这些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不是发生在逻辑线条中的,而是呈现于一个动态的网络之中的。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的焦虑

主要是产生于把握和驾驭世界的要求无法得到实现的过程中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基于线性思维去把握和驾驭世界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特别是在“有限理性”的忠告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人们在把握和驾驭世界的追求中也就必然会收获焦虑。现在,当人们在这样一个流动性的世界中开展行动的时候,基于线性思维而把握和驾驭世界变得更加不可能,以至于有限理性的追求也不再可能。所以,必须完全抛弃任何把握和驾驭世界的冲动。这样一来,人们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乐观而自信地开展行动,在偶然事件的随机应对中享受一种接受挑战的乐趣,也就不再受到焦虑的困扰。焦虑的解除方式是包含在行动之中的,特别是人们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行动的时候,不仅不会受到焦虑的困扰,反而会时时获得令人无比陶醉的幸福。

[参考文献]

- [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困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和谐”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李安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坚持实践导向, 大力拓展实践路径。在践行“和谐”价值观的过程中, 教育传播构成社会传导路径, 主体内化形成本体内生路径, 实践养成构成本体外化路径, 制度安排扮演了制度保障路径, 文化熔铸构筑了环境支持路径。教育传播、实践养成、主体内化、制度安排和文化熔铸这五大路径相互联系, 相互支持, 构成实践“和谐”价值观的路径体系。

[关键词] 和谐; 价值观;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09-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P.163)}。“和谐”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于美好社会的精神追求, 维系着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和谐稳定, 需要大力拓展实践路径对其进行培育和弘扬。践行“和谐”价值观的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 要通过教育传播、实践养成、主体内化、制度安排、文化熔铸等路径来实践“和谐”价值观, 使之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自觉行动, 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教育传播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社会传导路径

教育传播是一种以培养和训练人为目的而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 主要是指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宣传媒体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人进行思想引导、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和行为规范等。习近平同志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引导是基础性工作。实践“和谐”价值观, 教育传播是

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主导性路径。要使“和谐”价值观深入人心, 得到全社会普遍践行, 必须首先做好教育传播这一基础性工作, 教育引导全社会成员形成“和谐”观念。通过教育传播的手段和路径来确立、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是一定社会维系和发展社会共同体的不二法门。

教育传播这一实践路径在对“和谐”价值观的积极实践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并通过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来实现这些功能。首先, 教育传播承担个体社会化功能, 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而言, 教育传播活动对其身心发展特别是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它既促使个人实现着社会化, 又保证个人维持着个性化, 教育传播的过程是个人发现本身的“自我”、确立和践行价值观的过程。其次, 教育传播承担文化教育功能, 教育传播对和谐文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广泛而普遍的, 教育传播的时间愈久远, 文化积淀就愈深厚; 而悠久深厚的文化, 又为和谐文化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滋养。再次, 教育传播承担沟通表达的功能,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 一方面教育传播主体向人们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和观点,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另一方面, 还能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论述和基本观点”(项目编号: 14MLA001)。

[收稿日期] 2015-04-23

[作者简介] 李安林, 男, 安徽霍山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政治学博士。

将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痛苦的真实情况通过适当的教育传播方式表达出来,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教育传播承担“和谐”价值观实践的主动解释功能,教育传播者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社会事件政治态度和主张的阐释时,要向受众指出某一政策出台、事件出现的背景及原因,阐明某一观点在相关意义中的优越性,以帮助受众认清形势,明确态度,确定对策。教育传播的客观功能要求在实践“和谐”价值观的过程中,重视这种途径,并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以保证教育传播的有效实施,取得较好的效果。

1. 培养“最佳传播者”队伍,强化传播话语优势。“和谐”价值观话语能否产生影响,影响力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首先,要打造“专家型”教育话语传播者。“专家型”的教育话语传播者,能够具备人才优势和知识优势,其传播话语所涉及的理论见解和思想观点也由于专家身份而容易被认同与接受。其次,要融洽传播关系,形成“自己人”氛围。教育话语传播者必须对受众进行深入研究 with 准确把握,把充分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作为教育话语传播实施的基本要求,学会根据受众选择性接受的心理水平和认知水平对传播话语进行预测和调控,不断在话语传播实践中提高传播话语的预见性与主动性,真正使受众对话语传播者产生“自己人”的感觉,以增加和改善与受众的关系,提高话语传播效果。

2. 强化环境影响,发挥教育传播的整合能力。“和谐”价值观传播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掌控,甚至取决于对话语传播大环境中各种不同话语讯息博弈的结果。为此,需要教育话语传播者强化对话语讯息多元取向的整合与引导,在增强传播话语自身科学性与导向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价值观传播与整个环境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实现“和谐”价值观传播效果的整体提升。强化环境影响,要把握环境的整体性和协同性,还需要实现“和谐”价值观传播与其他话语的良性互动,确立“和谐”价值观传播权,实现对其他传播话语的整合与引导。

3. 完善运行机制体制,实现话语传播工作程序化。如同一般传播过程一样,“和谐”价值观教育传播运行也是一个连续的、有步骤的、各个步骤互相关联的完整过程。这个有序衔接的过程

包括:“和谐”价值观传播的编码过程,主要任务是信息准备,将话语心理的、深层的语码转换为实际语码;“和谐”价值观传播的发码过程,是“和谐”价值观传播产生的执行阶段;“和谐”价值观传播的译码(解码)过程,包括价值观表层结构的知觉,深层意义的联结和接受认知反应等三个环节。对“和谐”价值观的教育传播活动要注重过程建设,优化过程体系,使各个环节做到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使整个过程体现程序化和系统化特征。

4. 设置教育传播议题,掌握“和谐”价值观教育传播话语权。议程设置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突出强调的内容(议题)会影响受众对它们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2]“和谐”价值观传播只有主动抓住敏感议题设置议程,才能积极影响受众对问题的认知和排序,获得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教育传播媒体通过设置媒体议程,传播话语能够被其他社会媒体采用,间接地利用它们宣传自己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和价值追求,在更大范围扩大“和谐”价值观传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5. 拓展教育传播的新媒体,构建话语传播新途径。网络技术越发展,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权就越严重。“和谐”价值观的教育传播必须积极回应这种现状,大力拓展网络传播这一新媒介。不仅要积极有效地利用网络技术和沟通渠道建构“和谐”价值观传播权,还要学会适应网络媒体文化环境,塑造新的传播话语生态,寻求构建“和谐”价值观传播权的新途径。

二、主体内化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 本体内生途径

主体内化是“和谐”价值观在社会成员内心生根发芽的关键所在,提供了“和谐”价值观实践的本体内生途径,也是进一步转化为外显社会行为的中心环节。主体内化是实践养成的基础,是文化熔铸的前提,是教育传播和制度安排发挥实际作用的落脚点。主体内化是指在主体积极参与下,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化的趋势和过程。“和谐”价值观是社会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念,也必须经过个体主动积极的接纳,经过将外部有关“和谐”的知识转化为内部知识,将个体认知结构中同化的“和谐”知识转化为“和谐”能力,将“和谐”能力在具体情景与主体体验的基础上转化为表现“和谐”价值观的社会行为,由此,才能在社会上形

成由众多“和谐”之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构成的共同体。

主体内化在“和谐”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承担重要功能,主要包括:一是主体意识的养成功能。“和谐”的价值观只有经过“主体内化”的机制才能激发主体意识,才能转化为个体的态度、信念和追求,也才能促发“和谐”行为。二是认知转化功能。认知转化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形成的起点,只有经过认知转化,才能够把外在于己的知识,转变为内在于己的知识结构。主体内化促成了这种功能的实现。只有通过主体内化的“认知转化”的功能,才能在社会上达成普遍的认知共识,以便为“和谐”价值观的实践打下良好的认知基础。三是能力促成功能。主观内化在基于对“和谐”价值观的正确认识下,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和谐”之思维定式和倾向,促成“和谐”之目标的内部操作程序语言的形成,最终实现“和谐”能力的促成。四是行为激发功能。社会价值观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它与人的主观需求、愿望不相一致,自然会形成众多矛盾。同时,社会价值观转化为个体的价值是一个由知到行的过程。“和谐”价值观实践也是如此,在形成对“和谐”的关系认识,促成“和谐”能力形成之后,表现为外显的“和谐”行为的发生成为内化最终完成的标准。这样,“和谐”价值观在社会个体身上实现了主体内化的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不会自发地内化为人们的意志和信念,而是要通过有关的机制和体制来推动,因此需要加强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等机制保障,积极探索多种实现方式与途径。

1. 完善制度建设。只有制度化的价值观才会持久地发挥实际作用,如果制度体系不承载价值观念并且又不被有效执行,必然出现价值、制度、行为之间的断裂。我们在推进“和谐”价值观内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因素,明确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为“软要求”提供“硬支撑”。把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使各项制度既具有针对性,又体现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和谐”价值观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统一,确保发展战略和各项制度体现举国上下共同的价值追求,为和谐价值体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2. 形成综合评价体系。“和谐”价值观的

形成要具有可检验性,以便使“和谐”价值观的养成落到实处。就是要在社会个体层面,形成检验“和谐”价值观形成的评价体系。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既能够给“和谐”价值观的实践以导向的作用,又能够给“和谐”价值观的实践以激励的作用。“和谐”价值观自身抽象性很强,需要对其操作化和具体化。对其进行逐层的分解,并附之以一系列具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和外在的行为指标。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既要求对评价对象普遍的适用性,又要求在评价体系之中,对评价对象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保护,因此,评价体系不能过于刚性,而应该保持适度的张力。评价体系要在恰当的评价模式之下操作与运行,就是要搭建立体式个体评价模式,就是要引导社会个体定期对“和谐”价值观的个体内化的结果进行总结、评价、反思,这不仅能够获得更深一步的理性认识,及时纠正对“和谐”价值观的认知偏差,还将有效促进“和谐”价值观主体内化的不断深入。

3. 推进自我教育。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与完善不仅是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更是主动自为的积极过程。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向个人层面的价值观的转化必须在主体的参与下完成。在实践“和谐”价值观的过程中,同样强调主体的参与。基于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反思、自我转化的自我教育的方式是大力推进“和谐”价值观主体内化的基本要求和必然途径。因此,要不断推进社会成员的自我教育。首先要积极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审视,产生自我意识,让社会成员明确“我”是价值观的责任主体。其次,要积极推动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找寻到自我在价值观上的差距。最后,要主动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转化,形成个体价值观上的自我提升。

三、实践养成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本体外化途径

实践养成通常是指是通过严格管理、规范行为、长期践行、外在培养与自我内化等多种教育手段,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侧重于行为教育与训练。实践养成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它在人的教育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其对于“和谐”价值观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的行为、习惯、性格乃至思维等诸要素,都是经过受教育者的自觉体验和实践而逐步完成的。

实践养成作为“和谐”价值观实现的一种重要路径,是因为其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功能。首先,实践养成承担凝聚激励功能。通过实践养成,使得“和谐”价值观被社会成员认同之后,其将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剂,会促进群体的团结和睦。“和谐”价值观实践养成得力,反过来就会激励人们自我要求实践养成“和谐”价值观的积极性。其次,实践养成承担规范制约功能。实践养成逐渐把“和谐”价值观的规范体系灌输到人们的意识中去,经过倡导深入人心后,人们将自觉接受并按照“和谐”价值观去实践,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如果极少数人悖行则将会受到群体的谴责,就会对人们的言行具有制约力。

“和谐”价值观的建设与实现,重在积极培育,贵在全社会各类主体自觉践行。为了有效实施,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构建全方位的实践养成体系。“和谐”价值观的实践是一个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构建“和谐”价值观的养成体系要注意处理好各阶层之间、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各自分担的任务看,各级党组织是实践养成教育的主渠道,它既承担着领导的任务和责任,也肩负着养成结果的监督与评价,是整个养成体系构建成败与否的关键环节。因而,要构建“和谐”价值观养成体系,全国各级党组织必须把这一工作纳入重要议程,高度重视,整体推进。此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养成体系要相互促进,协调配合;领导干部、党团员、人民群众、居民住户、青少年学生等成分体系之间要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形成横向与纵向交错、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养成结构,打造覆盖全社会,贯通全领域的养成体系。

2. 建立多元化的养成制度。制度是使认识转化为实践的根本保障,制度越严格、越明确,它就越能形成内部的动力定型。在实施“和谐”价值观养成实践过程中,养成制度的确立和落实,是实践养成计划得以付诸于实践的有效保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养成教育有方向,群众行为有规范,领导执行有力度。与此同时,具体明确的各种规范、守则、制度、要求,在养成实践的实施过程中,还可收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3. 设计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培养践行“和谐”价值观,需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因此,设计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就是“和

谐”价值观实践养成的重要环节。一是设计主题实践活动,围绕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广泛开展创建和谐单位、和谐社区、和谐校园等活动,将“和谐”价值观在创建实践活动中逐步养成。二是设计典型教育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践行“和谐”价值观的习惯养成。三是设计窗口展示活动,针对窗口单位和部门的特殊性,有目的的设计一些展示活动。通过这些自主活动,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彰显“和谐”价值观的内涵。

四、制度安排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制度保障路径

在实现“和谐”这一价值观的过程中,制度安排构成了“和谐”价值观实践路径的重要方面,既给其他途径的实现以平台的支撑,又部分独立地支撑起“和谐”价值观的实现。和谐社会在制度与基于制度的机制上的落实是最深层次和最根本的落实。“和谐”作为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离不开可行性的制度建设,只有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并转化为制度的力量,“和谐”价值观的实现才能落到实处,也才能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广泛的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制度安排是人为设计一系列管束人们最大化行为的规则。其本质在于关系的调节和结构的形成与维持。

因为制度的本质是反映的不同人、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制度安排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对人们利益关系的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实践首先要求的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和谐才是和谐社会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安排符合并提供了“和谐”价值观实践的功能需求。此外,激励功能、规范功能和引导功能也是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制度对于社会成员合理利益的自觉维护给社会成员以及大的激励,并能够使他们进一步维护好和谐的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处于有序的状态。制度安排的规范和引导意味着为社会成员及各种组织提供了一种行为的参照,提供了一种底线要求,从而为社会成员及各种组织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和预期,形成一种前置性的引导和过程性的规范。这实际上带来的是秩序和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构成对“和谐”价值观的有效实践。

“改革”是当前中国最大范围和最高层面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带来了社

会的发展。“改革”与“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和谐”价值观实践的前提性制度安排。在实践“和谐”价值观的过程中,要继续推进改革,并使改革向多方面、立体化发展。进一步推动以“改革”为基本特色的制度安排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构成制度安排有效实施的基本策略和落脚点。

1. 追求公平内涵。追求公正是任何制度安排的首要原则和基本内涵,自然也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制度安排的最基本原则,尤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更是如此。“以制度公正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即是通过公正的制度安排,消除制度不公与度腐败,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协调的社会利益关系,通过制度的创新机制,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消除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3](P.197)}

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创建制度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制度所规范的利益关系,并加以理顺,使各方利益关系处于相互协调,合理共存的状态;二是制度建设要在制度发挥作用的领域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得到认同的制度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三是制度安排的过程和程序要公开,即在创制制度的过程中要做到透明,使制度的创制和运行行进在公众的视野中。

2. 打破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对于原有制度的保持和强化的一种趋势。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意味着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制度安排要摆脱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打破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实质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来制度控制下的利益格局。在旧的、落后的制度背景之下,往往会存在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他们希望旧制度的永存与强化。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利于“和谐”价值观的实现,因此,用过制度安排的途径去实践“和谐”价值观,必须打破路径依赖。

3. 杜绝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是社会的顽疾,是社会腐败产生的内在体制和机制原因,更是阻滞“和谐”价值观实践和最终实现的最大阻力因素。在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性的原则,杜绝制度建制过程中的制度漏洞和制度空白。尤其要对制度产生的权责进行明晰和公示,使制度运行在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要建立一套关于制度的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权力寻租;

要建立制度制定、运行、终止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使制度存在的各个环节都有监管的存在,从过程杜绝权力寻租;要建立制度运行的问责机制,即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后果,要有人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而从制度安排的后续影响上杜绝权力寻租。

五、文化熔铸是实践“和谐”价值观的环境支持路径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文化熔铸主要是指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根本,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文化资源为基础,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优秀和谐文化因子而型塑、践行有中国特色的、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回应人民心声的“和谐”价值观。我们将“和谐”价值观的养成借喻为熔铸,一方面是要说明“和谐”价值观的养成是一项系统的、负责的过程,其中包括教育传播、实践养成、主体内化、制度安排等。在这一系列途径、要素培育的基础上,还需要使“和谐”价值观从民族文化灵魂深处得到熔铸,这样才能使和谐文化更接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的“地气”;另一方面是强调“和谐”价值观借助于文化熔铸,必须要体认到熔铸成功的条件,即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制定有效的熔铸战略。

对于“和谐”价值观的养成而言,文化熔铸将会带来丰富的积极功能。首先,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二,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第三,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义的支持。第四,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人居环境提供文化支持。第五,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第六,通过文化熔铸,“和谐”价值观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

熔铸当代和谐文化是我们进行的“和谐”价值观实践活动之路径,而如何熔铸当代“和谐”文化则是我们必须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具体而言,文化熔铸的有效实施路径和策略表现为:

1. 建构和谐制度。和谐制度是和谐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和谐文化的“骨架”,构建和谐制度是推动和谐文化熔铸的重要保障。因为制度的约束

激励机制,决定着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从而也决定着现世的和谐状况与水平。正因建构和谐制度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单列一节着力加以探讨。

2. 运用“不断改错法”。通过不断消除社会不和谐的文化形态来实现社会和谐;通过不断改正现有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即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来逐步完善社会的和谐制度体系。和谐是稳定、有序、协调的状态。那么,与之相反,不和谐就是动荡、失序、冲突的状态。一个社会有效化解、消除不和谐的过程,一定会包括对既有社会制度的检讨、调适、修正,甚至重构。而一个社会只要持续不断地将这个消解不和谐的过程进行下去,这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公正、越合理,这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3. 协调好和谐文化与富裕文化、自由文化的关系。如同追求富裕和自由,需要分别以富裕文化和自由文化为工具一样,追求和谐文化也需要以和谐文化为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打造和谐文化时,要特别注意协调好和谐文化与富裕文化、自由文化的关系,不要让这三种文化相互掣肘,更不要让我们所打造的和谐文化,妨碍了同样值得我们作为终极性价值目标去追求的富裕与自由。其实,这也是创建和谐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推动“和谐”价值观实践之文化熔铸路径的内在要求。

4. 加强和谐文化熔铸的价值管理。所谓

和谐文化的价值管理,就是以某种价值标准作为评判文化产品优劣的依据,将价值标准渗透于文化政策和文化法规之中,从而形成文化准入制度和文化优选机制。最大的价值标准是人民满意度。在我国,精神文化的政治生产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将长期并存,“双轨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它们具有各自的边界和管理体制。在两种文化生产方式之上,应该建立文化的价值管理体制,其价值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创新、有序、尊崇科学以及爱护自然等价值理念,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在关系和谐的基础上,真正走向文化的价值“和谐”,并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良性发展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吴世文. 全球传播中我国媒体建构国际话语权的探究[J]. 新闻传播,2010(11).
- [3]邵晓秋. 制度公正:“和谐”社会构建的理念与路径[A]. 汪荣有,孙春晨. 伦理视野下的社会发展——第17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光 翟)

“四个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引领

张琴芬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着力于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用“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是我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四个全面”的战略引领。

[关键词] “四个全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战略引领; 培育; 践行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15-03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一、“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引领总纲

“四个全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梳理和提炼,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工作的总纲。它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而提出来的。它是十八大精神的延续和丰富,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强大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支撑。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只把它看成是高度凝练的四句话,也不能仅仅只学习诸多观点中的一个观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2015年1月,他在云南考察时提出,要用“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2015年2月2日,他在省部级领导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修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说,“四个全面”是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所形成的“战略布局”;3月29日,他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成员的讲话中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4月28日,他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中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重大的统领和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 2015-08-15

[作者简介] 张琴芬,女,江苏宜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首先,“四个全面”对接“总布局”这个大蓝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立了新指南。它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着眼深层思考和顶层谋划,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布局确立了发展目标,用全面深化改革为总布局带来了内在动力,用全面依法治国为总布局提供了有效保障,用全面从严治党为总布局形成了强大支撑,对促进总布局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四个全面”聚焦“中国梦”这个大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新路径。它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问题,为实现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指明了路线图。

最后,“四个全面”植根“新常态”这个大背景,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新方略,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增添了新动力。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筹改革、发展、法治、党建之间的有机联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确立了新向导,是我们党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与时俱进的新方略,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指引了努力方向。并集聚“正能量”,承接大担当,为我们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迎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美好明天带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二、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所有价值判断,因而应当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地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意识本质内容的价值观,是社会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把握,统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制约、规范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社会实践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和“险”明显增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和变化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在人们思想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如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因而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强有力的引导。

价值观以历史观为基础。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排除偏见,真正把握客观规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够对症下药,刮骨疗伤。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确定方向的,这个确定方向所体现的就是人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导航灯”。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到底该追求什么,要向着什么方向走,从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效抵制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渗透,粉碎其妄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阴谋。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系社会团结和谐的“稳定器”。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并存的格局下,没有统一的社会价值共识,社会就会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们修德养身的“栖息地”。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是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道德的作用潜移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都要靠道德作支撑。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

们越是经常反复地思考它们,它们就越是以前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就丧失了民族的独立性。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复杂问题扑面而来,让我们应接不暇。面对多元多变的现实生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如何在多样性与选择性的互动中实现价值认同,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中夯实价值基石,在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联结中促进价值实现,路径选择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2](P.156)}他告诫我们:“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3]因此,我们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动摇,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阎志民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活动,才能成为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强大动力;只有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的理想和不懈追求,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和作用。”^{[4](P.111)}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必须着力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究。

首先,在思想层面要普及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内化于心。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失去了理想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外部要求,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广泛传播,才能在全社会不断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助推力,更为民族进步铸魂。

其次,在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层面,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社会治理和政策选

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制度的供给与变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诚信的红黑榜,一方面靠教育,另一方面靠约束。因此,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并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和规章体系的方方面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制度变革和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再次,在实际生活层面,人人身体力行,做到“知行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积极“接地气”,能真正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努力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言行一致、知行统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建立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注意防范价值观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风险和错误,努力从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建设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以“四个全面”为引领,脚踏实地、扎实推进,常抓不懈,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EB/OL]. www.xinhuanet.com.
- [2] 王燕文. 精神之钙[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EB/OL]. www.xinhuanet.com.
- [4] 课题组.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师参考用书[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光 翟)

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王静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哈德罗·D·拉斯维尔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把二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五W”模式以简单、明晰、准确的方式表达了政治传播的要素和特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将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以引起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体、渠道、对象、内容和目标进行全新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 拉斯维尔; “五W”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传播; 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7-0018-04

一、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及其意义

哈德罗·D·拉斯维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具有多重身份,最重要的他是传播学奠基人,同时他又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维尔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把二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作为政治学家的拉斯维尔发表了题为《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论文,与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被人称作传播学和宣传舆论学的经典著作。此后,大规模传播学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

1932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一个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1948年,拉氏又发表了题为《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的文章,在这篇论文中,拉斯维尔对他早先提出的模式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即“通过什么渠道”,由此构成了拉斯维尔最著名的政治传播领域的“五W”模式。拉斯维尔认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by what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因为五个组成部分的英文表述中,都有一个“W”开头的词,这就是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这一模式简明而清晰地表明

了传播过程中的五个重要成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与之相对应,拉斯维尔提出了五种传播研究的内容和分析方法: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他的“五W”传播模式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

当然,“五W”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但是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仍是我们当前分析大众传播,尤其是政治传播最重要的工具,几乎所有的政治传播学都在补充完善或是怀疑论证拉斯维尔的这一模式。我国有些学者也给予它很高的评价。“总的来说,这一文章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的诸要素;二是从外部功能上,概括了传播活动的作用。”^[1]

二、将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可能性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这是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传播的本质和基本要素的特征判断得出的结论。

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传播的本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

[收稿日期] 2015-04-10

[作者简介] 王静波,女,江苏盐城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P.5)}无论从何种角度去重新解读思想政治教育,都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定的阶级和社会组织的自主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自主性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实施主体的特定性、活动的主导性、内容的方向性和活动目标的指向性上,它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政治品德的个体化和个体思想品德的社会化。而在美国,传播学思想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宏观背景来看,它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传播活动的空前频繁,以及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从微观背景看,它是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心理战这一特殊传播活动的关注和研究起源的,这实际上与当时美国经济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对内对外进行政治宣传紧密相关。从传播学产生的背景来看,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传播学,以拉氏为代表的“五 W”模式以一个简明而清晰的模式表达了美国政治传播具有企图影响受传者的目的,拉氏的传播模式显示政治传播的特点本身就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构成的劝服的过程。

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政治传播要素的对应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自身的思想理论体系、价值观念系统、社会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得以进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教育载体、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恰恰具备“传播者”、“传播的信息”、“传播工具”以及“受众”这样四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与拉氏的“五 W”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的要素相对应,“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简化为,教育者(传播主体)将含有一定的思想品德内容的教育内容(传播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载体(传播渠道)作用于教育对象(传播对象),一起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3]

三、拉斯维尔的“五 W”模式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 对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元问题。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学者从历史性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宣传工作’、‘理论教育’,到列宁、斯大林提出的‘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再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现实基础。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4]虽然有学者曾指出:无论是拉斯维尔的“五 W”模式还是其后的香农-韦弗的数学模式都是直线的、单项的,忽视了“反馈”,但它简洁明了的优点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仅以“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例,除了二者在时间承续上的区别外,在空间共时性的角度看,一国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明显区别: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by what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在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不同的表现。

现仅在“思想政治工作”的谁(who)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谁(who)这一问题上进行说明。谁(who)实际上就是拉氏“五 W”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分析”(亦称为“控制分析”)。“控制分析”是研究控制传播工具的个人或少数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在我国,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都是党和国家、或是政府组织机构的工作,但事实上,“政治工作”的谁(who)主要是指党和政府的相关组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谁(who)主要是指教育者或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社会工作者。因此政治工作是一个宏观的政策性的工作,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微观的执行性工作,除了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外,也包括对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和规律的分析。以拉氏的“控制分析”看,政治工作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政治工作的规律。

2. 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渠道的思考

政治传播中首先看看是谁(who),通过什么渠道(by what channel),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分析”(亦称为“控制分析”)和“传播工具分析”(亦称为“渠道分析”)的内容。上文我们谈论到“传播者分析”,现在我们着重谈论“传播工具分析”(亦称为“渠道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不

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与之相应的大众传播工具。在美国,除了政府对传播工具的限制外,还有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控制以及经济因素的控制。前者是指在美国有众多的组织或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目的,采取各种手段,开展各种活动,以有效地操纵舆论,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与行动;而后者,即经济因素对媒介的影响是指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赚钱。”^[1]

在我国由于政治制度体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政治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中都必须贯彻和加强党的领导。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社会活动,它与宣传工作同属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同时进行领导,如果不首先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做一个区分,在思想上就会模糊二者的区别,从而造成二者在实践中的失误。

“渠道分析”与“控制分析”紧密相关,“渠道分析”研究传播工具本身。在我国政治传播的工具具有新闻出版、广播、电影以及电视等不同的宣传手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也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仍旧是课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主渠道。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多媒体教学、微博微信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热点,事实上,就是希望通过拓宽渠道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是在谈论中往往将“控制分析”和“渠道分析”割裂开来,从而出现政治传播渠道不到位、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不畅通,更是出现了不同的主体在利用相同的渠道进行重复宣传,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和厌烦,没有深刻、仔细分析政治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在主体和渠道上的差别,既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会影响政治传播的效果。

3. 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内容的思考

“对谁说(to whom)”实际上就是政治传播中的受众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教育对象的问题。引入拉氏的“五W”模式就是以静态的、放大的形式强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重视,注重将受众的特性、动机、需求及其接受机制研究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五W”模式中的“say what”,即传播了什么?使政治传播中的内容分析提出了理论上的必要

性。“大众传播是有一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5](P.30)}内容是传播活动中联系传者和受者的中心环节,没有内容,一个传播活动就无从存在。与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相比,“说什么”更能表现出主体(who)的特征和定位,也决定着传播活动或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性质。

在现实的思想教育过程中,相比较其他要素而言,“say what”是动态变化最大的一个部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外延逐步扩张,公民教育、生态教育、廉洁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都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来;而从个人的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含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法制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外延的扩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给予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承载越来越大的责任和重担,但我们也应更清楚地看到无限的外延扩大只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想面面俱到,反而面面未到”。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主要由两个大的方面构成:第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第二,宣传我们的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始终坚持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前一个是知识内容,是核心,后一个是价值内容,是根本。

4. 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思考

“五W”模式中最后一环“what effects”,即产生了何种效果。施拉姆曾评论拉氏的“五W”模式“事实上认为传播过程是从一点开始而到某一点终止,这种想法易使人误解。传播过程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6](P.23)}因此,施拉姆自己所创立的传播模式,将传统的单向的线形传播模式修改发展为循环形。事实上,拉氏“五W”模式从未忽视对传播最终成果和功用的考察。“五W”模式的本质就是通过中间环节将第一环节“who”和最后一环“what effects”联系起来,从一开始“who”就重视“what effects”,只是通过研究中间诸要素和“who”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effects”。历史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拉氏的“五W”模式的引入才引起了人们对于传播活动的研究,从而更加准确地表明了政治传播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拉氏的“五

W”模式将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了一个关注效果研究的时代,使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贯穿于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

与政治传播领域中重视“what effects”相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更多地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仅从字面来看,“效果”与“目标”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带有一定的意愿与目的,这种意愿与目的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目的和意图实现或完成的情况是效果。目标是一种终极追求,而追求的结果表现为效果,判定效果好坏的标准取决于其目标实现与否,因此目标是一种应然性的存在,而效果是一种实然性的存在;目标是一种未来的指向,而效果是当下的结果;目标是要企及和实现的,而效果是可感知和可测量的。

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同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就是将目标细化、具体化、量化、可回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堂课、一个活动,我们可以从知识的掌握、学生的反映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从当前整体的学生的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和道德水准考察前一阶段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在每个阶段都可以有现实的表现和标准,因此增强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和有效性。

拉斯维尔的“五 W”模式是政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公式,它以简单、明晰、准确的方式表达了政治传播的要素、特征。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将拉斯维尔的“五 W”模式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以引起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渠道、对象、内容和目标进行全新的思考和认识。

[参考文献]

- [1] 乐利文,罗蕾蕾. 从拉斯维尔的“五 W”模式分析当代美国的国际宣传体制[J]. 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 [2] 张耀灿,徐志远.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 [3] 王贤卿. 论传播学受众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11).
- [4] 倪榛襄.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历史演进[J]. 思想教育研究,2012(11).
- [5] 张隆栋. 大众传播总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6] [英]丹尼斯·麦奎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光 翟)

关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李东晓

(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河南信阳 464000)

[摘要]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需要。主体性缺位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和思想特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根本,着力增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实效性、创新性、人文性、针对性、社会性,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积极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现代化水平、履行自身历史使命的可取路径。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22-06

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世情、国情的多方面变化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前所未有的思想激荡和价值多元的冲击,也使大学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迷茫,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和挑战。现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知行错位的德育理念导致了潜在德育资源的大量闲置,片面强调大一统的培养导向限制了高校教师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去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则极大地忽略了大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主体性缺位的误区,就必须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积极倡导和努力构建一种师生互动的新型德育模式。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

1.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充当突击队的作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如何,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为大学生开阔视野、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存在,也使大学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迷茫。“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2.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等教育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战略任务。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不仅表现为高校人才培养规模的

*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15—SZ—02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当前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形势任务及问题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SZ—033)。

[收稿日期] 2015-07-20

[作者简介] 李东晓,男,河南叶县人,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讲师。

扩大,而且表现为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努力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高等学校才能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为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不断满足大学生发展的多方面需要,高等学校的发展才能得民心、顺民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客观要求和促进自身改革发展的生命线。

3.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大学生提高素质和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

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起着定向和范导作用。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学生渴求人文关怀,亟需构建精神家园,期望获得心灵上的安定和慰藉。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引领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进一步激发其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愿望,帮助他们在解决困惑和消除烦恼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心态,从而构建大学生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实现他们对组织的认同和与周围事物的相辅相融,最终达至自身成长成才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统一。

二、主体性缺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迷误

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征是主体性缺位。涂又光先生在谈到智育与德育的区别时指出,“知道为智,体道为德”。“知道”和“体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知道”是一个学习认知、获得思维上的满足和充实的过程;“体道”是一个感悟体验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生活化的过程。^[1]现实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和无实质内容的道德理性能力出发,突出强调国家、社会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标准、规范等方面的权威,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化、规范化和抽象化,形成了一种思维独导的知性德育和知识德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概念学习过程。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去生活化的德育,它没有“体道”的过程,忽视了学习主体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割

断了自己的源头活水。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知行错位的德育,它使高校教师和大学生沉醉于一些空洞的道德名词,体验不到生活世界与自然界无限的美好和乐趣,生成的只能是由于主体性缺失而索然寡味、令人厌倦的低效德育。

主体性缺位首先表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体意识不强,能动性发挥不充分。一是理性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产生的情感投入不足。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理性过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情感和意志在道德学习中的作用。高校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缺乏情感投入,不习惯于用平等协商的态度对待工作对象,难以与大学生建立人格平等的师生感情,导致了师生思想隔离。二是现行课堂教学模式导致的因材施教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的严格规约下,基本不考虑大学生在课堂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讲授方式缺乏艺术性,多为枯燥干涩的语言堆积;往往是照本宣科,少有精辟独到的个人创见;讲授内容与大学生生活实际相脱离,忽略了因材施教。三是主体道德践行不规范,难以为人师表。部分高校教师存在的师德修养欠缺、言行不一、不能力行道德规范、缺乏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起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作用。四是问题意识不强,难以适应大学生多方面的成长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缺乏深入的了解,无针对性、无目的地安排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缺乏新意,创新意识淡薄,表现手法单一;教育形式单调,缺乏对学生的理解和信任,使得大学生难以接受,影响教育效果。

主体性缺位集中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性。一是大学生的德育学习主体地位被遮蔽。大学生德育学习的主体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学习者在教师的引导下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能动性和选择性等功能属性。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三大主导方式,即教导、榜样和规约,这三大主导方式的实质是“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而不是鼓励学生主动选择与创造,即不是倡导主体性的德育范式。^[1]在这种德育范式中,教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生往往处于客体位置和从属地位,难以实现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进行自主探索,容易产生把既定观念强加于大学

生的不足。二是不甚关注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节被边缘化。没有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高校收费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改革发展进程对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深刻影响,不能对诸多关系到大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予以及时合理的解决,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个人行为和个性发展脱节。过度依赖以课堂为主导的学校载体,缺乏多样化的道德实践活动平台,难以整合社会力量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和有效排解环境因素对大学生思想成长的不良影响,大学生不能根据个人体验自主生成更具生命力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念。三是大学生没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缺乏自我探索。大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劳而无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没有大学生的充分参与,就培养不出他们在思想政治素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方面自我探索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现实中,大学生往往对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与其无关、对立、对抗的位置上,或消极对待,阳奉阴违,或对抗拒绝,产生逆反心理。没有关心人就不能理解人和塑造人,缺失大学生自我追求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削弱了其教育效能,不利于大学生的思想成长。

三、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1. 完善机制,着力增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

提高思想认识,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从立德树人的高度、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贯彻十八大精神上来,统一到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上来,进一步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师生员工积极参与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关注、支持和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

完善制度体系,着力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运行轨道;定期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清理,根据制度运行效果和形势变化及时修订、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健全制度运行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按照专业化建设的思路,做好辅导员“精选”工作;按照专家化建设的思路,做好辅导员“重培”工作;按照职业化建设的思路,做好辅导员“严管”、“善待”工作。

2. 突出重点,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在内容设计上,坚持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品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加强人文心理教育,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健全心理。

增强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归宿。要把握时代脉搏,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要结合专业思想教育,培育优良学风;要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行化人”,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和说服力;要树立创新意识,积极探索,不断推陈出新;要树立品牌意识,立足于学校和各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专业特点,打造工作品牌,创建工作亮点。

3. 拓展渠道,着力凸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

认真研究德育工作的发展规律,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感染力。着力建构新媒体教育体系,把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发挥其容量大、传播快、受众多的优势,精心打造“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身边榜样”等系列特色栏目,建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网络德育工程。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做好典型选树工作,保证典型选树的严肃性、规范性,提高选树典型的质量;加大宣传力度。集中运用报刊、电视、广播、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挖掘大学生先进典型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进一步扩大典型的影响力;注重跟踪培养,关心被树立为典型的学生的持续发展,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帮助,为他们创造进一步成长成才的良好条件。

4. 注重服务,着力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

强化服务意识,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

教育管理工作。一是通过开展新生军政训练、大学适应性教育、文明习惯养成教育、校规校纪教育,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引导新生尽快熟悉大学生生活,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养成良好习惯,顺利展开自己的大学生生活。二是通过开展毕业生就业指导教育、基础文明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引导毕业生合理定位、理性求职,引导毕业生明礼修身、遵纪守法,引导毕业生心怀感恩、饮水思源,引导毕业生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努力塑造大学生的健康性格和健全人格,提高大学生心理品质;认真做好心理危机的预防和干预工作;狠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依据程序开展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国家奖助学金和学校特殊困难补助的评定工作;继续做好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工作,保证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都能顺利入学;加强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管理,评选学年勤工助学先进个人,实现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积极拓展社会性资助渠道,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5. 纵深发展,着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适应“90后”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契合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认真研究“90后”、读懂“90后”,掌握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因势利导,建立一种教师与学生平等、互动的教育关系;利用新颖有效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避免呆板、单一、命令式等易引发学生排斥心理的教育形式,增强教育效果;把实践性教育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努力创造各种机会和途径,使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促使“90后”大学生在实践磨练中成长。

继续推进班级特色文化建设,打造优良学风校风。结合时代特点、专业特点以及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班风、学风、学术科技文体活动以及班级特色活动为主要内容,创新途径和方法,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班级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班级文化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及熏陶功能,增强学生对班级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团结向上、互帮互学、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和

活力的班级文化氛围,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6. 加强管理,着力彰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

坚持不懈做好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涉及千万家庭的幸福,事关和谐稳定大局,抓好学生安全管理工作,责任重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强化“生命不保、何谈教育”的安全意识,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安全工作体系,认真研究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积极落实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狠抓各项科学预防措施的落实,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努力构筑学校、社会、家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思想教育模式。重视家庭因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联系沟通和密切配合的有效渠道。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作用有机统一起来,精心构筑高等学校与社会生活主体之间的连接机制,争取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街道、社区、村镇等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共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2]

四、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师和大学生心灵的沟通,是建立在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基础上的价值认同和境界升华。只有重新摆正颠倒了的知行关系,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才能真正走出主体性缺位的误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和影响力。只有回归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积极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德育实践模式,努力创设大学生全面成长的优良环境,才能有效整合各种力量,形成德育合力。只有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和方式方法的现代化水平,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积极提供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符合其成长需要和心理需求的多样化服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走进大学生的心灵,有效增强其说服力和感召力。

1.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真正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首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之中,体现在学校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认真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大力增强课堂教学的生机活力;抓好对学生骨干的理论培训和对大学生理论社团的指导,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理论学习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组织社科骨干,加强理论研究,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当前师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答;完善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经常化、系统化、科学化;加强校报、学报、校园网等高校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与管理,使之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营造主流校园文化舆论氛围。其次,多措并举,通过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实现大学生的价值认同。立足大学生的利益需要,着眼于“以利导义”,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等服务途径,构筑从利益认同走向价值认同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内容体系,实现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归属。再次,着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实践育人过程之中,统筹好校内校外两个平台,在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元素,以七一、八一、十一、教师节等重大节庆日为契机,精心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定期组织青年大学生开展政策宣讲、法律咨询、义务支教、科技支农、企业帮扶、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努力促成大学生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增长才干、提升思想境界。

2. 以构建当代大学生的和谐人格为价值目标,积极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人格和谐是当代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素质特征,构建大学生和谐人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3]构建大学生和谐人格要求树立开放的大思想政治教育观,积极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更新观念,真正从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的系统工程视角出发,大力整合校内校外多种育人资源,有效统筹课内课外各项育人工作,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部门和单位各负其责、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要树立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全课程教育的观念,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导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要强调所有教师员工的育人职责,充分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再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生活的各环节,依托党团组织和学生社团两个阵地有效开展生动有效的思想教育,使之成为大学生温馨的精神家园。要以班主任(辅导员)联系学生宿舍活动为载体加强学生公寓的教育管理,为学生提供耐心周到的指导、咨询和服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大学生成长的各方面。最后,要致力于优化思想教育环境,吸引社会力量关注和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努力构筑学校、社会、家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3. 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基准和导向,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水平

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创新的时代,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基准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要大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的“社会本位”或“任务本位”向“主体本位”转变,积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一系列构成要素和环节的创新化与技术化。首先,要树立开放、发展、多样化和创造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充分尊重和发挥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在教育决策、管理上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遵循科学程序,运用科学方法,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办事。其次,要把着力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上,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素质养成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注重选择贴近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实际内容开展教育,切实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再次,要力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发展中求创新。要在系统性、科学性、民主性、实效性原则的指导下,努力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纵横联系的教育网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合力。要在

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本着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等原则把现代的疏通引导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和推行“探究式”、“合作式”、“研究式”、“发现式”等生动活泼、富有实效的现代教学方法。最后,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满足青年大学生快速而又广泛接受信息的需要,综合运用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的舆论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主流文化舆论氛围,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大力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以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网络道德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高“红色网站”点击率,努力掌握主动权,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4]

4.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大学生心坎上

根据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环节。^[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着眼全体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指导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倡导和谐理念,切实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谐精神,引导他们用和谐的方法、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要大力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融合,以提升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目标,着力于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健康知识,优化个性心理品质,增强心理适应能力和防御能力,全面提高心理素质。二是着力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实际困难。要在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就业创业的指导与服务、困难学生资助等方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大学生排忧解难。要坚持思想教育与严格管理、热情服务相结合,建立健全辅导员(班主任)进学生公寓值班制度和教师联系学生、德育导师制,关心大学生的成长、真正为大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的难题。三是注重

言传身教,加强正面引导。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自身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完善自我人格,牢固树立从劳动、从付出、从自己的创造和对社会与他人的关爱中获得幸福的职业理想。要引导青年大学生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他人价值的实现、社会价值的实现有机统一起来,在为祖国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人生过程中实现精神人格的升华,为培育他们的心理和谐树立起正确的航标。四是完善心理疏导机制,帮助大学生做好自我心理调适。积极疏导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教育他们理性对待和积极发泄其消极情绪,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调适和促进他们人际关系的和谐。^[6]要注重发挥网络平台、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在化解大学生思想情绪和心理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着力丰富大学生的社会文化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陶冶他们的情操,愉悦他们的身心,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有效调节他们的情感和心理,努力排解和消除他们的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要努力把大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贯穿到高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体现在对大学生成长一点一滴的关心、关注、关爱上,将育人为本的理念切实转化为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日常服务,用爱的阳光温暖大学生的心灵,营造当代大学生健康、和谐、美好的精神世界和健康品格。

[参考文献]

- [1]文艺文. 大学德育路径生活化[J]. 道德与文明, 2007(5).
- [2]逢锦聚,李毅. 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3).
- [3]李东晓. 高校德育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刍议[J]. 文教资料,2007(28).
- [4]徐子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与提升[J]. 理论月刊,2005(1).
- [5]赵慧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1).
- [6]丁正.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9).

(责任编辑 光 翟)

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组织总部的双向选择动因^{*}

王锐兰 茅磊江 王恬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组织总部的双向选择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下的主动行为,有着其内在的特定选择偏好和一致性认同逻辑。国际性城市竞办国际组织总部的主旨在于提升城市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对外开放度,以及国际性组织总部入驻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辐射和波及效应。国际组织选择东道城市的逻辑偏好是内生因素与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组织作为独立行为体有着彰显其作用与功能的强烈意愿;东道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与政策支持、东道城市的区位优势则是国际组织选择东道城市的外因。因此,国际性城市政府部门应把竞办国际组织总部提高至战略层面;寻求中央政府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支持;发挥后发优势,实施多元化策略;注重城市生产生活功能的完善与升级改造工作。

[关键词] 国际性城市;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总部

[中图分类号] D813,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28-05

扫视全球,众多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北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性城市(或称之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总部在我国国际组织少之又少,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对外开放程度极不相称。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政府部门开始关注国际组织总部入驻问题,把吸引国际组织总部入驻作为城市未来发展战略和政府工作“抓手”之一。城市政府管理实践层面的持续推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及时回应、设计乃至引领国际组织入驻国际性城市问题。

本文的前提条件是基于一个合理的理论推测,即国际性城市之所以致力于成为国际组织总部入驻地,国际组织总部之所以选择某个国际性城市作为其依托城市,两者对对方的筛选与绑定过程并非盲目无序,而是有着其自身的特定选择偏好和一致性认同逻辑。两者之间不对称的相互

依存关系,可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国际组织与国际化城市相互关系的分析工具。那么,决定与左右这种内在逻辑的因素与线索何在?从中获得何种有益启示来推进国际性城市吸引国际组织总部入驻,进而推进东道城市政府管理现代化?本文站在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组织两种立场,力求提出、剖析并解答问题。

一、国际性城市竞办国际组织总部的内在逻辑:国际地位与辐射效应

城市尤其是国际性城市的定位、发展与评价,从来不是遵从某个单一因素、单一逻辑,而是多元因素的综合考量结果。国际性城市多半是国际组织总部集聚地,其竞办国际组织总部时取决于多种驱动因素。

1. 提升城市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对外开放度

国际性城市的一张名片或者说是标志,便是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志愿服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1YJA880104)。

本文得到东华大学2013年“文科繁荣计划预研究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 2015-09-01

[作者简介] 王锐兰,女,江苏启东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

茅磊江,男,江苏如东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恬,女,安徽马鞍山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际组织总部数量的多少。有国际组织总部入驻的国际性城市,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因此,一个城市是否拥有国际组织入驻,入驻国际组织的数量多少等因素,已成为评价国际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1986年J.弗里德曼(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的7个指标,其中之一便是“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1]。1995年联合国50周年庆典之际,纽约市前市长朱莉安尼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国总部的存在,纽约才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世界之都”^[2]。可见,要跻身于国际性城市行列,就要有国际组织入驻,才能无愧于国际性城市的称谓。

国际组织标志着国际性城市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能进一步提升国际性城市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形象是无形资产,而国际组织总部入驻将是提升国际性城市国际形象的最大筹码和最便捷的国际通道。纽约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吸引许多国际性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入驻于此,联合国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对纽约这座世界城市强有力的诠释。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入驻数量往往与国际活动、国际会议和国际交往的增长呈正向关系。国际性城市可以利用各种活动或会议来扩大国际交往,进行城市形象的宣传和推介。20世纪90年代,有关专家对世界城市现状进行评估,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了世界城市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评价指标的“标准值”^[3]。其中,世界城市(初级阶段)的年国际会议举办数须达到200场次(2001年水平)。如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上海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上海的国际地位。

2. 国际性组织入驻可能带来的辐射和波及效应

国际性城市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的内在动因,还在于比较看重国际组织总部入驻对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可能带来的全方位的辐射、扩散和放大效应。

一是城市经济增长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城市经济直接受惠于国际组织总部入驻后对经济引擎的激活动能。全球共有6万多个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使得东道城市成为国际资源的聚集地、国际财富创造中心、国际经济控制中心等,经济增

长空间由国内向全球拓展;创造了众多国际性潜在客户和消费市场、商业收益平台,进一步繁荣城市经济。各类国际会议的召开可以直接拉动该国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其中旅游、广告、运输、通讯等行业收益最大,由此带来的延伸经济效益更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如纽约市政府曾调查得知:纽约为联合国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4美元的收益。^[4]纽约市在2010年年初的430亿美元预算中,用于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的资金比例高达33%,而这些组织创造了整个城市GDP的11.5%。^[5]

二是城市文化文明程度得以大幅提升。国际组织的入驻在国际性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文化作为软实力可以支撑起国际性城市的品牌形象,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蒯大申认为,国际性城市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文化条件:高度现代化的文化设施服务功能,在文化生产、服务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优势;国际间科技、教育、文化的交流中心,具备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拥有高素质的市民、多元的文化生活、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和鲜明的文化特色^[6]。可见,国际性城市离不开国际文化的生产、交流与传播、宣传。一些重量级国际组织的入驻,可以帮助东道国尤其是东道城市的民众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与实时传播,有助于增进本土市民与国际性市民、东道城市与国外城市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交流与合作。

三是城市公益慈善事业直接受益。1863年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它的活动以应对战争及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为主,在各大城市致力于人道主义国际救助活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的国际狮子会,其座右铭是“我们服务”(We Serve),以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为宗旨,开展赈灾、扶贫、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防盲、青少年服务、残疾人康复、环保和人道救援等社会公益活动,使狮子会所在的社区、城市、省和国家受益,提供了一种“利用社会资源为公众谋福利的新模式”,开拓了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促使我国社会公益慈善服务事业快速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7]

四是城市比较优势、政府职能创新方向得到凝练。吸引国际组织入驻过程中以及成功入驻之后,东道城市必须为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交通、住房

(包括办公设施和住宅)、人员交流,东道城市的相对比较优势得到逐步浓缩与凝炼,层次更高、优势更强;对政府相关职能也带来机遇与挑战,政府管理创新潜能得到深度挖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也与国际水准接轨,尤其是国际关系处理能力、政府国际形象塑造能力、政府国际危机公关能力、政府对外交流沟通协调能力等明显提升,国际合作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政府职能会在一定时期转向国际会展中心、国际学校、外国人公寓、家政服务、医疗、大型文化娱乐和购物设施等建设,持续改善有利于国外高端人士居住、生活的人文城市环境。

五是吸引其它国际组织总部的跟进。国际组织总部入驻,一旦形成气候,便会相互吸引,在东道城市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并继续吸引其它国际组织总部的新建或搬迁,进而促进技术与知识的梯度转移,推动经济、技术与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良性循环因此产生。如北京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吸引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国际竹藤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博鳌亚洲论坛、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入驻,其它国际组织总部也相继跟进。

六是周边城市群得到明显的衍生性辐射。国际组织入驻城市通常需要有广阔的容纳腹地(或称之为后方城市群)。纽约、巴黎、东京、伦敦、芝加哥、上海等城市本身就是世界六大城市群的中心节点城市。上海与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杭州、嘉兴、宁波、湖州等构成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富饶而广袤的长三角地区为上海吸引国际组织总部入驻提供了良好的区位优势;周边地区城市群则为国际组织入驻提供了广阔的承载腹地,也可以获得国际组织总部的直接辐射或间接波及效应。

二、国际组织选择东道城市的逻辑偏好:内生因素与外生力量

国际性城市作为国际组织的依托和承载体,国际组织总部落地生根时首先考虑其东道城市是否宜居、开放、包容等外生力量,及其与国际组织自身的匹配度与相容性。

1. 独立行为体的作用与功能的彰显意愿

全球化使得世界正在变成小世界、地球村,强调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加强多国合作、国家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等观点的提出,开辟了不同于权力政治占国际政治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新视野^[8],为国际组织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理论基石。

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发酵,当今国际舞台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呈现了多元化态势。国际组织作为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在诸多国际场合表现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国际事务的日趋多边化更增加了复杂性程度,需要彰显国际组织特有的沟通、调节、维护、保障功能。而国际组织成立本身,就是旨在参与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处理,凸现其独立行为体的角色和功能。

2. 东道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与政策支持

国际组织入驻东道城市,都是中央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地方政府也为国际组织入驻提供特殊的制度环境和规范化机制。为了联合国总部入驻纽约,1947年美国与联合国签署特权和豁免协定,承认“国际领土”的特殊地位。纽约市在法律上也为国际组织开展工作提供诸多便利,如在联合国工作的各国外交官受到国际法保护,享有司法豁免权。纽约政府对国际组织资金流向进行检查,并监督其运作管理过程。日内瓦在竞办世贸组织(WTO)总部时,甚至修改了部分法律。两德统一后德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将波恩定位为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总部基地,由联邦政府提供免费的办公大楼和相应待遇。在竞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时,为了与加拿大、西班牙和瑞士竞争,德国开出了许多免费或优惠条件,如免费提供和负责维护宽裕的办公场所、设备;每年赠给中心200万马克,无限期提供等。^[9]

3. 东道城市的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交通地理区位优势、经济区位优势、技术与市场区位优势、政治与政策区位优势等。当今国际组织主要分布在国际功能较强、区位优势显著的国际性城市。按总部和地区分部数量排列,国际组织分布列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罗马、日内瓦、纽约、华盛顿、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哥本哈根。^[4]这些城市或是对全球有巨大辐射力和全面

影响的国际化城市如巴黎、伦敦和纽约；或是对世界某个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化城市如布鲁塞尔、罗马、日内瓦、维也纳等。它们或是政治型国际城市和国际政治活动的集中地；或是经济型国际城市和主要的金融中心；或是文化型国际城市，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如日内瓦在吸引国际组织入驻方面的成功，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历史文化优势，一是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各国渴望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为未来预防战争而努力，或评说、斡旋、仲裁的场所；二是瑞典长期以来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是瑞典是一个政治高度文明的国家，自由、民主、和平已经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瑞典政府的制度自信对国际组织充满了吸引力。国际性城市有着综合性功能优势或区域优势或某一专业性优势特色，正是吸引国际组织落户的主要原因。

三、国际组织与国际性城市互择逻辑对国际性城市政府管理的启示

基于国际组织与国际性城市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国际组织总部依存于条件适宜的国际性城市，才能获得实质性依靠力量；国际组织总部数量和质量给东道城市的影响利大于弊。对于未来可能进入国际组织视野的准东道城市而言，工作重点和中心应该转移到如下方面：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以引入国际组织总部入驻为己任，把国际组织总部入驻提高至战略层面，作为政府的远景奋斗目标。从顶层设计视角，把吸引国际组织入驻，列入政策设置议程，出台各种优惠、激励和鼓励政策。国际组织的入驻固然与东道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等综合因素息息相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国际性城市的影响力不能光看体量，如同日内瓦，城市虽小，却是众多国际组织总部入驻的国际性城市。国际性城市还要看他拥有多少国际组织、拥有多大的国际话语权。北京、上海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火车头，被列入 Gamma 等级“全球城市”^①，但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全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外界优势资源，形成相对比较优势。其他国际性城市都要结合自身的

区位优势 and 特色资源，形成各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甚至主管领导要出国拜会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伸出“橄榄枝”，“筑巢引凤”，把吸引国际组织入驻工作做到极致。

加强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联系沟通，及时了解中央出台的各项措施，寻求中央政府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支持。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吸引国际组织入驻方面的各项政策支持和资金资助。建立好与中央各部委的合作机制，及时、全面地掌握国际组织的相关动态信息。利用中央各部委的技术、网络和人才资源，获得技术和网络和人才支持。极力争取中央各部委的政策试点，推进城市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入驻的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建立完善国际组织入驻的法律和组织框架。重点是要加快出台《国际组织法》等相关法令，从法律上保证政府对各类国际组织权利及其各种保障措施的合法性，从而为下一步吸引国际组织入驻扫清法律障碍。

国际性城市要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集聚优势资源，多管齐下实施多种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策略。尽管纽约、日内瓦、波恩和内罗毕等城市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各不相同，但均受到联合国或其国际组织入驻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但世易时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均已被瓜分完毕、尘埃落定，要让已经落户的国际组织改弦易辙，几无可能。作为发展国家的国际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应该发挥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生活、生态环境等区位优势，实行多元化竞争战略，剑走偏门、出奇制胜。

例如，上海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行快速响应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快速缩小与其他国际性城市吸引国际组织入驻所采取的政策制度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差距，以跟随着身份咬住先行者，盯住对方、全力以赴、轻装前进。也可以实施引进式发展战略，从举办一些国际论坛或者国际会议入手，争取赢得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依托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优势，可以考虑引进一些经济类的国际组织总部，如亚洲开发银行。还可以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包括入驻的国际组

^① 根据 Beaverstock(1999)的归类，全球 55 个“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可以分成三个等级：10 个 Alpha（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10 个 Beta（第二）等级的“全球城市”以及 35 个 Gamma（第三）等级的“全球城市”。参见余佳、余佳，“巨型城市”、“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兼论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中的位置[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2(4).

织类别的差异化、提供优惠条件的差异化、城市和市民文化的差异化、引进路径的差异化、服务差异化等。尤其要与国内的重要竞争对手如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形成显著的差别性优势。最后便是孵化式发展战略,根据上海的区位、经济等方面优势,主动培育、倡导、发展国际组织或者区域性组织或国际论坛(会议),为专门化、区域化国际组织总部入驻积累经验。

注重国际性城市生产生活功能的完善与升级改造工作。一个期望国际组织入驻的城市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非常出色或人口规模庞大,但首先必须是国际性城市。城市成为各类要素如资金、人员、公司、技术的国际性集聚场所和市场中心,在工作、生活、居住、购物、交通、旅游方面享有高度的便捷、舒适、无障碍性,全方位彰显其影响力和城市魅力。东道城市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推动城市建设、办公设施改造修缮、区域开发、环境保护、文化历史遗产修缮和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等;提升市民文化素质和对外交流能力。加快城市群之间同城化步伐,让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务流等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域界限;城市间实施公交一卡通、地铁对接、医疗保险异地结算等,实现各类

资源区域内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 [1]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世界城市”和“国际城市”[J].杭州(我们),2010(Z1).
- [2]蔡寒松.国际组织与东道城市相互关系的个案研究[J].国际观察,2008(6).
- [3]薛言.欲建成世界城市:上海与国际的差距在哪里[J].国际市场,2003(1).
- [4]郭剑彪,陈依慧.崭新的引资途径:竞办国际组织[J].浙江经济,2002(15).
- [5]李培广,李中洲,贾文杰.国际组织落户纽约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启发[J].中国市场,2012(33).
- [6]蒯大申.论国际大都市形成的文化条件[J].社会科学,2004(7).
- [7]孙茹.国际狮子会[J].国际资料信息,2002(11).
- [8]孙仲.国际组织理论研究评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 [9]李大庆.竞办国际组织总部[N].科技日报,2002-02-06(04).

(责任编辑 光 翟)

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制度探析

——基于法制保障视角

赵 艳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 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法制化是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坚实保障,它有利于建立起民间金融信用系统、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建立法定的风险转移通道以及健康发展和制度创新,但也不可否认,民间金融法制化道路上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合法地位、法律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存在不合理和片面性并且缺乏监管等,因此,建议通过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重视法律规范和法律运用、尽快制定专门法律并且加强法律监管等举措来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

[关键词] 民间金融; 规范化; 法制化; 法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33-04

市场经济以自由市场为前提,各种经济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以私法自治为原则,公平自由地进行交易活动。但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各种经济行为,并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管理,对违反规定和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所以在肯定民间金融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要健全金融法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and 经济安全。2014年3月1日全国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这一举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意味着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一、法制化是民间金融发展的坚实保障

在现代社会,民间金融活动已经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和参与。根据金融风险理论,企业商业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风险,最终都将体现为法律风险,或者说将同时相伴产生法律方面的风险。因此,民间

金融法律风险管理的最终立足点在于法律来管理风险。然而民间金融机构内部对法律风险管理的内涵及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充分,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对法律风险管理的定位不清晰、不准确等,仅仅将法律风险管理简单化为提供法律咨询和审查意见以及对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进行管理等方面,并以合规性管理代替法律风险管理,这就更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适当的监管,从而实现由外到内的规范与管理。如果法律制度处于高效的状态,那么就会促成民间金融机构经营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反之,如果是处于低效的状态,则破坏了这种竞争性市场机制,这就是民间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所在,所以,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保障金融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法律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所有的金融行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运作,即使是创新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或者是重新制订新的法

[收稿日期] 2015-08-19

[作者简介] 赵 艳,女,江苏徐州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讲师。

律来约束这些金融形式和金融行为。

1. 民间金融法制化有利于建立起民间金融信用系统

民间金融往往局限在血缘和地缘等狭窄的信用体系中,特别是一些非法的民间金融,无法形成大的信用系统。这些狭小的信用系统主要依靠道德来维持,缺乏法律的必要支撑,但是道德的约束力毕竟有限,容易出现违约风险。缺乏法律制度的制约,民间金融就会面临失信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这必然阻碍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因此,民间金融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支撑,必然会影响金融的安全有效运行。

2. 民间金融法制化有利于提高金融交易效率

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使金融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有效运行,从而减少了借贷双方为维护各自的资金安全而产生的大量交易费用,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反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会削弱金融功能,使得资金的融通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金融对经济重要支撑作用的发挥。

3. 民间金融法制化有利于民间金融建立法定的风险转移通道

目前,国家明文禁止“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非民间金融活动。主要是由于这些“非法”民间金融活动规模比较小,发生违约的风险比较高,同时缺乏正常的风险转移通道,这容易诱导民间金融的借贷双方选择短期行为,而这种投机行为带来的巨额利息,又会进一步使得他们继续选择扩大收益的短期投机行为,从而进一步增强信用风险。这不仅严重阻碍民间金融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民间金融的法制化使民间金融可以通过法定的风险转移渠道,进行审慎经营,降低经营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4. 民间金融法制化有利于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和进行制度创新

在金融发展中,无论是解决市场失灵还是避免政府失灵,都要倚重法律制度手段。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可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提高金融机构的内控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务的法律制度,可以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自律的法律制度,可以约束自身的金融行为,防止恶性竞争,提升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长期受到政府打击,“非法的”民间金融一般规模较小,它的收益在狭小信用系统中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利于其大规模发展,也不足以支撑其制度创新。^[1]而且,民间金融法制化以后,借贷双方有法定的风险转移渠道,在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的情况下,借贷者才有寻求制度创新的可能,以合法地扩大收益。

二、民间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民间金融缺乏合法地位

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出台专门性法律法规用于规范民间金融,造成民间金融法律边界模糊不清,使其处于尴尬的境地,常常游走在“非法”地段,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来讲就显得比较被动。法律地位的模式不清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专门性的法律制度的缺失。目前国家几乎控制了整个金融业领域,现行的金融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根据正规商业银行体系的标准制定,用于调整各个正规金融体系交易主体的行为,还没有根据民间金融组织和个人的特点,制定符合他们发展的法律规范。对民间金融中各种资金融通行为的界定,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的相关条例、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的一些重要文件以及地方政府和金融办颁布的一些部门规章制度对正规金融体系以外的资金融通行为进行规范,尚未上升到国家层面,法律效力较低,一旦出现问题时,只能通过《合同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一些零散的法律规定去打击,主要采取以行政管理为主线、刑法为辅线的解决办法,针对性不强并且缺乏操作性,难以有效打击和制约民间金融运作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部分扰乱金融市场的民间金融的发展,给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民间金融要建立专门的法律规范,用于调节民间金融交易主体的活动,真正让民间金融活动做到有法可依。

2. 法律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

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民间金融的重要作用,对民间金融采取打压和抑制的态度,禁止一切形式的集资和各种名义融资。但是,我国各省份的地下金融却在各级行政、司法机关监管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据统计,绝大多数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转向从民间金融。随着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中越来越活跃、作用越

来越重要,其蕴藏的风险也逐渐显现。所以法律法规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有效的调整和规范,导致了有令不行、无法可治的情况,“法律提速”的呼声日益高涨。立法缺乏系统性,监管也仅依靠分散的政策和零散的法律法规,法律制度明显滞后于民间金融发展。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经常会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交易主体不能对民间金融行为做出合理的判断。因此,借贷双方不仅不能较好的遵守朝令夕改的法律,还会加大民间金融的风险。同时,民间金融法律法规的滞后性还表现在行为的界定模糊,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民间金融法律法规,法律的边界不能确定,客观上使得民间金融常常游走在“非法”的边界上,严重阻碍了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3. 法律制度存在不合理和片面性

民间金融在演化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基本采取“打压”的措施。一旦民间金融行为出现了风险,现行法规提供不足,相关规定无法参照,政府部门在处理民间金融纠纷时,主要依据“未经批准”这个标准。然而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政府基于自身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对民间金融更多采取的是打压、取缔的政策,而忽略了市场的合理需求,凸显了我国现行法律的不合理性。所以国家在民间金融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客观上造成合理的民间金融行为受到打压,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即便现在已认识到民间金融的优势及积极作用,但是在立法的层面上,我们似乎更关注其危害金融和社会稳定等弊端,从而在立法时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民间金融。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民间金融活动,充分肯定和认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民间金融;坚决打击阻碍社会发展的违法民间金融活动;积极引导成熟的民间金融机构向中小银行转制。而在我国关于民间金融的法规与办法中,“打击”、“取缔”这样的字眼似乎更加常见。但近年来随着政府和社会逐渐认识到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对民间金融的引导和支持力度逐渐增强,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法律态度上都有了缓和,但整个法律制度的片面问题依然存在,仍需改进完善。

4. 法律监管缺位

一直以来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律监管主体不明。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由中央银行、银监会、地方金融办(局)等机构协调监管,存在监管重复和某些领域监管疏漏的问题;二是对民间融资的资格、信用状况、法律制约和惩处的措施及力度都没有规定。目前法律法规只对民间金融的利率做出了一些限制(即民间金融的利率不能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却没有对民间融资成立应该具有的资格以及它的信用状况做出规定。另外,我国法律对民间融资的制约措施也不完善,打击力度不当。这就使那些处于地下运营状态的民间融资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从事非法的信贷业务,甚至和黑社会犯罪相结合。

三、加快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

1. 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首先,要明确民间金融合法的法律地位,在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界定民间金融的合法边界,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合法的民间金融,缓解社会融资难的问题;对于非法的民间金融,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其次,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一些具备一定资金实力且能依法经营的民间金融机构,允许其在适当的时间转化为合法民间机构,对其加强法律监管,让民间资本以适当方式进入地方金融机构,可以更广泛地利用民间资本,引导广大中小企业依法筹集资金。

2. 重视法律规范和法律运用

金融交易活动与法律密切相关。从市场准入到业务运营,从传统的存贷业务到金融制度创新,从日常的风险管理到“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都涉及法律问题,而且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每项金融和金融活动的法律规范就越明确。只有重视法律规范和法律运用,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才有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法律框架用来规范各种金融运作,但能否有效发挥法律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法律能否得到正确运用。因此,我们要大力宣传金融法律知识,增强居民的金融法治意识,通过对金融业务、金融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普及,提高利用金融手段筹措资金的本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金融业务,自觉维护金融秩序,不断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知法、守法、用法,创造良好的金融秩序;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依

法行政,维护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系统干部和金融从业人员要金融法律知识和金融法治观念作为应当具备的重要素质,并纳入考核晋升的体系中。在增强金融法治意识的进程中,全社会要重视信用观念的建立,要加强金融活动参与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合法投资观念,从而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尽快制定专门法律

要实行真正有效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所以民间金融法律风险立足点在于用法律来管理风险。而我国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缺乏有效的、系统性法律规定,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只是零散地出现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比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取缔办法》以及《贷款通则》等都有所涉及。我国除温州外,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专门颁布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管理主要依靠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或地方性的文件、规章等。因此,应尽快制定民间金融行为专门性的法律,把民间金融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使民间金融活动有法可依,根据法规成立民间金融组织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法律保护和扶持民间金融机构。同时,通过法律的规定细化民间金融行为中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保证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因此,为了规范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徐州市目前虽然没有出台民间金融的法规,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这类民间金融机构已有了行政性规范。

4. 加强法律监管

(1)明确监管主体。对于民间金融,政府应该考虑到的是整个国家的金融情况,对于此类活动在管理上应该有所加强,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那么,首先是对于民间金融市场应该逐步的完善,对于相关融资应该密切的关注,对于活动信息内容应该搜集起来。在当前国内的一些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中对于地方民间金融相关监测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同时还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专题活动监测,为民间融资的相关内容以及趋势提供一些有用信息。对于金融监管部门,在监测方面上应该进一步加强管理,监测网点也应该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样民间金融就会对于融资的相关信息比较了解,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对于民间

金融相关风险应该做好预警管理,在金融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应该有备用的应急方案,那么这样在风险发生时才能比较及时、高效、有序的进行处理,最大程度的降低经济损失。对于民间金融,要想在管理上比较有效,那么风险预警机制应该建立起来并且逐步完善,同时政府应该及时的给予民众风险提示,当然还需要有针对风险的应对建议。对于行业中也应该有比较好的自律监管,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较好的让监管效果发挥到极致,既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民间金融做好管理和指导,又发挥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把自律和他律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2)强化司法。除了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还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司法监管。仅依靠政府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监管,收效是有限的,防范民间金融风险和纠纷可以依靠行政力量得以解决,但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则需要司法部门的配合,从而使得民间金融的发展更加稳定。

(3)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刑法是国家管控社会生活的最严厉的法律规范,其介入经济生活和金融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限度,不能侵占民事、行政和经济法律本应发挥作用的空间。鉴于我国《刑法》主要通过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来介入民间金融,如若对这两个犯罪的构成进行合理且有效的限定,即可正确地把握刑法介入民间金融的空间。因此,要严格区分正当民间金融行为与非法集资等不正当民间金融行为,防止民间金融转化为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对于打着民间金融的幌子从事非法金融传销、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同时,要加强和改进金融犯罪侦查工作,建立民间金融大案要案督办制度,开展民间金融风险提示,充分发挥公安金融犯罪侦查在打击民间金融领域犯罪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逐步完善民间金融机构与业务的刑事法保护制度。

[参 考 文 献]

- [1]朱振球,唐雅琴,熊峻柯.民间融资的快速发展与生存空间:对湖南益阳的调查与思考[J].武汉金融,2006(5).

(责任编辑 光 翟)

建国初期“斯大林模式”下我国工业化战略问题的思考

时 攀

(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 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换取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全面实施。在快速迈上工业化道路的同时,这一模式却在不断用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下,失去了时效性,并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

[关键词] 建国初期; 斯大林模式; 工业化战略; 资本积累; 未满足需求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37-04

关于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战略问题的思考,国内学者研究成果颇丰,且层面和视角多有不同,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试图以“斯大林模式”^①作为参照,谈谈自己对新中国早期工业化战略问题的思考,其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后发外生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

一、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问题是新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瓶颈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无论是从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还是从美国著名“现代化”学者罗斯托的“起飞”学说都必须有一个先行的积累阶段。^[1]学界在探讨苏联早期工业化问题时,曾对工业资本积累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里主要是结合中苏两国的“前现代”的社会特征,思考社会主义早期的工业化“资本积累”问题。

新中国和苏联的“前现代”阶段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两国工业化的真正启动的时间相差不大,俄国从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而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由于沙皇改革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加上工业化的资本需求主要来源于国外和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俄国工业化的水平相对

于同时的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处在后势,直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该国的工业化水平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相比差别不是很大。那么面对“农业”一直占据优势的国度,如何实现“重工业优先战略”的资本积累,领导人不约而同都把目光转向传统经济,即加强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使农业、农民所创造的剩余充分转移到工业上去。

新中国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与工业化起步的原始资金投入的要求甚远,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问题已日益凸显。当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虽然发生了分歧,但就经济建设首先应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他们之间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内部是有共识的。从新中国的处境来看,人口多、底子薄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在所制定的“一五计划”中即时地反映出来。那么如何解决新中国走向工业化道路资本积累这一瓶颈问题?首先,我们换个思维从反面角度展开思考。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1954年就说:“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

[收稿日期] 2015-07-10

[作者简介] 时攀,男,安徽和县人,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① 所谓斯大林模式,这里主要是指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模式,即斯大林当政时期,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保障,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通过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完成资本积累,从而促使苏联快速步入工业社会的模式。

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2](P.200)}

陈云的这番讲话留给我们广泛的思考空间。首先,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与斯大林的看法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其次,陈云同志在工业化问题上加入了“计划”因素成分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依靠自然调节,能够使产业结构平衡发展,这实质上是突出强调了市场和价值规律因素的调整作用。而我们实行的计划方式,短期内的人为控制下看上去平衡发展,但事实上并不利于长期性产业结构的比例调整。由此可见,陈云的工业化思想是在斯大林工业化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而“发展”主要指他不仅看到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业化战略的弊端,而且也看到了政府计划指令控制下对资本积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但是,陈云的独特见解在当时中央层面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其一,他质疑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二,工业化道路对具有“前现代”意识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一味追求“工业化”已经成为新中国经济生活中心的主题,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体制的保护和强制作用,所以,以牺牲农业代价来换取工业的全面胜利的这一做法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传统经济——农业层面,那么如何把农业纳入计划体制模式下最终实现工业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土地产权关系的迅速转变,即农民土地私有转变为国家、集体土地所有,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是致使农业资本向工业化资本积累转移的主要途径。1950年,中央政府在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章程中明确提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可到了1953年的农业改造,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生产方式。这样,在中国具有几千年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突然被彻底废除,农民对此举的适应性很慢,甚至对中央政府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进而导致农业生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国家通过土地所

有权的变更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改造,农业的生产资料和剩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支配,这就为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料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所以说,对农业实现国家控制必须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得以实现,也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才能够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二、“未满足需求”与工业化路线的对立

“未满足需求”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它指的是长期畸形的生产结构导致了物质的严重匮乏,商品与食品供应的严重短缺,对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即使有货币也买不到东西,从而造成黑市的猖獗。学界在谈到苏联“农业危机与工业化思想战略对立”的问题时,曾对计划经济模式下如何处理和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问题进行过分析,但多是从“工业立国”的角度来思考的。随着“重工业优先战略”不断地深入开展,将“优先”变成了压倒一切、取代一切,而且政府又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优先战略”给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起来。

新中国同样也是“重工业优先战略”执行的牺牲者。由于“优先战略”实施导致了农业基础地位的薄弱,从战略的一开始就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但是这一政策所能解决的仅是短期内供求比例关系的失衡现象。1954年6月陈云同志指出:“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紧张的。”1955年若干省份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不少地方出现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它食品的现象”。在1956年八次会议发言中,各省的领导人纷纷再次反映农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如杨尚奎反映江西因公粮负担过重,“以至引起了某些群众的不满,并影响到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3](PP.668-741)}。此外,轻工业也常因农业歉收而开工不足,造成日常生活品的严重短缺,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以说,“未满足需求”经济现象的出现深层次反映了新中国初期的“优先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长期执行这一战略方针,势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进一步增加。正因为一五战略过程中种种经济问题的不断暴露,中央政府才确立重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举措。

其实笔者认为,一种工业化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阶段性的和时效性的。“政治权威”下的工业化模式虽然不那么“先进”,不那么“高级”,但它在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处境确实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优先战略’则是一个弱势国家自我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4]。我们观察后面的历史,选择后来的转型(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及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因为前面的失败而转型,而是因为以前的模式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也就是说,政治权威下的工业化模式是基于一时一地的、过渡的模式,过了那个时段,它就失效了,需要转型,向比较“普世的”或更高阶段的工业化模式过渡。目前对于什么是“普世的”或更高阶段的工业化模式还有争论,但我认为至少有几个要素还是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即法治、民主机制(分权与制衡)、市场机制、国家宏观调控。现在对法治和民主机制的价值没有怀疑,只是对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互相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工业化不能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说,工业化有它自身阶段的理想模式,我们不能因为它后期阶段所出现的负面性和失效性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三、斯大林模式——历史成就还是历史失误?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论苏联时曾有这段精辟的话:“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了完成这项使命,第一的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一个由苏维埃制度出发的共产主义,基本上便成为一个改造落后国家的大业。如此权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展资本主义世界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苏联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联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国家统筹、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

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适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5](PP.565-566)}从霍氏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通过集权手段实现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崛起不愧为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转型的一种良方。那么,斯大林模式究竟是历史成就还是历史失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历程去追求一种理想和完美的社会模式,这就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要做出许多无谓的牺牲。不难看出,历史最终给我们的答复还是把“斯大林模式”送进了人类改革失败的坟墓,这也正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留给我们思考问题空间的魅力所在。

首先,中国是以农村经济结构为核心的主体,而小农经济和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率长期处于极低的水平。农业的落后和领导人对工业的强烈渴望,势必造成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进而出现了政治结构的无序状态,最终形成了国家内部工业与农业的严重对抗。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原则和框架内做出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留给我们的一个更为畸形的经济产业结构,现代化最终转向了反现代化的途径。^①

其次,不能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变革,当作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要遵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不能以“精神变物质”的原则来推动国家的改革步伐。建国以后的十多年间,我们采取的一直是“赶超型”特征的工业化战略,各种人为意识形态的措施给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带来了消极影响。譬如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模式、“大跃进战略”等等都是脱离中国国情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意识决定论发展到一个从来未有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的事实,都说明了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促进生产力发展,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生产

^① 所谓“反现代化”,即企图通过经济改革,增强实力来抵制内外压力,以维护其原来无序的社会体制。这种“原来无序的社会体制”并不就是反动的社会体制,而是力求保护原不利于现代化进程的体制。譬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以建立一个能够促进社会自我发展的协同动力是现代化的精髓。我们如果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的多元化等还被当作社会发展的障碍而被彻底清除,那么实现工业化只能走向相反的道路:搞计划经济、集权政治、一元文化明显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特征。

力的发展。

第三,应充分利用儒学文化圈下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科学发展而服务。“现代化”、“工业化”这类名词都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它们带有西方浓厚的文明色彩。过去很多学者认为儒家道德伦理和行为方式在现代化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发挥作用的核心是西方的经济伦理和运作方式,即市场经济模式。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一直持质疑的态度。众所周知,现代化最终确立的基本特征、内容条件固然相同,但各国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认知层面有很大的不同,这就使得我们采取现代化的途径方式必须尊重本国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新中国早期工业化所采取的是“斯大林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形成必然与苏联东正教文化思想及大国沙文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对这一模式移植之前不加以“中国化”,而是照搬照抄,它肯定与中国的文化道德体系有很大的出入,最终必然产生反方向的效果。譬如儒家的“和天下”和不事武功思想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格格不入,它可以发展为反对侵略扩张恃强凌弱、实行国家无论大小、和睦相处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提出必然对中国初期的外交战略和孤立局面的形势有所改变,那样我们也不必用失衡的“优先战略”来实现维护国防安全的需要;儒家传统的“平均”思想在

走出绝对平均主义的误区后,也可以为实现“公平的增长”做出贡献,这种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做法正好与“斯大林模式”中以牺牲农业的代价来换取工业全面胜利的举措相矛盾。由此可见,儒学文化圈下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来说,客观辩证地看待“斯大林模式”与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各种关系问题,不仅留给世人特有的政治理性和价值判断,颇富思考价值和启迪意义,而且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参考文献]

- [1][美]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年谱(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4]黄翰鑫.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的宏观探析[J]. 赤峰学院学报,2010(7).
- [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下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光 翟)

梁启超新民史观及其对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启示

崔恒秀 韦茜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梁启超在“新民”思想的影响之下批判旧史学,产生了新的新民史观。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之中也渗透了他的新民史观。他的观念以及主张对当今历史学科公民教育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 梁启超; 新民史观; 历史学科; 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41-04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在探索振兴国家的道路上提出了“新民”一说。他同时作为教育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奠基人,其史学观念以及历史教育主张中也体现出其“新民”思想。本文试就梁启超的新民史观及其历史教育主张作初步的探讨,并浅析其主张对当今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启示。

一、梁启超的新民史观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旧史学存在“四弊二病”,指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P.302)}。由此带来读者读不懂史书以及读完史学作品后毫无感触等恶劣后果。他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在原来批判旧史学“四弊二病”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旧史学的缺点:第一,历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少数特别阶级或者官阀阶级、智识阶级。梁启超指出旧史学带有贵族性,它着眼于贵族统治阶级或者是好古绩学的专门之士,忽视甚至厌忌为一般民众服务。这种带有贵族性的历史学带来的后果就是“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2](P.28)}。旧史学并非要开启民智、民德、民力,而是要进行“臣民”甚至“奴性”教育。第二,历史学以死人为本位。

梁启超针对旧史学花费大力气探讨早已作古的死人的言行这一现象提出批判,他进一步追问“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费天地间无限廉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者为”^{[2](P.29)}。他批判旧史学为史言史的弊端,这种历史学仅仅关注死人的是非功过,全然不顾史学对后人的教化功能。第三,历史学范围界定不明晰。旧史学内容庞杂琐碎,读者“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1](PP.300-301)}。第四,历史学的主观色彩太浓。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的学问大多主观色彩浓重,不注意客观真实性。史家往往不愿意求得客观公正的历史,总要为历史学加以“明道”、“经世”的目的,但是在实现这些目的时候会无意甚至故意曲解历史、混淆史实。第五,语言简单不生动。梁启超批判旧史学语言简短、没有生机,“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1](P.301)}。这种枯燥的史学并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2](P.152)},又如何培养民德?

梁启超针对历史学的弊端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意见。第一,历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他对历史学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新的定义,他指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

[收稿日期] 2015-08-11

[作者简介] 崔恒秀,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韦茜,女,江苏丹阳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P.1)},随后他于清华大学演讲时又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P.131)}。他将历史学从贵族之间拉回民间,非常重视历史学对一般民众的教化功能。他呼吁“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2](P.1)}。第二,历史学要以生人为本位。他批判传统史学以死人为本位,指出历史学要以生人为本位。虽然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它应该为活着的人服务,为活着的人民大众服务。“生人本位”的历史学应该关注历史上的全体社会而非某几个英雄人物,应该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而非仅仅关注“陈迹”,应该为现代人、为现代社会服务。第三,明确历史学的范围。历史学应该明确界定其范围,“以收缩为扩充也”^{[2](P.29)},只有明确了历史学的范围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研究。第四,追求客观的历史学。历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真实、客观。研究历史、学习历史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歪曲历史,否则这样的历史就不具备可信度也就不能发挥其借鉴和教育功能。第五,注重史实的联系性。梁启超认为历史上的事件不是凭空发生的,史实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第六,历史学要生动活泼。历史著述要“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2](P.152)},这样的历史学才生动,才能感染人。

二、梁启超新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育主张

虽然梁启超没有专门地、系统地论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但是从他各时期的著作或演讲之中可以归纳出他在历史教育方面的独特见解,而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主张中不难看出渗透其中的新民史观。

1. 新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育宗旨

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2](P.28)},旧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1](P.304)},因而他主张历史教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1](P.304)}。梁启超认为历史学科在国民素质的培养中担任重要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P.74)}“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

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1](P.298)}。他主张历史教育“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1](P.304)},要培养国民的爱国心。

2. 新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育内容

梁启超在新民史观的驱动之下,对历史教育内容进行了调整。虽然梁启超没有如愿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但是他对于历史教科书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批判当时教科书完全属于政治史,对于社会和文化史的介绍过于简略而且不连贯。这样的教科书不但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学生受国史教育完了之后,于先民之作业全不能得明确的印象,则对于祖国不能发生深厚的情爱”、“学生学之,徒增长保守性或其他恶德”^{[2](P.2)}。梁启超在1922年表示要从两方面改造教科书:一是文化史代替政治史,二是纵断代史代替横断代史。他把纵断代史分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六部,并指出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要占教科书的一半。他改造历史教材的出发点就在于要革除原来教材不利于培养学生公民素养的弊端而实现“新民”的目标。

梁启超也注重外国史的教育。他指出“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3](P.26)},他认为要调和中西以“新民”。学习西方的历史是“采补其所本无”的方法之一。他通过西方国家的历史来改造国民的思想观念。例如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开篇中指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则吾中国之杰出焉矣”^{[4](P.593)}。此外,他还通过殖民地国家的历史来警示国民,避免重蹈覆辙,“顾我不自哀而哀人耶,人将哀我”^{[4](P.858)}。

3. 新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育方法

梁启超在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采用札记批答法,“除教授这些学术外,学生须预两本劄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5](P.1307)}。在教学过程中,他还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动,“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班水平线的人才则可,要想造就特别的人才,是难能的”^{[6](P.919)}。他鼓励学生自由主动探讨问题并辨正教师错误的地方。梁启超将历史教育视为培养国民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并不是说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个性的国民。他指出“国民教育于国家有益,其结果则消灭个性,而学科而束缚,不能使脑发达,人格智识,亦日见低下,此宜施以个性教

育”^{[6](P.920)}。从梁启超的历史教学方法可以看出他以学生为中心、自由平等的精神。

三、梁启超的新民史观对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几点启示

梁启超将学校教育视为“新民”的主要途径，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也主要着眼于学校教育，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他的新民史观及教育主张对当今学校历史学科公民教育问题的启示。

1. 公民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

梁启超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历史教育在培养公民素养和爱国心等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倘若中小学教育里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6](P.625)}。

我国没有单独设置公民课程，因此公民教育要渗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渗透于各科教育之中。“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公民意识、引导公民行为，造就良好公民的教育”^{[3](P.4)}。“公民教育至少需要四个核心要素：学会关于民主国家中民主和公民角色的知识；体验或实践民主；作为民主参与能力根基的人文精神；发展品格，尤其是道德品格”^{[7](P.43)}。历史学科以其丰富的内容展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人物、影响，而这一过程也就是人类求生存、求民主、求发展的过程。学习历史的过程就是学会民主国家中民主和公民角色的知识以及体验或实践民主的过程。人是历史的主体，因此历史教育的内容体现出人文精神，杰出历史人物的品格在公民的道德教育中起到重要的借鉴和榜样作用。无论是历史教育的内容还是历史学习的方法都体现出历史教育的公民性。“历史教育的公民性，就在它能够给予百姓应有的使用公民权的知识和技能，利用历史知识人们可以清楚、准确、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利用历史知识人们运用自我的语言解释他自己理解的历史”^{[8](P.102)}。

2. 实现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方法

首先，梁启超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1](P.438)}。历史课堂可以让学生自由发表不同的观点，因此要转变历史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主体。如果课堂本身都无法做到以人为本，营造民主和谐的环境让学生主动参与，又怎么培养

学生的公民意识与能力呢？

教育活动的主体是人，教育是一种人对人的活动，教师的基本素养之一就是要做到“目中有人”，所谓“目中有人”就是要求在教育活动中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人文科学，不同于数学、物理等学科，它要求学生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之上结合价值论和审美论观点，发现史实的价值并受其熏陶和影响。历史学科要求学生主动探究问题，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历史史实所传递的公民意识、素养才能内化至学生心灵，公民所具备的能力在这一主动参与探究、讨论的活动中才得以培养。但是，如果历史学科教育的过程中，仍然是教师的“一言堂”，教师具有绝对的不可撼动的“尊严”，学生唯唯诺诺，不敢阐释自己的观点想法。长此以往，学生就很难形成现代公民所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素养和实现其公民价值的能力。

其次，梁启超主张对于历史教育内容进行挖掘。梁启超对旧的历史教材提出批评，旧的历史教材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更不能养成他们健全人格，并提出了自己对历史教材的见解。因此，要根据历史教育的功能和学生的身心特点挖掘历史教育内容。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学科并非是要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历史专业的学生，因此历史教育的内容就不应该事无巨细地介绍中外所有史实，而是要精选有益的教育内容。教师要挖掘历史学科中丰富多彩的公民教育素材，实现其公民教育的功能。例如，中国古代史的内容要让学生感受到中国辉煌灿烂的文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则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爱国心；外国史则要精选教育内容培养学生广博的世界公民意识。挖掘历史学科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就是要思考历史知识的呈现方式。学生所学习的历史一般指狭义的历史学，即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运动过程。也就是说学生所学习的历史是过去的人类所创造的活生生的历史，那么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历史学科应该是生动有趣的。历史学本身就是故事，历史课应该是生动活泼的，而不是受制于条条框框的、生硬死板的。历史学科应该是以生动活泼的史实、故事的形式来实现其公民教育的目的。

最后，梁启超强调公民教育要避免强硬灌输。灌输的方式一直是德育的痼疾^{[8](P.102)}，同样的也是公民教育的痼疾。历史教育容易让教师形成误

解,即历史知识必须通过教师外在灌输才能进学生的脑子,学生在学习之前对历史知识一无所知。^[9]教师习惯于将历史知识和历史史实中蕴含的公民教育内容一股脑全部灌输给学生,但是公民意识、公民在社会中有效发挥个人功能的能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要公民自己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之中主动生成的。公民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公民教育的内容,这种不顾学生感受、利益的强硬灌输方式本身就是反公民教育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知识本位”的教育方式,而要时刻注意应该“学生本位”。

3. 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指出“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4](P.682)}。由此可见,公民基本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历史学科首先通过史实的传授来传递相应的公民知识和观念,培养现代公民必须的文化素养。历史新课标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P.4)}。

其次,历史教育在培养公民目标时的侧重点与其他学科不同。政治学科的公民教育更侧重于“法”的方面,历史学科的公民教育不仅仅培养参与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爱国主义意识、民主意识等在内的政治教育,由于其综合性的特点更侧重于从整体上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

历史学科侧重于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梁启超非常注重历史学对国民道德的熏陶,当今历史学科同样要注重其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历史学教育不能单纯地“为学问而学问”,仅仅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思考,这些知识应该如何为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服务。历史学科应该发挥其学科优势,利用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嘉言懿行感染、熏陶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

此外,历史学科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历史学科的教育内容不仅仅包括中国史还涵盖世界史,新课标规定通过学习历史学科“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10](P.4)}。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

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一趋势需要公民具有世界意识,尊重和不同民族、国家的多元化文化,在世界意识之下保持正确的国家观念。历史学科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意识。

历史教育在传递公民知识、唤起公民意识的基础之上还要培养能力,“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合格的公民,拥有了权利而没有文化,且没有能力使用它”^[11]。历史教育要让学生在认知过去的基础上能更好地认知当今社会。此外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还要培养合作能力、参与能力、分析能力等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活动所需的能力。

梁启超的新民史观有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片面夸大了旧史学的不足,新民史学观念具有不完善和反复性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所提出的新民史学观念、历史教育观念和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易鑫鼎. 梁启超选集(上卷)[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长沙:岳麓书社,2009.
-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 易鑫鼎. 梁启超选集(下卷)[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5] 夏晓红.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6] 夏晓红.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7] 杨福祿.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公民教育问题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 [8] 王啸.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民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 [9] 赵亚夫. 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兼论历史课程标准的功能[J]. 课程·教材·教法,2004(3).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11] 赵亚夫. 公民教育:新时期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续)[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5).

(责任编辑 光 翟)

1927—1937年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状况初探

吴 琼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民国时期,教师作为新兴职业群体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教师薪俸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高等学校教师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1927—1937年十年时期被誉为“黄金十年”,这十年中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状况较为良好,但教师之间薪俸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是教师学历、职称和科研能力差异的反映,更揭示了薪俸问题上存在着不合理性。

[关键词] 1927—1937年; 东吴大学; 教师群体; 薪俸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45-04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非常热门,尤其是对各著名大学校史的研究更是成为时下流行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对作为教育承载主体的教师在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却相对漠视。近年来,教师这一群体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并陆续有相关专著出版、论文发表。目前国内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研究成果主要有:吴民祥:《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1],田正平、高丽洁:《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2],庞海江:《近代大学教师群体透析》^[3],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4],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5],陈育红:《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6],等等。这些专著和论文大多倾向于对国立大学进行研究,多以全国大学概况为研究重点,对个例的研究甚少关注。本文旨在以东吴大学为个例分析研究近代私立大学教师薪俸的基本状况。

一、近代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概述

19世纪中期国内有识之士致力于建立近代新式大学制度,改造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实现教育救国。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辖

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教员分专任、兼任二种,大学预科专任教员月薪140—240元;大学专任教员月薪180—280元;高等师范学校与专门学校专任教员月薪为160—250元。”^[7](pp. 780—783)“兼任教员之薪俸,按授课时间实数支給之,每小时薪俸如下:大学校兼任教员,每小时酌支3—5元;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大学预科之兼任教员每小时酌支2—4元;凡外国教员之薪俸及授课时间,别以约定之”^[7]。该规程的颁布标志着北洋政府从制度上规定了大学教师的薪俸标准。但此规程关于大学教员薪俸的规定较为粗略,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进一步颁布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俸薪规程》,该规程对教员的任用与薪俸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进一步完善大学教员薪俸条例。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于1927年9月颁布了《大学教员薪俸表》(见表1),该薪俸表成为国民政府前十年各大学制定教师薪俸的指导性文件。该条例将大学教师薪俸分为四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十二级。

此后,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日渐成熟,关于大学教师薪俸的规定也日趋完善。

[收稿日期] 2015-07-20

[作者简介] 吴 琼,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表1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员薪俸表(单位:元)^[8]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一级	500	340	260	180
二级	450	320	240	160
三级	400	300	220	140

二、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简况

东吴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管辖之下的私立大

表2 1937年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教师薪俸表^[1]

院系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别	专任或兼任	月薪(元)
文学院	凌景琰	男	本大学学士,燕京大学文科硕士	教授	专任	105
	冯成求	男	前清举人	讲师	兼任	65
	吴献书	男	本大学学士	教授	专任	150
	富德生(美)	男	美国范德州大学文学士,文科硕士	教授	专任	委员会付
	王遂徵	男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讲师	兼任	49
	钱长本	女	美国伦多府麦加女子大学文学学士,纽约社会 服务院研究员	教授	专任	120
政治系	黄廷英	男	本大学文学士,美国意大利诺大学文科硕士,约翰霍金 大学哲学博士	教授	专任	220
	王芷芳	男	本大学文学士,美国范德州大学文科硕士,芝加哥大学 研究员	教授	专任	210
	陈晓	男	本大学法科硕士,美国爱华大学法学博士	教授	专任	90
经济系	姚铁心	男	本大学法科硕士,美国范德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硕士	教授	专任	210
	刘思荣	男	金陵大学文学士,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员	助教	专任	35
社会系	朱约翰	男	本大学文学士,美国范德州大学文科硕士,哲学博士	教授	专任	220
	魏廉士(美)	男	美国佛吉尼亚学士,范德州大学文科硕士,哥伦比亚 大学女子教育博士	讲师	专任	委员会付
史地系	沈祖懋	男	本大学文学士	讲师	专任	90
	黄武东	男	美国加州大学教育硕士	教授	专任	200
教育系	威廉士夫人	女	美国偏都府麦加女子大学文学士,范德州大学文科硕士	讲师	专任	委员会付
	谭天凯	男	北京师大教育学学士,美国士丹福教育博士	教师	兼任	39
哲学系	文乃史(美)	男	美国范德州大学文学士	教授	专任	委员会付
	赵震	男	圣约翰大学文学士	讲师	专任	90
体育系	冯家生	男	沪江大学文学士	讲师	专任	165
	李怀蓼	女	金陵女子文理与体育专修科毕业	讲师	专任	65

自表2中可以看出东吴大学教师薪俸普遍低于国民政府教员薪俸标准,时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杨永清教授每月薪俸才300元^[9],根据政府规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其薪俸才达到三级副教授的

学,其教师的薪俸大多以国民政府颁布的教师薪俸条例为标准,然鉴于实际情况各校在教师薪俸制定上有其不同之处,东吴大学教师薪俸亦是如此。关于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的具体状况此处列举东吴大学1937年文理学院部分教师的薪俸状况,有部分教师为兼任,薪俸由法学院支付,图表中不详细列出。

薪俸水平。东吴大学在注册立案之前为教会学校,监理会每年都会发放津贴给东吴大学用于学校运作,1929年8月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后,由教会学校转变为私立学校,教会不再予以

经费资助,学校资金面临巨大压力。虽经文乃史等人多方努力之下,教会同意给予部分津贴,但是补助津贴甚少,“1930年,西教会补助6000元”^{[10](P.122)}。除监理会津贴外,学校就需要广开财路,多方募捐筹款,“1931年创办人募捐3550美元、特别捐款(请创办人捐助)3000美元;1933年,设立人补助8000元;1934年,创办人补助7000元。”^[10]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私立大学的补助专款,东吴大学从教育部得到了10000元的资助。^[11]但是根据民国二十五年至民国二十七年的财政记录,东吴大学财政年年透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份至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份学校支出279026.08元,透支8827.33元^[12]。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份至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份支出85874.96元,透支15193.00元。^[12]虽经过多方筹款,甚至加收学费,开源节流,东吴大学依旧存在很大的财政赤字,在如此情况之下为保证学校正常运作,教师薪俸自然相对较低。

三、教师薪俸差异表现

东吴大学教师薪俸较低,且教师间薪俸待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完全是教师学历、职称和科研能力的反映,而是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合理性。

1. 中西差异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萌发时期中西国籍教师就存在薪酬“厚薄悬殊”的现象,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规定中国教习薪酬按中国已有之办法,每月支付8两银子,而外国教习每年支付1000两白银作为聘任薪酬,中外差异达到10倍之多。^[1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在制度层面对中外籍教师薪俸进行了规定,然而在实事层面,外国教师的最高薪俸和平均薪俸仍维持在较高水平。1936年教育部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外籍教师月薪,在大学外籍教师有444人,薪酬共计114197元,平均257元。月薪最高的是私立震旦大学,月薪1500元。^[14]东吴大学自然不会例外。

中外差异不仅表现在中外籍教师薪俸待遇上,还表现在留学生和本国生的薪俸待遇上。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条例规定“副教授须在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获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者……教授须为担任副教授两年以上,有特别成绩者。”^{[15](P.202)}教师职称与学历挂钩导致教育界出现一种现象:外国毕业的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一回国就可以做教授,

而本国毕业生一般只能做讲师,极不容易获得教授资格。教授与讲师之间的差别逐渐被转化为留学生和本国生的不同经历,而大学教师之间薪俸差异也开始表现为留学生和本国生的差异。1927年—1937年在东吴任教的教师中,除去外籍教师,没有留学经历的仅有几人而已。例如:冯成求,前清举人,在东吴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和文学概论等,职称为讲师,月薪也就65元,而黄廷英和吴芷芳等人是留学美国回校任教的,均有教授职称,月薪分别为220元和210元^[9],留学与未留学教师在薪俸上相差三倍有余,这种薪俸的差异体现出高校薪俸分配的极不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传统科目的传授。

2. 教师专任和兼任差异

民国时期教师薪俸低于国家标准,为满足读书、科研、藏书等需要,大学教师兼任现象在国立、私立大学中普遍存在着,此处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东吴大学法学院创办于1915年,发展至1920年除教务长为专任教师外,其他教师均由上海当地法官或律师兼任。^{[16](P.74)}学校以开支费的名义付给这些兼职教师每小时2元。^[16]1920—1927年,法学院逐步建立起法律专任教师队伍,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为了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很多教师除本学院的课程之外,还兼任其他学院的课程,这些留学教师,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在其他学院开设学科,一人可以教授多门学科,这样一方面使得自己学术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也缓解学校的经济压力。这些教师在兼课其他学院的同时不仅可以获得作为专任教师稳定的薪俸,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所以一般专任加兼课的老师收入都还算是中上层的,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满足自己科研、藏书的需要。而如果仅仅作为兼课教师的话,其收入自然不如专任教师。例如在文学院兼职的教师王遂徽,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教授法文,每月49元。^[9]相较于上文提到的吴芷芳等人两百多元的收入,仅仅作为兼任教师的教师薪俸还是比较低的。

四、东吴大学与社会同期大学之比较

下文笔者就将东吴大学教师的薪俸与同期的国立、私立大学做比较,从比较中具体得出东吴大学教师的薪俸水平。

私立大学以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例。“南开大学教授的月薪基本维持在180—300元之

间”^{[17](P.89)}，“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每月薪俸 200 元，此外也无其他津贴；专任教授每个月薪水为 200 元，且一年只支 11 个月的薪水。”^{[18](P.134)} 两所私立高校教师的薪俸均远低于《大学教员薪俸表》所定标准。而国立大学，此处我们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例。“1931 至 1934 年间北京大学教授每月平均薪俸高达 400 元；副教授每月平均薪俸在 280—300 元之间，而有些副教授薪俸最高可达 360 元每月；讲师每月平均薪俸在 160—250 之间；兼任讲师平均月薪在 70—80 元之间”^[19]。1932 年清华大学制定实施《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其中对教师薪俸予以规定：“清华大学教授月薪为 300—400 元，最高可达 500 元；专任讲师为 160—280 元；教员为 120—200 元；助教为 80—140 元。”^[19]

从例举的私立、国立大学教师薪俸中可以看出，私立学校教师薪远低于国立大学教师，与国民政府薪俸标准也有着一定的差距。当时东吴大学教授杨永清校长月薪才 300 元，其他教授最高月薪 220 元，有的兼课教授薪俸也只有 30—40 元，东吴大学的校长也就只有清华、北大副教授的月薪收入，而教授则是更不如北平地区教授的高收入了。考虑到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区物价较北平地区高 10%—15% 左右，所以在与同期国立大学相比，东吴大学教师收入显得有些拮据，而与同期私立学校相比，除个别私立学校个别教授高收入外，一般教师薪俸在同职称之间保持在大致相持平的状态，且均低于国民政府规定的标准。

不过，就苏州本地而言，将大学教师的薪俸水平与中小学教师比较，还是可以看出大学教师所具有的优势的。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在 1933 年颁布的《小学规程》，小学教员的薪俸标准多按学校所在地个人生活费的 2 倍以上来计算。当时苏州城区小学初小一般在 20—40 元之间，高小一般在 35—45 元之间。^{[20](P.646)} 当时苏州中学教师工资以东吴附中为例，教师薪俸在 15—150 元之间，一般教师也就几十元，达到百元的人数较少，苏州在 1931—1937 年，米价约为 0.06 元/市斤^{[20](P.646)}。按现在米价折合人民币，当时大学教师的一般薪俸按现在工资计算也有个八九千接近一万了。由此看来，东吴大学教师不论是教授还是普通讲师，他们的收入在当时看来还是颇高的。

本文以东吴大学为个例研究私立大学教师薪俸，旨在阐述国民政府初年东吴大学教师作为社

会精英的收入状况，希望能对现今尚在进行高等教育人事改革的大学有所参考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吴民祥. 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 (1898 - 1949)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 [2] 田正平.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 - 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 [3] 庞海江. 近代大学教师群体透析 [D]. 吉林大学, 2006.
- [4] 马嘶. 百年冷暖: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5] 陈明远.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 [6] 陈育红. 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 [J]. 国民档案, 2005(1).
- [7]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8] 大学教员薪俸表 [J]. 大学院公报, 1928(1).
- [9] 东吴大学全校简报 (校董会章程) [Z]. 苏州大学档案馆藏. 3 永 12.
- [10] 王国平. 东吴大学简史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第五编, 高等教育) [Z]. 台北: 台北宗青出版社, 1991.
- [12]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决算表 [Z]. 苏州: 苏州大学档案馆藏. 3 永 67.
- [13] 商丽洁. 晚清中国教习在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薪酬 [J]. 近代史研究, 2007(1).
- [14] 全国高校外籍教职员与月俸 [J]. 教育杂志, 2000(9).
- [15] 蔡鸿源. 民国法规集成 (第五十九卷) [C].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 [16] 文乃史. 东吴大学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
- [17]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 (1919 - 1949)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 复旦大学志 (1905 - 1949)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19] 陈育红. 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 [J]. 国民档案, 2005(1).
- [20]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苏州市志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光 翟)

南京大屠杀前后《东京朝日新闻》的宣传策略探析^{*}

赵佳鹏 刘继忠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东京朝日新闻》作为二战时日本最大的报纸,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报道代表了日本报业法西斯化后典型的宣传策略。该报虽处在日本法西斯的强力控制下,其报道宣传中并没有被生硬支配的痕迹,反而在敌我双方战事战力、官民形象、战场外交、南京沦陷等方面的报道中做到了自觉区别,体现了该报与日本法西斯势力自我趋同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 《东京朝日新闻》; 南京大屠杀; 宣传策略; 日本报业法西斯化

[中图分类号] K313.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7-0049-05

20世纪30年代,为吞并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将日本报业纳入战时体制,作为其“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报界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目前学界对日本报业法西斯化的研究,关注的多是体制机制等宏观问题,^①或以揭露日军暴行、构建历史记忆为中心,^②对于日本报业法西斯化后的宣传策略却鲜有论及。

《东京朝日新闻》作为当时日本最大的报纸^[1],该报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质疑政府的“强硬外交”,刊发过“重新考虑使用武力究竟有多大作用”的言论。九一八事变后,被迫屈服于军部的压力,转而全面支持战争^[2],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辩护人与鼓吹手。《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丛书第59册收录了1937年11月及12月间《东京

朝日新闻》关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的报道汇编^[3],基于此,本文以日本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中心,分析《东京朝日新闻》在该事件前后的宣传手段,借以管窥日本报业法西斯化后的宣传策略。

一、《东京朝日新闻》对“南京攻略战”报道的数据概况

在1937年11月13日至1938年1月2日51天中,《东京朝日新闻》上关于侵华战争的实际发稿天数只有43天,且均集中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时间段内^③。期间发稿总数342件,日均7.95件。值得注意的是,以日军占领南京一天后(即12月14日)为界,日均发稿量从之前的9.6件下降到仅有1.8件。《东京朝日新闻》在南京战役期间为日军大造声势、在南京沦陷后封锁掩盖日军暴行的

^{*}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项目编号: H11YJC860027)。

[收稿日期] 2015-04-18

[作者简介] 赵佳鹏,男,河南焦作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继忠,山东济宁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昆:《十五年事变与日本报纸》(日本研究,1991第2期)、陈力丹:《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于森:《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舆论动员机制分析——起源、构建与社会基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孙继强:《论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的法西斯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第4期),等。

②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经盛鸿、开云:《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利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经盛鸿:《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日本新闻传媒对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战役的多次不实报道》(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等。

③ 分别为1937年12月22、23、25、27、28、29、31日及1938年1月1日。

意图通过控制稿件数量得到了贯彻。

稿件来源方面,这一时期该报纸上每一条新闻的电头大致包括:同盟社、特派员、(上海、纽约、伦敦)特电、大本营陆军部、大本营海军部、本社前线通信本部等。据统计,报纸上不同来源的稿子

达到 518 条(一则新闻可能由多个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编辑而成),包括一句话的短消息,也包括一些战况发布、人物特写、长篇通讯,也有少量评论性质的言论。具体统计如表 1:

表 1 《东京朝日新闻》稿源统计(1937 年 11 月 13 日至 1938 年 1 月 2 日)

同盟社		特电			大本营		特派员	本社前线通信本部	未注明	总数
中国战场	纽约	上海	纽约	伦敦	陆军部	海军部				
232	5	116	9	2	18	5	67	55	9	518

可见,为了配合日军攻陷南京的宣传,《东京朝日新闻》调动各种资源以丰富自己的报道,新闻来源不可谓不丰富,但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稿件都要受到新闻统制法令的限制,经过军方的严格审查方能见诸报端。

二、《东京朝日新闻》的战时宣传策略

“南京攻略战”中,为了在国内作战争动员,《东京朝日新闻》利用各种手段美化侵略战争。通过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宣传策略。

1. 片面炫耀日军战力、贬损诋毁中国军队

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日军一路从上海沿京沪线^①向南京推进,一路从杭州湾登陆后北进,两面夹击中国守军,仅用一个月就兵临南京城下。在这半年内,当战争进程对日本有利时,战果的报道(公布)还是比较真实的。^{[4](P.65)}《东京朝日新闻》却过分强调日军的战斗胜利而贬损、嘲笑中国守军的战斗意志,甚至不乏“莫须有”的诋毁与诬陷。表现为:(1)只公布“敌军”伤亡人数。如在战报中只有“(中国守军)在此次战斗中伤亡军官 14 人、士兵 370 人”^{[3](P.176)}的记载,绝口不提己方损失。(2)在双方伤亡悬殊时做利于己方的对比报道。如“在 13 日的(白茆口)登陆战中,敌人遗弃的尸体约 400 具,俘虏敌官兵 250 人以上,而我军伤亡仅栗本少佐等约 30 人。”^{[3](P.12)}(3)突出日军“纪律严明”而中国军队军纪涣散。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中可见日本军官在向士兵宣扬“你们一定要遵守皇军严明的纪律,必须秋毫无犯。”^{[3](P.231)}但用在中国军队身上的几乎全是“掠夺”、“混乱”、

“内讧”等字眼。如“下关一带掠夺横行,看来这是支那军败退时常常出现的混乱局面,也是他们败退时的惯用伎俩。”^{[3](P.142)}甚至包括如“大概是敌人撤退时放了火,各村庄都燃起了大火”^{[3](P.14)}这样莫须有的恶意揣度。战争必然会有破坏,但日本媒体完全将其归咎于中国军队。不过从字里行间中仍可发现日军掠夺的事实,如“我军……全体将士整理背包,仅带了作为口粮的干面包和从附近农村弄来的生红薯,并在腰间塞上尽可能多的子弹。”^{[3](P.192)}这句虽意在表明日军战士的艰辛,但“从附近农村弄来的生红薯”等描写却暴露了日军掠夺中国老百姓财产的冰山一角。此外,报纸上还处处流露出对中国军队的嘲笑和讥讽,如“我方一点损失都没有,投下的 12 枚炸弹一枚也没有达到效果,真替敌机感到遗憾。”^{[3](P.34)}这样,民众从报纸上能看到的只有“日章旗”^②一次又一次“高高飘扬”,以及中国军队的狼狈不堪、军纪涣散的场面。

2. 对南京当局指手画脚、矫揉造作同下层民众的“亲善”

二战中日本举国上下一致的战争狂热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深深受到军国主义新闻统制政策下各种新闻媒体的思想麻痹的。宣传者为鼓动人民(对敌国)的仇恨,必须确保所有发出的信息都是在确立敌人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5](P.47)}以《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主流媒体更是“技高一筹”,不仅将战争罪责完全归于的中华民国的统治阶级,在极力展现南京当局“愚蠢”、“腐化”的同时,还以各种手段精心刻画日军对中国老百姓的

① 由于南京为当时首都,故称南京到上海间铁路为“京沪线”,即现在宁沪线。

② 日本国旗。

“怜悯”和“亲善”。

有讽刺南京当局外交政策的,如“江南战线我军大捷,九国公约会议^①也仅仅轻描淡写地发表了谴责日本的宣言就结束了……南京政府依然做着依靠外国的美梦。”^{[3](P.22)}有影射南京当局兵役沉重的,如“在秋高气爽的江苏平原上,正在收割稻子的是老人,这不禁让人想到难道支那军征兵都到这偏远的乡下来了?”^{[3](P.7)}更有肆意攻击、挑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如“(南京沦陷)不得不说是这全都是支那领导人的责任……国民政府煽动支那的民族主义,这只会招致千年之业毁于一旦的后果。”“要知道近代战争不仅仅依靠军事,寄希望于所谓的游击战术,照例只会陷入共产党的诡计之中。”^{[3](P.233)}更为可笑的是,《东京朝日新闻》上竟有抨击南京当局新闻检查制度的语句,如“(开战三个月来)如此惨重的损失由于南京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而被隐瞒了起来”^{[3](P.6)}等,似乎忘了自身就是被日本新闻检查机关严厉控制下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又充斥着各种日军“站在同文同种五亿民众的立场上”而“拯救”中国人民,普通老百姓“期盼”、“欢迎日本军”等荒诞不经的报道。例如,日军占领苏州后,《东京朝日新闻》特派员斋藤、平松等就拟定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新闻标题“苏州民众期待的人来了!两个月来重新开门富裕之家挂起写有‘欢迎日本军’的大日章旗欢迎”^{[3](P.60)}。次日,又刊发了一则反映4000名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苏州难民在留学生带领下“依靠皇军”并得到“帮助和保护”的新闻,并特意注明“这是一段与支那事变^②没有关系的佳话。”此外,报纸还有日军“保护中山陵”、“尊重难民区”甚至假惺惺“为南京白虎队^③的勇猛落泪”等报道。通过对南京当局和普通民众的两幅面孔,《东京朝日新闻》不仅试图使国内读者坚定其侵华战争的正义性,同时更妄图在中国民众中散布反爱国主义和反政府主义。

3. 借第三国人士中立口吻,断章取义服务于己方宣传

有时人们对舶来品的崇拜是盲目的,对新闻

产品也是这样。这一时期《东京朝日新闻》虽然绝大部分是依靠自身力量和同盟通讯社的渠道来实现其宣传的,但其似乎也懂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日本军部严厉的新闻统制政策下,人们偶尔从报纸上看到一些中日之外的第三国人士发表的对有利于日军的意见,似乎更坚定了“皇军必胜”的信念。例如,为了渲染日军进攻南京前城内的恐慌状况,该报曾如此拟定新闻标题:(1)南京陷入混乱(美国报纸报道)逃难人群绵延不绝南京处于绝望的恐慌状态。(2)南京已摇摇欲坠(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察)。^{[3](PP.27-28)}还通过歪曲《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的报道诬陷中国军队,通过引用外媒并“精心加工”,宣称“日本军的轰炸和炮击几乎仅限于军事设施,将这些损失加起来也不及支那军自行破坏所造成损失的1/10。”^{[3](P.171)}该报通过“外国方面的消息称”、“据在上海外国人的可靠消息”、“外国军事专家的观察”等手段,服务于自己的宣传目标,甚至有特意说明转载中国方面报纸的报道,但无疑都是片面的、有选择的。对西方记者和中国记者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通讯等,日方当局严禁日本媒体转载或刊登只言片语。^[6]

4. 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曲意逢迎,极力维护其与日本的“友好邦交”

在战争中,保持与盟友之间真诚友好的关系是形成坚固的对敌阵线的先决条件。虽然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初,英国、美国等日后组成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并未对日宣战,但也并非日本的盟友,但在日本自身利益出发,争取英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中立态度同样重要。这一时期,《东京朝日新闻》不断向英美等国传达“日本尊重并在尽力保护其在华财产和权益”的信息,有时措辞几近虚假和谄媚。如日军攻陷南京前夕,日本当局通过该报“向外国人发出避难劝告。”^{[3](P.155)}这一举动看似出于保护外国人的需要,但也不无它意,“其目的之一,就是防止第三国人士目睹日军即将在南京实施的战争暴行。”^[1]南京沦陷后,为宣扬“皇军纪律严明”,该报不断释放对外国人士的善意。如该报报道日军在“努力清剿”南京城内的败残兵的

^① 即布鲁塞尔会议。国联第十八届常会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1937年11月3日至24日,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② 日本对侵华战争的称呼。

^③ 指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

同时,“对 外国 权益,我 军 则 特 别 加 以 保 护。”^{[3](P.242)} 12 月 12 日 南 京 江 面 一 艘 美 国 炮 舰 被 日 军 炸 沉,次 日 该 报 引 用(日)海 军 次 官 的 谈 话,称“该 事 件 是 由 于 误 将 美 舰 当 作 支 那 轮 船”,并“深 感 遗 憾,我 海 军 将 抱 着 诚 意,妥 善 细 致 地 处 理 该 事 件。”^{[3](P.211)} 有 时 为 了 凸 显 日 军“对 外 国 权 益 特 别 的 保 护”,一 些 报 道 甚 至 露 出 曲 意 逢 迎 的 嘴 脸。如 11 月 30 日 日 本 海 军 扣 留 了 六 艘 悬 挂 外 国 国 旗 的 中 国 船 只,该 报 在 报 道 时 不 仅 蔑 称“悬 挂 第 三 国 国 旗 是 支 那 方 面 的 惯 用 伎 俩”,在“令 其 悬 挂 帝 国 国 旗”后,特 意 又 加 了 一 句“妥 善 保 管 第 三 国 国 旗。”并 称“帝 国 海 军 一 直 以 来 十 分 尊 重 作 为 第 三 国 的 外 国 国 旗。”通 过 诸 如 此 类 的 报 道,《东 京 朝 日 新 闻》妄 图 把 日 军 塑 造 成 一 个 保 护 外 国 在 华 利 益 者 的 形 象,以 争 取 外 国 的 支 持 并 美 化 战 争 的 侵 略 本 质。

5. 对日军将领上层人物的吹捧及对前线后方团结一致的宣传

武器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但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永远是人。对那些将战争视为巨人间战斗的为数众多的国民而言,对领袖的信心的宣传就是必不可少的了。^{[5](P.112)} 从这一时期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可以看到不少对上层人物的赞美和吹捧。如在南京保卫战白热化阶段,该报多次刊登“毫不畏惧的朝香宫殿下^①在炮火中视察”、“朝香宫殿下恩赐糕点”以致“在第一线附近看到朝香宫殿下英姿的将士们十分感动,斗志更加高昂。”^{[3](PP.190,194)} 同时,对日常性的工作或者不同寻常的工作的英勇完成的报道,能够强化赢得最终胜利的信心。来自战壕的报道还必须加上不那么戏剧化的关于整个国家在前线后方是如何在节约粮食、制造军需品以及救济工作方面团结一致的报道。^{[5](P.112)} 如南京沦陷后,该报又刊登了关于朝香宫的特写,称其“坚持在生活很不方便的战场,三餐也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当值班的下士官听到殿下说‘在战场上一切从简’时,感动地泣不成声。”^{[3](P.255)} 此外,该报也曾刊登过时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夫人“文子女士去关西^②各地的陆军医院探望伤病员”,并在归途中“直接来到红十字会,以一名女性志愿者报名当护

士”^{[3](P.1)} 的报道。通过这种宣传,《东京朝日新闻》描绘了一幅前线有“中流砥柱”般的将领亲自统帅、后方民众团结一致做前线后盾的画面,以维持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和必胜的信心。

6. 捏造占领下的南京“秩序恢复”景象,掩盖大屠杀暴行

日本媒体一切服务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取向在占领南京后达到了顶点。日军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陷南京并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由于日方在南京实行新闻封锁,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对南京进行采访和报道,^[7] 极力掩盖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民众从《东京朝日新闻》等报纸看到的,却是“秩序恢复”、“难民不断回城”等另一派景象。

南京陷落第二天,当《东京朝日新闻》的版面上还充斥着“各路齐头并进突入城内”、“到处都展开街巷战”、“猛烈炮击下关码头”等反映南京城内激烈战况的新闻的同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刊登“各条街道都飘扬着日章旗南京的秩序恢复”等荒谬的新闻了。甚至宣称“从 14 日早上起,逃难的民众陆续回来了,其中还有开着车住在南京的外国人。”^{[3](P.224)} 然而实际上,且不说当时尚留在南京的难民和外国人都渴望赶紧逃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就算是有外国人想回到城中,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封锁南京的消息,日军“在阻挠外地的西方记者进入南京采访时毫不松动。”^[1] 紧接着,12 月 15 日该报又刊登标题为“南京市内秩序已恢复逃难民众归来商店开张”^{[3](P.234)} 的假新闻,配合宣传松井石根 14 日发布的“安民告示”。虽然占领南京后日本媒体上关于南京的新闻大大减少,但一有机会便会忙不迭地捏造有关“治安恢复”、“难民回城”等消息。

与文字报道相比欺骗性更大的是,该报还连续多日以大量的照片报道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祥和”景象。12 月 14 日,《东京朝日新闻》第一次刊登了反映日军占领下南京的专题照片。在题为“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的大幅照片中,抱着孩子的妇女等人在日军士兵的引导下从防空洞中爬出来并对日军表示“感激”。此后,12 月 17、18、20、22、25 和 30 日,该报又分六次刊登专题

① 即朝香宫鸠彦彦,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日本陆军大将。在侵华战争中曾接替松井石根任上海派遣军司令(1937 年 12 月到任)。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因是皇族,战后逃脱了审判。

② 指日本本州岛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的近畿地方。

照片,选材范围包括中国伤病接受治疗、难民回城安居、中国理发师给日军士兵理发以及孩童围着日本士兵游戏等等。但这些照片显然是在诱骗背景下拍摄的,且当事人多为妇女、儿童、摊贩和俘虏等。^[7]然而在实行严厉新闻检查的日本报界,尚有更多的新闻摄影图片被盖上“不许可”的印记,难为外界知晓。

正如1938年年初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Timperley所说:“日本报纸想把南京粉饰成太平安静的地方。”^[7]但即使如此,如果细细揣摩依然可以从《东京朝日新闻》的新闻报道中发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蛛丝马迹。日军进城后,该报多次在新闻中透露俘获了大量中国士兵,如(两角部队)“在江岸俘虏14777名士兵”^{[3](pp.241,243)},但面对这前所未有的俘虏人数,“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吃饭问题,就连我方部队也要在当地找粮食,”因此“不知如何处理。”^{[3](p.246)}此后该报再也没有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战俘的报道。那么当时实际情况如何呢?或许1937年12月17日《东京朝日新闻·福岛版》的一种论调更为可能被日军采纳:“干脆一个不剩地赶尽杀绝算了。”^[6]但这些蛛丝马迹在当时日本媒体的宣传主流中是极难为人所注意到的。

三、法西斯化后日本报业的战时宣传策略

作为日本“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上日本报业处在法西斯势力的“控制”之下,但在业务操作层面看,报纸在战时宣传上是自觉而主动的,灵活的宣传策略的运用体现了报纸主持人与记者在思想意识层面同法西斯统治者的自我趋

同。以《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业虽处在法西斯化的媒介生态中,但其报道中很少有对外界的强制灌输。除了其惯有的为煽动民众的战争狂热而鼓噪战役胜利、夸耀日本军力,日本报纸还把中国国内民众以及中日之外的第三国作为争取对象,并注意丰富自己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对第三国媒体的利用,手法可谓辛辣娴熟。日本报业这一时期宣传策略之灵活,甚至难以让人相信其脱胎于以“强迫性”和“控制力”著称的法西斯体制。日本报业战时宣传的策略诉求正在于此,它不是法西斯控制下的“宣传机器”,而是被植入法西斯基因、具有法西斯智能的“宣传机器人”。

[参考文献]

- [1]经盛鸿,开云.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运用[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 [2]张昆. 十五年事变与日本报纸[J]. 日本研究,1991(2).
- [3]张宪文.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9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4][日]内川芳美,新井直之. 日本新闻事业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 [5][美]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6]经盛鸿.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J]. 江苏社会科学,2008(3).
- [7]经盛鸿. 战时日本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掩盖与粉饰[J]. 史学月刊,2010(8).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的系统功能作用^{*}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文艺批评作为作家创作、作品价值评价及其推动文艺运行发展的评价机制,具有鲜明的评价取向与价值导向,源自真善美价值源,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体系与评价体系,既构成创作与批评双核驱动的文艺发展推动力,又构成批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自律性机制,凸显文艺批评的系统功能与整体作用的规律特点。

[关键词] 文艺批评; 评价机制; 系统功能; 价值源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54-05

文艺批评具有多重功能作用,包括确立文艺方向、发展目标、评价作品得失、引导作者创作、指导读者鉴赏、推动文艺传播、促进文艺交流、确立评价标准、优选经典精品、推进观念变革、推动理论更新、维护文艺规则、维持文艺秩序、引发社会影响等多重功能作用。这些功能作用都基于文艺批评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取向所确立的文艺导向,依据评价标准与原则,遵循文艺规律与批评规律,由此形成批评功能作用,产生批评价值意义,构成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因此,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是文艺批评最为重要的功能作用,也是其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其基础、核心与主导。更为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系统功能作用,构建文艺核心价值及其核心价值观。

一、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凸显文艺批评性质特征的功能作用

对于文艺批评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的认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文艺批评在文学实践中主要通过文艺评论形式以文艺评价方式表现,直接面对文艺现象及

其创作与作品,但并非仅仅就事论事,就作品评价作品,而且需要将作品放置在社会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审视,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文艺批评的艺术评价、思想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综合功能作用体现出来,由此拓展文艺批评的价值意义。毛泽东批评观及其对文艺批评认识具备这种大视野、大观念、大批评特点。他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功能作用,认为文艺批评功能作用不仅在于对文艺创作及其作品进行评价,而且也需要针对文艺现象进行评价,特别是针对文艺界存在问题及其一些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进行批评。毛泽东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提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1](P.869)}毛泽东首先是基于“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一思路将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来认识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界思想斗争及其一些错误与模糊认识,立足点是通过文艺批

^{*}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学批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63),201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BZW003),2013年广西“自治区‘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广西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2013B022)。

[收稿日期] 2015-09-14

[作者简介] 张利群,男,湖北黄冈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评展开文艺论争、文艺争鸣以及文艺思想问题辨析,以推动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教育与改造,端正对文艺性质方向的认识。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下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批评的“斗争”说也存在着将文艺批评政治化、工具化、绝对化的某些局限性,确实也在批评实践中出现一些偏差;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简单将文艺批评视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毛泽东在强化批评功能作用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批评特点。他认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但“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一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延安文坛状况及其文艺批评现状出现的问题,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尖锐指出因为批评缺位与失语必然导致文艺发展出现偏差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由此说明文艺批评具有引导文艺方向与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强调文艺批评特点及其复杂性与专门性。其“复杂”既在于当时革命斗争环境下政治与文艺、抗战与文艺、革命与文艺、阶级与文艺关系确实存在复杂性,又在于文艺批评应该是“文艺”的批评,应该区别于一般批评而具有“文艺”的批评特征。这是因为不仅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所具有的特点及其特殊性,而且在于针对文艺对象的批评也应该具有批评方式、方法、动机、效果等特点及其特殊性。也就是说,批评既应该充分考虑社会时代环境背景的复杂性,又应该尊重文艺规律特点及其特殊性与普通性所构成的复杂性。其“专门研究”在于文艺批评具有专业性与科学性,不能等同于其他专业以及一般性工作,因此文艺批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及其针对性研究。因为文艺批评不仅应该具备文艺专业知识理论基础及其批评素质与能力,而且应该具备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跨学科综合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感悟、审美感知、鉴赏经验等专业素质能力。因此,基于文艺批评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必须加强针对性的“专门研究”,才能解决“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这一问题,更好发挥文艺批评的功能作用。毛泽东还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枯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

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1](P.875)}由此可见,毛泽东既充分重视文艺批评工作,又没有将其作运动化、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简单化认识;既充分重视文艺批评在解决文艺界思想问题及其纠正一些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上的引导作用,又没有忽略文艺批评的复杂性与专门性,充分注意到文艺批评性质特征及其特殊性;既重视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在推动文艺良性健康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又没有忽略解决文艺批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既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及其文艺批评规律,又能够将其放置在社会时代历史大背景下拓展与深化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文艺及其批评发展到新时期,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2](P.220)}邓小平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调整和说明,对于准确理解毛泽东《讲话》精神及其正确认识文艺性质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也对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功能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讲话基于“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3]这不仅进一步揭示出文艺及其批评规律、特征与特殊性,而且也是对文艺批评功能作用认识的深化,为文艺批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提供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积极健康与宽松和谐的制度保障、政策支撑与机制推动。

二、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引领文艺发展方向的功能作用

文艺发展方向目标是文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创造及其人文价值创造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顺应社会历史时代发展趋向而确立人民性、先进性、进步性目标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应该承担起塑造人类灵魂、净化人类心灵、满足人类精神需要、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责任。习近平讲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3]这既落实在文艺创作所提供的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品力作上，又需要落实在文艺批评所产生的评价功能作用及其效果上。文艺批评性质特征与评价机制功能作用基于批评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取向、评价导向及其评价标准的设定，集中体现在对文艺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方向目标的正确引导上，其中重要指向就是对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潮、误区以及模糊认识的正确引导。先秦春秋时期，国家分裂，社会混乱，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孔子愤斥“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以期“正名”而“正乐”，旨在重建礼乐制度纲纪秩序，试图确立文艺发展正道。齐梁时期，文坛萎靡奢华之风盛行，刘勰严厉批评：“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4]（P.226）}旨在遵循“原道”“宗经”“征圣”的“文之枢纽”以“正体”，以期通过拨乱反正、纠偏解蔽重建文学规矩，重构文学发展正确方向。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动机意图也在于澄清文坛上的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其目的在于端正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及其文艺繁荣发展，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作为文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与目标方向。习近平讲话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

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这一方面是党和国家从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层面对文艺工作与文艺发展所提出方向路线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其文艺需求，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是对文艺规律及其文艺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高度概括，充分揭示出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是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利益所在。如何通过文艺内部自身建设及其内在机制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文艺批评不仅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而且也是文艺评价机制功能作用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引领文艺发展方向的功能作用。

三、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推动文艺经典精品生成与建构的功能作用

习近平讲话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作品。”^[3]经典精品不仅是文艺发展及其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及其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与必然选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两种内在机制驱动，一是创造机制，一是评价机制。价值创造有赖于价值评价，价值评价有利于价值创造，构成创造—评价—再创造—再评价不断循环的螺旋形上升的发展规律与特征。因此，创造—评价机制构成可谓人类活动及其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与价值源。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发展也是基于创造—评价机制构成的动力源与价值源，形成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双向共生、双向同构、二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推动创作与批评在交流互动中共同发展，也以其创造—评价机制共同推动文艺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论，创作不仅需要创造机制推动，而且也需要评价机制推

动,使其创造的价值通过评价得以实现,并为文艺创造与再创造提供更为有利的创新、跨越与超越的基础与条件。批评基于创作需求及其文艺发展需要,不仅提供评价机制的推动力,而且也提供促进创作进一步提高的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进一步激发了创作者的创造力。同时,批评评价机制能够真正推动创作提高及其文学发展,无疑可谓创造性评价,也就是说评价中蕴含创造,由此证明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活动,评价机制的功能作用也具有创造性价值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艺批评对于作品评价不仅推动文艺经典产生及其作品经典性生成,而且其创造与评价构成机制也推动文艺经典化发展方向及其批评经典形成。习近平讲话阐释“精品”含义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阐释“经典”含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勰《文心雕龙·宗经》阐释“经典”之义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4](P.21)}指出“经典”历时永恒性与共时扩展性及其典型性、模范性、示范性价值意义,为文艺经典创造与生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揭示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文艺经典产生过程莫不如此。相传孔子删编“诗经”,以“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路》)作为评价准则,后经汉代经学将《诗经》经典化,并通过以《诗》为经还是以《诗》为诗的辨析与争论,最后形成《诗经》文学经典及其“风雅”文学传统。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坛关于屈原及其《离骚》的文学论争,无论是刘安、司马迁等誉之为“与日月争光”(刘安《离骚传》)的评价,还是班固等批之为“露才扬己”(班固《离骚序》)的评价,无形中推动了屈原及其《离骚》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后经刘勰对其作出“金相玉式”(《辨骚》)的评价,肯定“变乎骚”(《序志》)价值意义所在,确立了屈原《离骚》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形成“风骚”并举的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艺经典形成又为文艺批评提供评价标准及其典范,往往以经典作为准则进行文艺评价,从而确立文艺经典化发展方向。刘勰评价屈原及其《离骚》以“虽取谿经义,亦自铸伟辞”为标准进行评价:“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隕,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

也。”^{[4](P.46)}以《诗经》为基准,揭示屈原及其《离骚》依经创义的意义。钟嵘《诗品》评价作家作品追根溯源,衡量标准亦在经典,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其源出于《小雅》”等。更重要的是,经典评价取向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发展取向,同时也成就了批评经典的建构。这在古今中外批评史中屡见不鲜。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理式”说“摹仿”说,既可谓对古希腊文艺创作及其经典作品评价的结果,也可谓以其评价理念及其评价机制影响和推动了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及其文艺思潮发展。中国先秦时期儒家孔子提出“诗教”说,基于对《诗》的评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诸如此类的评论,不仅在于通过对《诗》的评价以揭示文艺价值意义,而且在于奠定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及其文艺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无论是德国批评家莱辛《拉奥孔》《汉堡剧评》等批评经典,还是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由果戈理的〈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等批评经典;也无论是刘勰《文心雕龙》文论批评经典,还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诗学批评经典,都不仅在于凸显文艺批评对推动创作及其作品创造的评价功能作用,而且也在于体现文艺批评的创造价值及其通过评价机制对经典作品的建构与生成作用。这不能不说文艺批评在推动文艺经典精品生成与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也不能不说文艺评价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艺创造机制及其推动批评经典建构机制。

四、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推动文艺制度体制改革创新及其落实制度保障功能的价值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与制度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制度文化正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一样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必须加大制度文化建设及其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力度。基于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审美制度等制度形态和形式,文艺制度显然也是社会制度构成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对“文学制度”概念进行解释：“这个术语要理解为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在决定文学生活和文学经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对这些机构的兴趣，伴随着近来将文学视为一个生产、传播、接受、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社会体系的观点。”^[5](pp.33-34)由此可见，文艺制度是提供文艺良性健康发展的保障与规范的思想体系、规章制度、团体组织、管理机构以及文艺活动、创作、生产、传播、传承、评价等构成形态与运行机制，主要提供文艺发展的思想基础、社会保障、组织形式、运行规则、行为规范与环境条件支撑。文艺制度发生、生成与建构是人类文明及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具备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国当代文艺制度建立在“五四”以来现代文艺制度及其延安文艺制度发展基础之上，具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型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实践探索与经验证明建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无疑是文艺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艺制度对文艺的保障与规范作用更为内在的功能看，文艺批评通过文艺评价机制及其评价标准与评价导向直接体现文艺制度要求，直接体现文艺制度保障与规范的功能作用。因此，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理所当然成为文艺制度功能作用的集中表现，成为实现制度功能作用的内在驱动机制。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一些制度体制弊端成为社会发展及其文艺发展的障碍，文艺制度创新、文艺体制改革、文艺机制转换成为必然。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讲话指出的“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

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3]的指导思想，深化文艺制度体制改革机制的改革创新。一方面，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加大文艺批评转型发展的力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激活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活力与动力，以其评价机制更好地推动文艺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推动文艺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功能作用，推动文艺制度体制建设与不断完善，净化优化文艺生态环境，为文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机制保障；再者，文艺制度作为文艺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需要通过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实现其功能作用，这既表现在文艺评价机制作为内驱力推动文艺制度内部建设及其增强内在“自律”性，又表现在文学评价机制能够将推动文学发展的社会综合力量的外推力转化为内驱力，使“他律”内化为“自律”，形成推动文学创新发展的内驱力与外推力的合力。因此，必须建构文艺发展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与推动机制，使文艺评价体系与文艺制度保障体系统一，达到文艺评价机制与文艺制度良性互动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2]邓小平.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A]. 邓小平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OL].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0/15/c_134715872.htm.
- [4]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加]斯蒂文·托托西.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刘敏慧)

重识、重建与重塑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危机、抉择与担当

许 诺

(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 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 当前的文艺评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信息技术背景下异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纷繁多变的文艺现场,使得文艺评论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正遭遇一场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为此,必须在重新深刻认识、充分分析困境、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具有中华美学精神的文艺批评道路,重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与批评范式,重塑批评家的主体性。

[关键词] 评论危机; 理论重建; 主体重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59-04

如果我们将文艺评论理解为植根于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以主观思想与美学体系观照艺术家和文艺创作本身,并在特定场域内产生效果的文化实践活动的总和,那么,中国当下的文艺评论,或许正同时处在最好与最坏的境况之中。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最直接与国家民族的当下现实发生密切关联的文体之一,评论(或称批评)所承担的使命便是宏大而具体的。从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批评、李健吾的印象鉴赏式批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到占据当代文艺批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再到深受西方影响的心理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中国的文艺评论家们,总是怀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试图建立起一种为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提供有效描述和阐释方式的批评“范式”,并希望以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思想精神内核,来完成对当下文艺乃至时代精神的引领与烛照。然而,当今天的文艺评论站在异常纷繁喧嚣的文化现场时,迎面而来的,却是由海量信息与资本裹挟着大众流行文化汹涌而至的时代巨浪——诚如学者张江所言,“今天的文艺批评家正面对一

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社会舆论和文艺创作潮流多变、取向各异,相关的话语环境和利益关系愈发复杂多样,批评话语附着的外部因素和引发的场外效应繁复。”^[1]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情势下,我们不无忧心地看到,文艺批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这种危机,正同时发生于批评的内部与外部。对此,我们首先有必要以高度清醒和客观的态度,对于全新的时代环境与由此带来的评论困局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认识。

一、重新认识当前文艺批评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多重危机

就外部而言,信息科技尤其是媒体技术爆炸式的发展,不仅大幅改变了社会文化格局和文艺创作生产的节奏、方式、传播途径等,也彻底改变了以往评论与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评论的“黄金时代”,一篇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评论文章几乎是评判一部作品优劣的唯一参照物,评论的有效性是由其权威性与公信力确保的。而在传媒时代强势来袭下的今天,有权力、有能力对一部文艺作品进行阐释和评估的,除了受专业训练的评

[收稿日期] 2015-08-21

[作者简介] 许 诺,女,江苏镇江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

论家外,还有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上拥趸众多的“大V”“公知”,以及成千上万“有话要说”的普通读者和普通观众;同时,“媒体评论”(或称“新闻化的评论”)以其在时效性和受众面上的明显优势,也实际上担负起了很大一部分以往文艺评论的功能。当然,一个更不容忽视、更有力的“评论家”,就是资本市场。无论销量、票房、版税还是点击量、广告费,市场简直是以最直接晓明的方式在“评论”着一部作品,而尽管这种评论方式是如此简单粗暴,似乎充满了庸俗的“铜臭”,却在大众中富有号召力和说服力,也最容易产生藉由资本的强势介入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那些票房过亿却骂声一片的“烂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艺评论曾经的主流阵地——专业期刊的影响力被大幅压缩,传统评论的话语权力遭到解构和分割,评论家的声音淹没在新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建的文化越来越遭到流行文化的排挤,退居到社会的边缘地位,而歌星影星电视主持人,以及娱乐报业的记者,日益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的文化精英”^[2]。

伴随着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和精英姿态的退场,文艺评论自身也似乎正从内部陷入一场“坍塌”。一方面,在外部压力下,一些文艺评论开始“向内转”,主动放弃了对文化现实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我降格为文艺批评小圈子里的游戏”^[3],在由学院、评论家、文艺团体、专业期刊和各类论坛、研讨会等等所组成的封闭圈子里,批评逐渐沦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一些被“圈外”广泛关注的新作品和新现象,反而得不到具有理论高度的专业评论的关注;而另一方面,相对固化的学术体制和学院机制,也使得当下一些体制内的文艺评论显得活力不足:有的脱离当下语境、充满了酸腐的学究气,有的崇尚技术主义、故作高深,有点言必称西方理论、满口“学术黑话”,而有些评论的写作甚至退化为一种具有功利考量的职业性行为……这些被人诟病的“学院式批评”在瞬息万变的文艺现场面前,常常陷入失语或言不及义的境地,写出来的评论文章“读者不爱听,也不相信”^[4],渐渐远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和本质。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或许来自于评论从业者自身价值观的转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晓明等学者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市场化、商品化条件下,文化与批评已经陷入了“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5]，“文

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6](P.272)},更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危机所指涉的正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6](P.176)}，“批评文体中的人文主体性让位于市场利益的主体性,表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异化’特征”^[7]。被资本“异化”后的文艺评论失去了灵魂,注定只能沦为话语寻租和廉价的广告推销。换句话说,一旦评论丧失了主体性和思想性,丧失了批评应有的独立和尊严,那么,这个曾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文体就可能走向沉沦。

危机重重之下,如果说当前的文艺评论正处于“最坏状况”,似乎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危机的别名叫做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的文艺评论也同时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最好时代”。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从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奋斗目标的高度指明了文艺创作肩负的历史重任,更强调了文艺评论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并明确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历史情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从此奠定了新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思想根基;那么,习总书记的讲话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异常纷繁复杂的文艺局面下,为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拨散了迷雾、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更召唤着文艺评论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为此,新形势下的中国文艺评论亟需完成的课题,就是对评论理论体系和批评主体的重建与重塑。

二、重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与批评范式

1. 开拓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中国文艺理论道路。学者廖文曾发文指出,当前文艺评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从本土语境出发、能够有效处理‘中国经验’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8]要做到这一点,当下的文艺评论首先

需要走出西方理论与西方美学体系的“话语牢笼”。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评论中依然充斥着大量西方文艺理论和西化的审美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但许多人已经感受到,完全使用西方理论和西方审美标准去阐释和评判中国文艺创作早已捉襟见肘。中国文艺作品既诞生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审美体系之中,那么对它的评价和阐释,就必须引入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资源、本土化的艺术品格和美学标准,也就是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华美学精神”。在我理解,在文艺评论中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绝不是非“西”即“东”的两分法,而是站在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中,重视和重新审视中国文艺的特殊语境与艺术价值,一方面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与艺术资源,一方面合理吸纳西方文论的优秀资源,从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开辟文艺理论的“中国道路”。

2. 重视评论的文体规范性和严肃性。文艺评论可以是多样化、个人化的,既可嬉笑怒骂亦可沉稳厚重,但无论选择怎样的表达方式,评论的本质是严肃的,评论遵循的标准是有严格规范的。当前,文学批评突出的一点问题就是文体过于驳杂,写作过于随意,不仅缺乏规范性,也缺乏严肃性。有学者曾在文章中指出“某些批评不像批评”,并例举出过度阐释式批评、借此言彼式批评、个人感想式批评等时下多发的文体问题^[9]。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评论队伍成员的广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多媒体时代表达空间的扩大带来了评论门槛的降低。但总体来说,评论文体的失范,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前文艺评论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亟需引起重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学者刘川鄂的意见,即“论文体理所当然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文体,以学理服人是其基本要求”^[9],此外,随笔、对话、点评等文体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必须以理性作为评论活动的基本准则,以理论和思辨为基本方法,以提供价值判断和审美引导为最终目的,否则文艺评论就无所依傍,不仅失去思想深度和说服力,更无法赢得读者的尊重。

3. 提升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与有效性。新媒体时代,曾作为文艺评论最主要载体和传播途径的文艺刊物、学术期刊在时效性和覆盖面上失去了以往的优势,而在海量信息和“轻阅读”面前,

曾经由权威刊物和主流媒体所奠定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削弱,许多优秀评论文章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也无法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许多评论家正身处“在旷野中呼喊”的窘境。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早在上个世纪就指出:媒介即是隐喻,形式决定内容。当下,文艺评论要在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场中产生有效性和权威性,很大程度上需要走出传统的“研究/评论—发表—讨论”模式,一方面通过新的媒介与载体重新夺回失落的话语阵地,另一方面,更要找到适合新媒体时代的新话语,在批评的样式和方式上更加“接地气”,不断增强多样性、体现鲜活性、加大辐射性。实际上,新媒体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也为文艺评论的传播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手段方式,只要善加利用,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重塑文艺批评的主体性

批评家是文艺批评的主体,是连接艺术家、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之间的纽带:一方面,一个艺术家或许只有在诸多有见地的评论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另一方面,评论家也在用批评去引导和教育普通读者和观众,对大众的观念和判断施加影响。因此,重塑批评主体,使其成为具有主体意识、富有使命感、责任感和时代担当的优秀评论家,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确根本责任,发掘时代经典。我认为,当下文艺评论出现的问题种种,其根源就在于对“评论的时代责任”失去了主体性的把握。备受诟病的“学院式批评”、为了功利目的的“作秀式批评”和自娱自乐的“小圈子批评”等等,都是对这种责任的选择性忽视或者逃避。那么,当前形势下,评论的责任是什么?学者陈晓明就直接指出:今天文学批评的根本责任和意义“就在于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10],实在是一语中的。习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而当代中国文艺的经典化之路依旧“道阻且长”,这就更需要评论家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用良好的评论环境来助力中国当代文艺经典的创生。当代文艺并非没有作品,相反,是作品的数量太多,仅就文学而言,每年就有上千部长篇小说和数百种文学刊物,网络作品更是天文数字。在如此庞大、繁杂的文艺现场下,时代更需要一种“诊断性批评”,面对作品本身“实话实说、发现问题、揭示病症”^[10];同时,还要通过深度的文学研究,对作品进

行多方面的阐释,从而在海量的文艺作品中“沙里淘金”。一方面批评淘汰劣作,引导艺术家走向精品,一方面发掘优秀作品,并完成时代经典的经典化,这样才能够切实履行好评论的根本责任,并为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艺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提升批评素养,重塑批评精神。文艺评论是一项有难度的专业,它要求评论主体首先要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其次要拥有独到的眼光和审美能力,同时,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评论的难处正在于,要将最理性的理论思辨与最感性的文学艺术相融合,最终熔铸于另一种形式的创作之中,因此,批评家的职业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当代评论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要能融通古今中外,具有历史胸怀和世界视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文艺创作正越来越多地立于世界文艺之林,当代中国文艺评论也已身处国际语境之中。因此,当我们对作品进行评价时,不仅需要站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艺传统之中,还必须站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中,这样作出的评判才能经受得住检验。二是应当对古今中外的优秀艺术作品保持熟悉,对当下的社会状况与最新文艺动向保持敏感,时刻提升作为评论家的感受力和感悟力。真正意义上的评论,源于评论家个人的真诚信念、文化良知和发自内心的对历史、文化、民族以及对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现具有潜质的新作品并非有固定的标准套路,而是需要有特别的艺术敏感,这就有赖于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时刻留意与艺术积蓄了。

坚守底线与尊严,倡导文艺的“真”。文艺评论是一项需要充分自觉的事业,更是一项真实展现评论家内心世界和道德修养的事业。古人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须先有“铁肩”才谈得上“妙手”;德艺双馨,“德”也须放在“艺”之前。文艺评论也是如此。习总书记强调的“说真话、讲道理”,正是在向当代的批评家们要求一种真诚的态度。这种“真”,不仅是一种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更带着深刻的认识论色彩。匈牙利批评家卢卡奇说过,艺术总是通过个体和个体命运的形式来表现人类,那么如何认识历史的“真”、现实的

“真”、人性的“真”与艺术的“真”,就成为了每一个批评家应当不断反思的重要命题。这种“真”,在当代语境下的言说对象,正是“娱乐至死”的文化拜物教浪潮,正是某些论调高声宣扬的“文化无灵魂”主义……多元不等于没有原则,宽容不等于肆意放任,和谐不等于不辨是非,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化现场,评论家必须以“真”为准绳,在评论中体现出主体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才能促就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灯塔和引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艺评论唯有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坚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在与其他批评体式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断吸收新的合理因素,积极构建出新的中国特色评论之路,才能不断促进中国文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参考文献]

- [1]张江. 重塑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 2014-10-20.
- [2]陈晓明. 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4).
- [3]李朝全. 当下文艺批评的致命缺陷[N]. 中华读书报, 2007-08-22.
- [4]张江、程光炜、邵燕君等. 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N]. 人民日报, 2014-07-15.
- [5]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 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J]. 上海文学, 1993(6).
- [6]王晓明. 人文精神寻思录[M]. 文汇出版社, 1996.
- [7]刘保昌. 批评文体的单一与主体性的黄昏[N]. 文艺报, 2015-04-15.
- [8]廖文. 批评的力量[N]. 人民日报, 2011-04-01.
- [9]刘川鄂. 文学批评的文体与批评的有效性[N]. 文艺报, 2015-06-10.
- [10]陈晓明. 批评的责任[N]. 人民日报, 2015-05-22.

(责任编辑 南山)

于深渊看见天上: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

陈舒劼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 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涵盖人的心理、情绪、行为诸多层面,突出表现了暗疾的不由自主、顽固不化和融入日常。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勾勒出本质化的个体孤独和人际隔阂,暗疾对个体的精神世界和人际关系具有强大的塑形能力。“矛盾哲学”是鲁敏暗疾叙事中价值认同重要的表述方式,通过对暗疾复杂的症候式描述,表达由暗疾走向幸福的期望和对于时代文化病症的批判。

[关键词] 鲁敏; 暗疾; 小说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63-06

—
“我的小说早期以虚构的‘东坝’乌托邦为叙事坐标,近期是以‘暗疾’为刀片的城市截面。”^[1]“东坝”和“暗疾”成为迄今为止鲁敏小说的两张名片,得到了批评家和作者的承认。“东坝”代表了鲁敏小说对乡土之善的“传奇性”描绘,她“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是那种没有精神‘暗疾’的人,都是那种对他人充满善意的人,都是那种急公好义的人,都是那种极其通情达理的人”^[2],而“暗疾”则致力于展示表现为“正常人”的城市平民精神病况的深度和宽度。“东坝”和“暗疾”之间构成了包括主题、审美和思想在内的多层张力,同时,从“东坝”到“暗疾”意味着一种转折,它指向了复杂的“问题性”的现实。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描绘时代的人文精神状况、选择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认同、表达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期许等,成为文学创作重要的内在动力和叙事主题。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化论争中,人文精神、物质崇拜、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等等词汇成为概括时代及其精神状态的标签,如何抵抗欲望、物质、消费、技术从不同方向对精神世界的逼迫,令诸多作家辗转反侧。现在看来,贾平凹的《废都》、北村的《施洗的河》、李洱的《午后的诗

学》、朱文的《我爱美元》等当时的许多文本都涉及指向时代精神暗疾的叙事内容,但它们同时也标示出了这一主题远未得到充分挖掘的空间。鲁敏的转折意义正在于此,“东坝”之后的“暗疾”直面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它们对深入了解和思考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社会的转型导致了哪些隐秘而深刻的心理变化?被忽视、被压抑的心理情绪具有多大的能量?这些心理和精神情绪如何塑造了个人及其亲友的命运?这个时代中人与人情感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怎样面对这一时代的诸多精神暗疾?个人精神暗疾和时代文化症候如何相互生产?什么才是文学叙事中的时代“真实”?

暗疾叙事正面介入这个时代的诸多重要问题,与写作主体的求索意识紧密相关。“写这一个系列,我不是来找答案的,不是求结论的。我本身也处在暗疾与困苦之中。”^[3]鲁敏坦言她对暗疾叙事投入了巨大的热情:“N种狂人、病人、孤家寡人、心智失序之人、头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进入了我的小说。我毫不回避甚至细致入微于他们的可怜可憎与可叹,而他们的病态每增加一分,我对他们的感情便浓烈一分。我深爱我的这些病人,以至舍不得他们遭遇非议直至遭遇非命。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我病得同样地久、同样地

[收稿日期] 2015-05-19

[作者简介] 陈舒劼,男,福建长乐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深。我常会在小说里写到他们的死,他们兴味阑珊地跃向虚空,他们自以为是地一意孤行,他们宿命地踏上最后一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他们写得死了,同时又像失去了至亲、失去了我本人一样的压抑以及在压抑之后获得奇异欣悦——我自己无法、也不愿意去判断这样的写法,个中的高下与正谬,我只知道我的情魄为之耸动、日月为之增色,我获得了数倍于我的我。而这,本就是我对写字的最大寄托。”^[4](PP.149-150)这段自白至少透露出三处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暗疾写作是鲁敏文学价值观的核心表现;其二,探索暗疾是作者与其笔下人物和周遭世界不断对话的过程;其三,暗疾叙事不刻意强调甚至是有意拉开了与宏大叙述之间的距离。结合鲁敏具体的小说文本,就可以利用差异化的比较大致圈出其暗疾叙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鲁敏描绘的城市平民的精神暗疾,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通向文化深层结构或社会时代特征的心理和精神病症,即发生在鲁迅的阿Q和陈士成、张爱玲的曹七巧、白先勇的王雄等经典人物身上的病症;也不同于当代都市小说中深陷于情欲宣泄和物质消费的欲望泥潭;同样异于当代底层小说里反复渲染的外部生存重压下的精神苦恼。“我想收藏‘人’,人的伤疤,人的灵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人性之种种,迷人而触目惊心。写作就是对人性的探测与抚摸。”^[5](P.128)显然,暗疾叙事指向了人性的丰富和深刻。

二

《九种忧伤》是鲁敏小说集中专属心理暗疾的一本,它收录了八个故事,从而使缺席的“那一个”具备了丰富的象征性:它可能属于每一个人,可能潜伏在每个空间和每段时间之中,可能仅仅是暗疾的一种,也可能是无法穷尽的“无数”——至少小说集的八个故事就列举出了远不止八种的心理暗疾。从《不食》开始,读者将陆续看到秦邑与精神洁癖相伴随的异食癖,陈亦新频繁写信给由自己杜撰出的贴心朋友谢伯茂,穆先生陷于莫名的消沉与焦灼中无法自拔,老雷制定出细致而庞大的防护措施试图控制死亡的随意性,老申根深蒂固的字纸崇拜转化为对字纸载体极强的占有欲,押运员痴迷于在阅读地图和创作地图中抵抗孤独感。到了《暗疾》,梅小梅一家人各有特色:梅小梅喜好不停地重复“购物—退货”的过程,父亲每当面对事情总会呕吐,姨婆在任何场合都热衷讨论

大便的细节,而未婚夫看似最为宽容随和却隐藏着对世界最深的恨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小说集最末的《未卜》中,这种情绪上的暗疾已经拥有了掌控现实的恐怖力量——幼年照片上表情“拘谨得接近悲怆的”丁家四兄妹,配偶都离奇地不幸身亡,丁如为此曾警告整天惶恐不安的丁意:没有的事情想多了就会变成真的。在“九种忧伤”次第铺开之时,心理暗疾的程度也在不断加重。然而,《九种忧伤》并不是鲁敏小说暗疾叙事的全部,进入这个系列的至少还应包括长篇《六人晚餐》《此情无法投递》,以及中篇《墙上的父亲》《惹尘埃》《取景器》《隐居图》《当我们谈起星座》《月下逃逸》《零房租》《风月剪》等等,这是个远未完成的系列。因此,必须适时地从鲁敏笔下异彩纷呈的暗疾表象,转入这些表象背面的空间。

心理学能为部分暗疾叙事给出自己的专业解释。简单地说,《墙上的父亲》中的妹妹王薇不停地吃零食是神经性贪食症的典型表现,喜好偷不值钱的小东西是病理性的“偷窃癖”;《死迷藏》里老雷对死亡和生活的态度体现了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综合;《六人晚餐》中的丁伯刚明显患上了酒精依赖;《风月剪》中的宋师傅和《六人晚餐》里的晓白都存在着性认知障碍的问题;而《镜中姐妹》里的少女小五喜欢收集废物则可能与强迫性囤积症有关。心理学视角进一步强调,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对于个体而言,不由自主、顽固不化且溶解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死迷藏》这样描绘原本谨慎、周密、随和的老雷在与潜在的死亡危险较劲之后的变化:“老雷的状态不太好。各种严肃或放松的集体场合,他好好地坐在当中,却神思涣散,像不在现场。他走路拖着步子,显得非常疲惫,可真正到了午休时间,却又不好好睡,手里捏着手机,时不时打开来看一看。他甚至丢三落四起来,有一次公司开大会,最爱迟到的人都到了,独缺他一个。”“他身上常常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来自口腔,或是数天不洗的头发。”“他的痛苦像长跑者的汗珠那样,布满了整个脑门,与之同样明显的则是他的固执,如背上插着刀的牛,一门心思地专往红布上冲。”^[6](PP.116-117)试图杜绝生活中一切意外的念头死死地将老雷攥在手心,老雷不是没有反省过自己庞大而细琐的防御措施,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暗疾潜在的巨大危险,不是没有考虑过周围亲友的劝解,但还是被这种暗疾看似日常性和合理性的一面所蒙蔽和诱

惑,挣扎而又毅然决然地走向最后的毒杀亲子。恐怖的是,老雷直至生命的尽头都没有摆脱这种“死迷藏”的迷惑。小说中作为正常者视角的“我”想象老雷的最后一个场景是,囹圄中的他得知自己千方百计保护的儿子原来对生死并不看重时,“脸上的肌肉突然像青蛙腿那样抽动着”,留下几粒巨大的血泪——这种心理暗疾的痛苦还将在另一个世界纠缠着他。暗疾的不由自主、顽固不化和日常性伪装不断从各个细节雕琢着人物的思想、情绪和行为,从而建构起千人千面而又在总体上弥漫着阴郁、尖锐、焦灼气息的暗疾世界。

心理和情绪的暗疾尽管隐身在日常的各种事件之后,但它们大都明确地指向了对意义的重视、探寻与追问。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并非那种仅仅指向自身的暗疾,它与意义探寻和情感需求始终相伴。“他没法确定,在这具好吃好喝的肉皮囊之外,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所消沉与焦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7](P.68)}《铁血信鸽》中穆先生的困境同样横亘在其他被暗疾所影响的小说人物面前,《西天寺》里的符马感叹“现在这个世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无聊,无聊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8](P.9)}。遮天蔽日的无聊同样是意义缺失的一种表述。然而,为意义所困是如此难以言说,如此与日常氛围格格不入,以至于穆先生“怕说出来给人笑话了”,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心理暗疾的不可舒缓。真相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那个躲藏在生活背面的“究竟”?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中的芸芸众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入了奔流不息的意义之河,在他们试图为内心的暗疾寻找某个答案之时,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进入意义的相互碰撞与生产。

三

暗疾虽然总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但究其根本无法与外界交流脱离关系。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变化、再生产,不断向人性的纵深掘进。不难发现,鲁敏小说中怀有暗疾之人大多与孤独紧密相连,无法实现与他人的内心交流。《当我们谈起星座》提供了极端的例证。号称“社交家”、认识诸多各界名流、能组织起大型跨界聚会的大林,他的突然跳楼向他的朋友们尖锐地提出“朋友间究竟相互了解多少”的问题。大林的专长就是社交,但他诸多所谓的密友,连大林在哪里工作、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等等基本信息

都一无所知。“像以往的这个时刻一样,伴随着对杯盘狼藉、曲终人散的厌倦,内心里却总会升腾起一种被火苗所灼的孤独感”^{[9](P.44)},大林之死看似是这种孤独感的又一次重复,然而,如果看到“大林”本身就是个连姓名都算不上的、不能再简略的代号,联想到“大林”这个称呼近似于英文“亲爱的”,那么这其中的荒诞和荒凉就格外刺眼。

相比于社交圈内的孤独,鲁敏更愿意揣摩亲人之间内心世界的隔膜:父子、父女、夫妻、恋人之间的沟通障碍贯穿了多篇小说的主题。《墙上的父亲》直言:“父亲是一辈子的生字。”^{[10](P.84)}鲁敏的小说如《此情无法投递》《六人晚餐》《月下逃逸》《零房租》等都出现过独立、封闭、阴暗、狭小的房间,象征着子女对包括父母在内的外在的排斥。《此情无法投递》中的空间套叠可为此典型:李书记之子用于开舞会的封闭性房子象征着这伙年青人与时代思潮间的观念隔阂,而这套房子中陆丹青和斯佳发生“一指之缘”的那间房间,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人永远无法进入的内心世界,这隐蔽的房子中的不起眼的小房间,既与当代隔绝又被历史抛弃。陆丹青和父母、陆丹青和斯佳、陆仲生夫妻和在陆丹青死后出生的女儿陆小青、陆仲生夫妻和斯佳这数组人物间的精神与情感交流远远谈不上充分,小说的题目就是清晰的宣判。《零房租》基本可视为是《此情无法投递》的微缩版:一个年迈的父亲竭力保存亡子的独立空间,又渴望能借他人之力恢复这个空间的气息,以了解他陌生的儿子的内心世界。《饥饿的怀抱》里的父亲必须通过一个叫 Sophia 的女孩作为父子交流的中介和镜像,他无力地感叹:“如此隔阂啊。我实在难过得很。”^{[11](P.317)} 夫妻之间能比父子之间好到哪里去呢?《惹尘埃》中的肖黎在丈夫意外身故时发现了他的情感秘密,这点燃了她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她从未希冀过所谓的海誓山盟,她只求最基本的坦诚与信赖,然而,这也不能够!连他都如此,整个世界都是纸糊的不是吗!”^{[12](P.11)} 一言以蔽之,“儿女、父母、恋人、夫妻,本质上都是不通音讯的”^{[13](P.61)},这并非因为亲人们拒绝交流,而是“因为那是无法表达、无法输出的!情感永远都是有障碍的、抵达不了的”^{[14](P.223)}。这种障碍和无法抵达,不是指意义在语言传播过程中的延异,而是指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沟通的困局。

鲁敏小说的暗疾世界里,孤独已经成为个体宿命般的痼疾,不仅无法克服还可能在关系中相

互感染,带来情感上进一步的压抑和折磨,《墙上的父亲》为此提供了鲜明的注解。王蔷王薇的父亲在世时表现出的刻板、孤独和阴郁,隐蔽而又有力地影响了母女三人的心灵世界。妹妹王薇不停地吃零食,喜好偷不值钱的小东西,总是表现出快活的迟钝,这些暗疾显然可以视为是面对母亲的自卑、易怒和吝啬时的自我保护与宣泄。K医生为王蔷的分析进一步揭开了小家庭中暗疾相互传染的幕帘:母亲和王蔷既是苦难的承担者也是暗疾的制造者,王蔷本人对家庭情感模式存有深度的怀疑和拒绝,还患有情感的高度营养不良和情感洁癖症。K医生的诊断准确但不够充分——在暗疾被揭开和自尊心受挫的巨大愤怒中,王蔷在内心粗暴地攻击了K医生所代表的整套心理分析体系。然而,小说随即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日常谈话的目的往往不是开诚布公,而是加以掩护、屏蔽,把真相与真心尽可能弄得扑朔迷离,好像这样才能保住彼此羞于承认的软弱情感。”^{[10](P.80)}它再明显不过地否定了王蔷对心理分析的否定。情感交流的失败、对自我心理暗疾的不满、突破暗疾缠绕的渴望,共同生产了窥探他人内心世界的渴望。“我需要一下子发现拍摄对象与众不同的东西,那隐藏着的缺陷、那克制着的情绪、那屏蔽着的阴影部分。”^{[15](P.25)}这种“后窗”情结,隐伏着了解自我和自我疗救的渴望。“邮差送信”是鲁敏常用的隐喻人心隔阂之下渴望相互了解的叙事模式,而《月下逃逸》比《致邮差的情书》和《谢伯茂之死》来得更为典型。《月下逃逸》里的哥哥是母亲一次隐秘受辱的产物,不知身世的他感受不到来自父亲的一丝关爱,母亲有时也为了表示对屈辱的愤恨而冷淡他。被莫名而坚决地斩断了亲情交流的渠道之后,哥哥只能靠自己作为邮差的工作便利偷拆私信,通过阅读他人的情感交流来满足自己的情感缺陷。蓝妮兄妹眼中,代表了“人与人最优雅的交往方式”的信件,足以让“世界昏迷,万物沉沦”,“是他们整个生活最大的乐趣与价值所在”。^{[16](P.210,P.214)}然而,以拆信满足情感的缺失,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面对困难重重、却又难以抑制的情感交流,《六人晚餐》中的丁成功提供了一种人际交流的理想状态,即“玻璃”:
“‘被隔开了,永远碰不到,可一切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的,你们想想看,这多了不起!世界上有哪样东西能比得上?’反问语在空中扇着翅膀,沉寂良久,丁成功加了最后一句:‘所以,我觉得,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像玻璃一样。’”^{[17](P.234)}“玻璃”作为个体间情感关系的标准,隐含了一种认知的矛盾哲学,这也形成了鲁敏小说暗疾叙事独特的张力性韵味。

四

鲁敏的“矛盾哲学”,在《六人晚餐》之中有这样直接的表述:“在通往更高阶层的孤独之路上,晓蓝有着许多犬牙交错的矛盾哲学,其中有一条,随着时间的移动,越来越清晰:人与人之间所谓的爱,总是艰难和偶然的,是不可能改善生活本质的,甚至只能妨碍进程,使岁月更为沉重。”^{[17](P.308)}“矛盾哲学”有许多内容层次,它是暗疾演变过程的产物,是对暗疾个体表现和人际间表现的概括与认知,也包括了面对暗疾的价值立场。体现暗疾叙事中“矛盾哲学”的地方为数不少,具体化的有《细细的红线》中“她”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她那么强烈地、发了疯地渴望反叛、渴望逃遁,可面上却又为何如此波澜不惊、安于日常?两者的程度似以一个严格的逻辑比例,在相互牵掣、反作用于对方——她内心有多么动荡,日常的外在就有多么乖顺!”^{[14](P.215)}概括性的有《百恼汇》的最后一句话:“离开即是靠近。自救即是他救。忘却即是宽容。”^{[18](P.210)}暗疾叙事中的“矛盾哲学”,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以吞咽痛苦为基础的欢乐。无聊、孤独、多疑、易怒、隔阂、压抑,无论外在世界如何缤纷多彩,被暗疾所控制的心灵都无法脱离痛苦的纠缠,纵有欢乐,也是建立在默认痛楚的基础之上。《墙上的父亲》中有一段母女三人回忆昔日对进食的饥渴和不择手段的描写,母女三人在聊天中充分嘲笑了过去的时光和彼此的窘态。然而,她们的自嘲并没有建立在“今胜于昔”的现实基础上,刻意将旧日的欢愉成倍放大的举动,倒是充分表现出一种舐血如蜜的快乐,以及彼此之间对个体命运和家庭命运的麻木。“有些往事就是这样,一个人时只会自斟自饮,成了苦酒;而一旦变成集体回忆,事情就滑稽起来,就会笑场。哈哈!她们相互取笑,毫无良心地添油加醋,并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闹中迅速而愉快地失去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10](P.43)}这样的苦中作乐或以苦为乐,就是将自身的苦难他者化,来满足或制造当下的自我的快乐。实际上,这只能说明痛苦难以忘怀,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快乐的辛酸。与当代文学史上余

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等相异的是,这种以吞咽痛苦为基础的欢乐,不意味着与现实的真正融洽或和解,母女三人在自虐式的自嘲之后,仍然为现实中的困境所苦恼和沮丧。相似的场景也发生在《此情无法投递》中,陆小青在选秀节目中将全家辛苦深埋多年的伤痛和秘密在镜头前乐滋滋地抖露出来,以求博取一些随行就市的短信选票。虽然兄长陆丹青的历史并不直接与陆小青相关,但它是这个家庭心理结构的主轴,在此意义上,陆小青的举动是以自己和家庭的深层痛苦为薪,点燃了陌生的观众的欢乐之火。

其次,以承认欺骗为基础的信任。生活中的谎言、伪饰和欺骗,并不与真话、实相和坦诚绝然对立,《惹尘埃》既将生活中的欺骗推向极致状态,又力图证明这种欺骗的合理性和隐善性。死于意外的丈夫所隐藏的情感秘密,撬动了肖黎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肖黎固执地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隐藏着欺骗与恶意:只有假的才可能完美,谎言成了比黄金还硬的全球通用货币,唯一值得教给小孩的就是识别世道上的谎言并以此在野蛮的人际丛林中生存。但是,肖黎最终不堪自己这套认知逻辑的重负,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背叛了自己:“她渴求真话,却一直把与谎言的斗争作为生活的全部;而当一个人完全地对她诚实时,她又感到失落与生分——她怎么了,这不是疯魔了吗,到终了,她竟还是渴求一个可以骗骗她的人!”^{[12](P.48)}撇开徐医生从历史逻辑到个人经验的多方开导,真正融化肖黎心中冰川的,还是韦荣坦然承认自己确因为谋生而行骗。更重要的是,韦荣没有仅将自己的辩解停留在语言上,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谎言背后存有善意和真诚。人心的彼此信任超越了简单的话语识别,然而,建立信任的过程又离不开话语的表述,这导向了主体与语言的关系悖论——究竟是语言为主体立法,还是主体宰制了语言?无论如何,肖黎已经开始尝试积极地在谎言上建构信任。

再次,以拥抱失败为基础的安心。失败显然指社会观念体系对个人价值的某种评判,大体上说,失败总是与不安全、不自信、不稳定等负面心理情绪和感知紧密相连,然而《六人晚餐》却展示了一种以拥抱失败为基础的安心。当丁成功问晓蓝“你究竟,喜欢我的什么”时,“晓蓝想了半天,苦笑:‘可能就是你浑身上下那种总是往回缩、

总不能如意的失败感吧。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你知道的,我一直崇拜成功,追求那种向上的生活,可我只要看到你,却总是既难过又安心,反而觉得别的东西都是假的、不可靠的。’”^{[17](P.257)}晓蓝的话中隐藏着对生活悲剧必然性的承认,呼应着小说开头的“生活的真相常常是这样:‘口渴饮水,水即干枯;伸手取果,果即消失’”^{[17](P.3)},这句话不仅是对小说中的六人,也是对鲁敏笔下众多心理暗疾者的谏语。

最后,以无情为基础的有情。如前文所述,表现本质性的个体孤独与人际隔阂是鲁敏小说暗疾叙事的主要面相。作为一篇小说题目的“今日忌有情”,大致概括了暗疾叙事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状况的认知。《墙上的父亲》里也说:“你要相信——你并不孤独,因为人人都孤独。”^{[10](P.88)}然而,无情与有情之间的关系,恰如“实然”不能代替“应然”一样,许多为暗疾缠绕的小说人物,已经在努力地走出无情的认知泥沼,《惹尘埃》就是一例。《六人晚餐》的结尾高度肯定了这种努力,它体现了生而为人的意义与活力:“一定记得,要学习爱、要创造爱,这是不可违抗的责任,因为我们仍然活着,并一口接一口,呼吸着这个庞大的世界。”^{[17](P.355)}

五

在一次访谈中,鲁敏坦言:“我愿尽一切的可能去探究人性的深渊,哪怕悬空坠落、不知所终。”^[3]心理暗疾是人性深渊中诡异妖艳的景象,分析、描绘以及阅读暗疾的过程,都不是为了更深地沉溺。努力从所处的暗疾的深渊中攀爬而出,才是暗疾叙事的文化价值所在。“你将会幸福,因为人人最后都学会了幸福,用他们所有的不幸作为学费。”^{[10](P.88)}借用鲁迅的“于天上看见深渊”来说,鲁敏暗疾叙事的整体意图,就是至少应该在无情的深渊看见有情的天上。在描绘了诸多爱的无奈、无力、无味之时,鲁敏也指出了爱在人处于困境之时的强大能量。“彼此间,做不到真正的融洽与亲切。但这样一种无计可施、令人感伤的局面,其根源恰恰是由于‘爱’,一种混沌而深沉的、带着催眠般惰性的‘亲人之爱’。命悬一线之时,这可怜巴巴的‘爱’,又足够维系。就是这样的,人们与爱的关系就是这样的。”^{[5](PP.127-128)}此时回头来看鲁敏的“东坝”系列,就更能体会出“暗疾”系列的力量。

“东坝”和“暗疾”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从文本内容来看,《风月剪》可以连接两者,而从思想主题来看,“暗疾”无疑比“东坝”更趋向对心灵真实的把握。就人心和人性的角度而言,从“东坝”到“暗疾”就是从“简单的善”到“复杂的病”。“东坝”虽然景美人更美,但这种诗化乡土的叙事很难说突破了现代文学史上前辈的高度,“这类乡村故事,实际上不过是些‘美丽的谎言’”^[2]。“暗疾”系列更愿意将人心和人性置于矛盾性和动态性的关系网络中加以推演考究,这种心理和情感的深挖,除了揭示精神世界的普遍痼疾与困境,还折射出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病症,《不食》《隐居图》《惹尘埃》《当我们谈起星座》等作品都或隐或现地露出了批判的锋芒。重要的是,这种剑指自身所处时代的批判,是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呈现出来。将鲁敏的暗疾叙事,与其同时并存于当代文坛上的两种创作倾向相比较,就能显现出暗疾叙事所持的文学式批判的特色。

这两种创作倾向,一是2010年时兴起的“非虚构”写作,一是以阎连科的《炸裂志》、余华的《第七天》、马原的《牛鬼蛇神》以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代表的所谓“正面强攻现实”型写作。前者强调“真实”,后者强调“批判”,两者之间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有不少可以共享的空间。然而,放弃或忽略了文学表达方式的长处,是这两种倾向中某些作品的通病。“非虚构”写作中,“《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生死十日谈》由琐碎而缺乏整体关联的细节缝起,显然构不成某种‘细节的美学’,《中国,少了一味药》洋溢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快感却缺少广阔的人文视野与情怀,都很难够得上高水准的审美需求”^[19]。而所谓“正面强攻现实”型写作中,余华的《第七天》宣称文学的艺术性已经臣服于现实的艺术性,马原的《牛鬼蛇神》充满了价值认同的自我矛盾,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过于放大了现实条件的统治力。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在文学美感的呈现、心灵真实的探索和价值世界的自洽等方面,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遗憾,而这也正是鲁敏暗疾叙事中值得重视的优良所在。因此,也应期待仍在进行中的鲁敏

小说的暗疾叙事,能带来更多的陌生和惊喜。

[参考文献]

- [1]鲁敏.后窗的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5(2).
- [2]王彬彬.鲁敏小说论[J].文学评论,2009(3).
- [3]李海音,鲁敏.浸泡在虚构的甜蜜与毒汁里[J].小说评论,2014(6).
- [4]鲁敏.为了靠近,必须远离[A].鲁敏.我以虚妄为业[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
- [5]鲁敏.创作谈(17则)[A].鲁敏.我以虚妄为业[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
- [6]鲁敏.死迷藏[A].鲁敏.九种忧伤[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 [7]鲁敏.铁血信鸽[A].鲁敏.九种忧伤[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 [8]鲁敏.西天寺[A].鲁敏.墙上的父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 [9]鲁敏.当我们谈起星座[A].鲁敏.小流放[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 [10]鲁敏.墙上的父亲[A].鲁敏.墙上的父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 [11]鲁敏.饥饿的怀抱[A].鲁敏.惹尘埃[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 [12]鲁敏.惹尘埃[A].鲁敏.惹尘埃[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 [13]鲁敏.零房租[A].鲁敏.小流放[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 [14]鲁敏.细细的红线[A].鲁敏.小流放[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 [15]鲁敏.取景器[A].鲁敏.取景器[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 [16]鲁敏.月下逃逸[A].鲁敏.惹尘埃[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 [17]鲁敏.六人晚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 [18]鲁敏.百恼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9]陈舒劼.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追求尊儒与宗道的协调*

——缪播《论语》注的学术影响

蒋鸿青

(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西晋缪播《论语旨序》因皇侃《论语义疏》的征引得存十八条。他既绍承王弼《论语释疑》以玄学注《论语》的诠释方法,坚持以“道”统“器”;又坚定地尊圣宗经,追崇学术经世,追求在尊儒和宗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 缪播;《论语》注;圣贤;尊儒;宗道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69-04

西晋缪播,字宣则,兰陵人,官至中书令,怀帝朝因内乱遇害。《晋书》卷六十本传称其“才思清辩,有意义”。^{[1](P.1636)}缪播生活在西晋宗室诸王纷争剧烈、王朝急遽衰落的年代,史称“中朝”。^{[2](P.131,P149)}这一时段,学术文化领域发生的显著变化,是玄学与儒学融合的倾向增强。一时间诸多名流如乐广、裴楷、裴頠、郭象等在调和儒、道方面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缪播也属于这一士大夫学术群体。

据载,缪播撰有《论语旨序》,《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新、旧《唐志》著录为二卷^{[3](P.133)},《宋志》未有记载。皇侃《论语义疏》征引十八条,保存至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论语旨序》继曹魏王弼《论语释疑》以玄学理论阐释儒家思想,但在宗道的同时,仍然追求着与尊儒崇经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一、刻意美化圣贤

缪播的《论语》研究,深受学术传统影响。他坚定地尊圣宗经,对孔子全部言行都毫无保留地持肯定、颂扬的态度。他关于“子见南子”一事的评论可以说明问题,待下文再行论述。兹另举例

证。《论语·阳货》记:“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按照常规的理解,孔子先是说子游有些小题大做,有轻嘲薄讽的意味;经子游质疑之后,才正色予以肯定。这段带有生活气息的描述,生动地反映出孔子与门人之间坦诚相见的情趣,具有文学意味。在缪播看来,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他认为这不是嘲戏,而是“惜其不得导千乘之国,如牛刀割鸡,不尽其才也。”又说:“其不知之者,以为戏也。其知之者,以为贤圣之谦意也。”在他心目中,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每一次交流、对话,莫不具有教诲的深意。《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缪播注:“圣教轨物,各应其求,随长短以抑引,随志分以诱导,使归于会通,合乎道中。以故则勇者,屈以优柔;俭弱者,厉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为累,常恐有失其分,觅功衒世,故因题目于回,举三军以倒问,将以仰叩道训,陶染情性,故夫子应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A751026)。

[收稿日期] 2015-08-21

[作者简介] 蒋鸿青,男,江苏邗江人,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以笃海,以示厥中也。”

不仅如此,他对孔门弟子也一律刻意回护。《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穀既没,新穀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缪播注:“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启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也。”这样解说似乎可通,但是,倘若宰我本无困惑而发对老师问,也不能说是恰当的行为。

二、坚持以“道”统“器”

缪播把孔子及其门下看成完美无缺的圣人、贤人,意在尊经。但是,他作为深受玄学影响的学者,又不可能完全忠实把握经典的本旨。玄学在他诠释《论语》时的作用,是引导他选择哲学、政治、伦理性质的命题,并融进玄学的理论因素。

缪播以“道”与“器”来概括孔子言论的思想内容。《论语·阳货》记孔子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马融说:“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非谓钟鼓而已。”郑玄说:“玉,圭璋之属。帛,束帛之属。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两家从礼乐教化的形式与意义、手段与目标两方面解说,对读者有一定帮助。缪播说:“玉帛,礼之用,非礼之本;钟鼓者,乐之器,非乐之主。假玉帛以达礼,礼达则玉帛可忘;借钟鼓以显乐,乐显则钟鼓可遗。以礼假玉帛于求礼,非深乎礼者也;以乐托钟鼓于求乐,非通乎乐者也。苟能礼正,则无持于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畅和,则无借于钟鼓,而移风易俗也。”看这段文字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很容易想到《庄子·外物》所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就当时学者普遍熟读《庄子》的文化背景看,说他受其影响,当非附会。但是,他在这里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是忠实的,而且比前人更加恰当地阐述了孔子语言的精神实质。他指出,玉帛、钟鼓是礼乐之“器”,而非其“本”;“本”始终不可废弃,它固然要借助“器”以为用,但是“器”可以变更,在实现其功能之后甚至可以遗忘。他通过比较,很清晰地揭

示出道与器的本末关系。他还指出,贯彻礼乐的精神,又限于举行相应仪式,可以有多种方式与渠道。这也是深刻的认识。

缪播解释《论语》,有意识地强化了道器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论语·为政》:“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安国解说“退而省其私”句,说:“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发明大体,知其不愚。”对照本章的实际内容,很难说孔子“与回终日言”,只是谈论实事而不及道理;认为颜回告别孔子之后反而都是“说释道义”,也无从确证。过度诠释,很容易失之蹈空。这是一个例证。但是,这样解说,把“道义”与具体事物加以区别,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主从关系,对后来注重义理阐发的学者却是有启示的。缪播说:“将言形器。形器,颜生所体,莫逆于心,故若愚也。”“将言形器”,是说孔子与颜回谈论具体事物。缪播认为,大道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彻底把握。其言外之意,是说颜回虽贤,尚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参考了孔安国的解释,并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孔安国所谓“道义”,在他这里变成“道”;孔安国说颜回能够“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在他这里被否定了。他按照道家学说阐释孔子这番话,把道家的道、器范畴移植到儒家思想体系中来。这是魏晋玄学家常常采取的思想路径。后来,同样服膺玄学的学者对缪播的见解表示认同。如皇《疏》:“此章美颜渊之德也。回者,颜渊名也;愚者,不达之称也。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为有,贤人所体也。今孔子终日所言,即入于形器,故颜子闻而即解,无所咨问,故不起发我道,故言终日不违也。一往观回终日默识不问,殊似于愚鲁,故云如愚。”皇《疏》的缺陷在于,既肯定此章“美颜回之德”,却又认为颜回所知者限于形器之“有”,而不达大道之“无”。照此说来,孔子对颜回的表彰,不过是从较为低级的思想层次出发。这是缪播和皇侃的诠释共有的缺陷。

玄学家所谓“道”与“器”,主要取资于道家理论。对这一对理论范畴更具有玄学特色的表述是所谓“本”与“末”。本末论鲜明地显示出“道”与“器”的主次、主从关系。从王弼起,历来的玄学家都讲本末论。但是,不同时期的玄学家对处理本末关系的实际见解则各有侧重。王弼主张崇本息末,鼓吹无为而治。中朝名士则主张以本统末,会通自然与名教。这样的变化,是受到政治形势制

约应运而生。现存的缪播《论语》注中较多提及本末,或将本末和名实相结合,或将本末和得意忘言理论相结合,并且出现了王弼“崇本弃末”的概念,王弼注经方法、魏晋玄学思潮对其深刻影响可见一斑。

三、注重学术经世

缪播结合阐述《论语》义理而谈本末,既有一定独创性,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学术致用性。其理论要点略如下述。

阐述诸侯王与皇权的关系及其兴亡规律。《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缪播说:“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则失之有渐。大者难倾,小者易灭;近本罪轻,远弥罪重;轻故过迟,重则败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他认为,包括诸侯王在内的权贵之家,其地位的确立总是有一定基础,其基础从动摇到丧失必然有一过程。基础雄厚者,一时难以瓦解;薄弱者,可能顷刻覆亡。若要维系安身立命的基础,就必须保“本”。在现实生活中,保“本”是困难的,可行的是力求“近本”,如此则罪轻而缓败;弃本者罪重而速亡。本来,孔子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重要性,而缪播则转换视角,讨论世家大族的兴亡规律。这种变化,已经是以致用于当前政治生活为主要目标,对文本阐释而言并无推进作用。

阐述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名实关系。《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子贡以自己与颜回作比较,选择的比照物是认知能力,得出的结论是颜回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异常突出,远胜于自己。至于颜回具有的这种能力的根源何在,子贡没有说明。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他善于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这就可以与玄学家的本末论相互联结。缪播正是从这一方面加以发挥。他说:“学末尚名者多,顾其实者寡。回则崇本弃末,赐也未能忘名。存名则美著于物,精本则美损于当时。故发问以要赐对,以示优劣也,所以抑赐而进回也。”这番话有三层意义。首先,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注重学习具体知识、技能,

并以此博得好名声。这既是评论古人,也是针砭时弊。其次,颜回注重优化自身素质、提升认识能力,而不去求名博利。这是缪播提倡的学风与士风。第三,关于士大夫的社会评价与实际情况脱节,难以避免。求名者容易称美于世,务实者见轻于人。这是缪播对于世情的深长喟叹。这样的解说,不是局限于《论语》本旨的发掘,而是对其加以发挥、延展。

阐述士大夫行为评价的标准。缪播认为,“仁”是评价士大夫行为好恶的根本尺度。《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皇《疏》:“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恶,是能好人、能恶人也。《论语·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这是说仁者因其“不佞”,故能好人、恶人。尽管皇《疏》后出,其说有不如其见解深刻之处。他说:“仁者,人之极也,能审好恶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恶。若未免好恶之境,何足以明物哉。”“仁”,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判断人们行为善恶的基准。这比皇侃只强调仁者不佞,认识更深入、更完善。他还指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应当拒绝主观情感。主观的情感会损害理性的判断,这是站在玄学家的立场对儒家学说的改造。《庄子·德充符》叙述,庄子与惠施论辩时,提出“人而无情”的观念,主张“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何晏进而提出“圣人无喜怒哀乐”,在当时颇有影响。^{[4](P.795)}缪播承袭其说,扩大其涵盖范围,把“圣人无情论”推演为评价事物的必要前提。这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已经超越孔子思想范围之外。

缪播既然认为“仁”是判断善恶的终极标准,也就为具体行为的权变开启了路径。《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颇为后儒生疑的事件。孔安国说:“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孔安国似乎对关于南子为人的“旧”说有些怀疑,但是,也没有根据否定它。所以,还是说“义可疑焉”。在缪播看来,即使真有其事,也不必大惊小怪。他说:“应物而不择者,道也;兼济而不辞者,圣也。”又说:“贤者守节,怪之宜也。”他认为,孔子为了行道而不拘泥于一定的途径,这正是他优入圣域的体现;而子路产生疑问,也很正常,因为他毕竟只是贤人,与圣人的见识不会没有差距。后

来,皇侃把这种观点说得更加直接:“灵公无道,蒸庶困穷,钟救于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钟不可以不应。应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见之。涅而不缁,则处污不辱,无可无不可,故兼济而不辞。以道观之,未有可猜也。”所谓“以道观之,未有可猜”,略同于《庄子·齐物论》所谓“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而圣人如处中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借助皇侃对缪播见解的转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缪播是用道家理论为子见南子作辩护。需要说明的是,缪播坚决排斥文过饰非的小人作风。他对《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一句的解释是,“君子过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务在改行,故无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后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过可复改也。小人之过生于情伪,故不能不饰,饰则弥张,乃是谓过也。”像这样辨明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可以在理论上防止权变论的滥用。

缪播以“仁”为本的理念贯彻到人生价值与遭际穷通的判断。《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缪播曰:“仁居理足,本无危亡,然贤而图变,变则理穷,穷则任分,所以有杀身之义。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在他看来,志士仁人往往没有好的命运,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而是特定条件下的必然结局。他所主张的“任分”观,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缪播解释道:“死生者,所禀之性分;富贵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养

之以福,不能令所禀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贾,不能遭时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为言,自然之势运,不为主人之贵贱也。”他认为,士大夫自身所能做到的,只有“修道以待贾”。人之死与生,取决于自然禀赋;其贫富贵贱,取决于社会际遇。简单地设想修道行仁就可以拥有锦绣人生,其结果往往会令人失望。他在解说《论语·卫灵公》所记孔子“有教无类”句时也说:“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谅深。生生之类,同禀一极,虽下愚不移,然化所迁者,其万倍也。若生而闻道,长而见教,处之以仁道,养之以德,与道终始,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论之也。”

缪播生活在西晋“中朝”乱世,先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所倚重,终又为司马越所害。由此可见,其不乏“平天下”之志,堪为旷世之才。然其又是生活在玄风日盛的魏晋时期,难免援玄入儒,以玄释经,用玄学的观点去诠释《论语》。他徘徊在尊儒与宗道之间,在尊圣宗经和崇老尚道中寻找统一、追求协调。在王弼之后,缪播及其《论语旨序》对东晋普遍以玄学注《论语》,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翁方纲.经义考补正[A].丛书集成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南山)

英雄心灵的成长

——《年轻小伙布朗》与《阿拉比》比较研究

叶 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和许多现当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年轻小伙布朗》和《阿拉比》蕴涵了一些神话元素和神话模式。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内心的冲动和欲望,踏上了冒险之旅。在经历了出发、在路上和归来三个阶段之后,他们分别痛苦地顿悟到人性的邪恶和理想的虚妄,这不仅凸显出英雄的悲剧性,更揭示了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升华正是人类了解自我,完善自我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神话模式; 英雄; 冒险; 顿悟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73-05

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态势,在诸多批评理论和批评模式中,原型批评无疑是百花丛中一朵奇葩。依托弗雷泽的神话人类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弗莱的综合性原型研究,文化人类学可以挖掘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象和隐喻,使得文本里的主人公仿佛进入到当下流行的穿越剧,返回到人类的原初时期。于是,似乎存在着一只隐形的“上帝之手”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的文化图景和心理体验串联起来,令众多原本似乎并无关联的文化图景和心理体验显现出惊人的“同质性”。

“原型”一词意指最初的模式,乃是集体无意识中呈现出的具体内容,其后人类历史中所有与之相似的事物无不效仿这一模式。荣格认为:“原型即领悟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相通。”^{[1](P.48)}他进而断言:“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这种镌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

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1](P.49)}

经过长期对人们这些心理的分析,卡尔·荣格指出文学创作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原始意象”在人们“无意识”中被激活,继而对其进行加工制作,直到形成具有相对完整结构和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秘藏于人们心理洞穴之中的集体无意识部分,就是人类在其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累积形成的“同质文化”,是人类心灵中抹灭不去,记载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不仅如此,这些共通或共同的“记忆碎片”,由于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通过人类经验的多次重复后而形成的,它们往往以生、死、再生、季节变化等意象出现在文本里,自然能够把存在于读者意识之外的集体无意识经验激发出来,从而在读者和“记忆碎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后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

通过对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文本进行归纳,可以从中梳理出多种原型模式。比如,将“死亡——复活”这一常见的模式,结合英雄神话原型的解读,进一步扩展为“生——死——复活”这一

[收稿日期] 2015-09-20

[作者简介] 叶青,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有着循环模式的母题,无疑给人类古老的神话赋予了恒久的象征意义,并且把意义的渊源,联系在人类的原始仪式和亘古之梦上,这就使得文本批评不仅笼罩在一层神话特有的神秘氛围当中,而且可以理清诸多文本外在纷繁芜杂的形式,深入到隐含的文化层面中去。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可以从文本中探寻出隐蔽的神话模式。批评家相信:“蕴藏最深的思想超过了某种作品乃至许多作品的思想,必须在原型象征物中去寻觅。”^[2](PP.138-139)

短篇小说《年轻小伙布朗》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新英格兰殖民地为背景,描写清教主义摧残人的精神,压抑人的自然属性,造成了人们思想矛盾、言行不一等违反人性现象。《阿拉比》是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1913年出版的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经典名篇。它描述一个孩子对朦胧爱情的追求,以及主人公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之后而产生的失望心理。本文拟就原型批评理论中的英雄历险模式,探讨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为实现各自目标和理想踏上冒险之旅,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挫折之后,回归社会后思想上和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变和顿悟。

一、文学中的神话

未谙世事的布朗在黑夜来临之际,前往阴森恐怖的大森林奔赴魔鬼之约,最终探求到人性“罪恶”的真谛;情窦初开的小男孩独自一人在茫茫夜色中,前往有着阿拉伯异域色彩的大集市去购买礼物送给心仪的姑娘,结果顿悟出爱情的虚伪和人生的无奈。其实,这两篇小说都隐藏了和古希腊神话相似的情节模式和话语结构。“神话和仪式的主要功能一直是提供把人类精神向前推进的象征符号来抵消经常出现的、把人类精神拖住使之无法向前的人类幻想。或者可以把仪式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新生”^[3](P.345)

文学中的神话和原型象征通常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模式。最常见的是未经移位的神话,讲述神祇和魔鬼的故事,并着力打造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抗争,而凡间的人们往往是支持一方去反击另一方。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尤其是古希腊神话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模式涉及一个在神奇世界中,所发生的与人类生活和经验非常类似的,有着

隐约神话成分的故事,也被称之为传奇,《年轻小伙布朗》是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最后一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作者意图通过一个故事的内容和延伸寓意,而不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来揭示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比如人类生存困境或者个体心路历程等等,《阿拉比》则可以纳入到这类模式。

神话文本里的主人公大都具有鲜明的英雄气质。英雄也分两种类型,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既有强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力量,而且拥有坚强的意志品质。他们面对重重困难时能够凭借强悍的力量和超凡的毅力,战胜敌人,造福人类,从而获得百姓的欢呼和拥戴。希腊神话中此类英雄人物比比皆是,如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等。相比之下,后两类文学作品,通常蕴含着一些现代主义元素,所刻画英雄形象有意忽略了英雄的外在特质,不再强调身体上卓越的禀赋,而是关注他们是否能超越物质生活的层面,转而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在现代派作品中,故事情节的似有若无,人物形象的扑朔迷离以及作品意义的抽象性、象征性也是明显的特征。”^[4](P.22)真正的英雄,一般都是特立独行的个体,绝不会想当然地接受世间的一切规范和要求,所有总是显得和社会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外表是否强悍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总是因为怀有不为常人所理解的目标和理想而焦虑不安。为了实现理想和目标,他们殚精竭虑离开长期一直生活的社会环境,踏上难以预测的险途。一路上历尽坎坷,他们却执意前行,毫不放弃,充分体现了英雄气质。与此同时,无论英雄是否能够实现目标,其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甚至会打上深深的悲剧性烙印。所以,和传统意义上总是大获全胜的英雄相比,现代社会的英雄通常是悲剧性英雄。

二、出发

正如坎贝尔在《神话的力量》中所言,“一个社会需要英雄,因为时代需要强有力的英雄形象,凝聚时代的精神”^[5](P.163)。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夫俗子,在于他们不满足浑浑噩噩、平平淡淡的世俗生活。他们较普通人具有更明显的“忧郁气质”,有着更多的个人思想,会去安静地思考生活中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会去批评和挑战所谓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时

他们会“异想天开”，被一些常人所忽视的“奇思怪想”所困扰，然后在莫名的冲动和欲望驱使下，去探寻，或企图去实现这些“妄想”。此外，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集合体，人的自然属性诱使个体去追求，去实现各种各样的本能欲望。西方社会工业化之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交锋愈演愈烈，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文明的享受，迫使自然属性不住地往后退缩，直至退守到无意识之中，很难被人们所察觉。

布朗所生活的时代弥漫着浓浓的清教主义气氛。当时，正值美国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迅猛发展，“工作”和“节欲”是清教思想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两大基石，也是美国走向强盛的内在动力和源泉。众多美国民众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发财致富的浪潮当中，很少有人关注心灵的需求和渴望。一旦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清教信条，哪怕是小范围从事和心灵有关的任何活动，都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遭致无情的镇压。1692年，就在小说的发生地萨莱姆，有十九名妇女，因为所谓从事“巫术活动”的罪名，被送上了绞刑架。霍桑的祖辈就是当时三个主审法官之一，这件载入史册的耻辱回忆一直困扰着霍桑，使得他终身都在思考和拷问清教主义在人们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影响，这也直接在他多部作品中有所体现。

就像其名古德曼(Goodman)所暗示的那样，布朗是个为社会所认可的，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可是他和许许多多谨小慎微的“好人”相比，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恪守教规，相反，多了一些激情和冲动。所以在新婚三个月之时，布朗内心涌动着一股不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暗流，内心的欲望和秘密让他既兴奋，又紧张害怕。尽管考虑到未来之行有违教规，尽管美丽的妻子再三哀求，冲动还是战胜了理智，他依然铤而走险地去奔赴探求心灵之旅。和《阿拉比》中小男孩一样，布朗之所以成为一个英雄，是因为他契合了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中提到的英雄概念，即“英雄是能够成功地战胜自己的和当地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成为一般能产生效果的，具有常人形象的男人或女人。这种英雄的远见、卓识和灵感来自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的原始源泉，因此他们所清晰显示的不是处于崩溃状态的当代社会和心灵，而是社会在其中重生的永不干涸的源泉。”^[6](pp.14-15) 作为能够给后人带来思想启迪的文化英雄，他们能够忘记，哪怕

是暂时忘记即将实施的行为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灾难，转而响应心灵的呼唤，挣脱宗教，法律和道德的束缚去体验心灵里那未经扭曲的原初情感和经验，即自古以来深埋在人类内心里的欲望。根据神话原型理论，英雄的悲剧性都是由其自身的弱点所造成的。布朗的弱点在于他过于的单纯和太强的好奇心，而单纯和好奇心正是人类自然属性中重要的特征。于是他无法拒绝“魔鬼”的召唤，参加了具有神秘性质的聚会。布朗离开村子，向森林里迈出的每一小步，却是人类在探索心灵世界的旅途上跨出的一大步，对人类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人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再认识自我的循环往复过程。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人在出生后的6—18个月处于“镜像阶段”，主体通过镜中的形象，形成了对自我的初步认识。此时，幼儿错误地将镜中的影像误认为是自己，这一误读所造成的永远的失落感强烈地暗示了主体的悲剧性命运。《阿拉比》前两段对于街道和死去的牧师的描写，揭示了“我”生活在孤寂、无聊、沉闷、压抑和冷漠的现实中，然而内心向往光明和美好的火苗却没有熄灭，对未来的憧憬，对生活的向往投射在对“曼根姐姐”的单相思上。因此，“曼根姐姐”只是主人公所有理想的经验化身，经验自我所处的生活环境则是陈腐和没落的；相反，阿拉比集市充满了神秘和未知，对于生活在爱尔兰都柏林的经验自我来说具有一种异域文化的所指。所以，故事所讲述的经验自我历经周折前往的阿拉伯人的集市，无疑是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的对立面，仿佛是可以脱离百无聊赖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国”。与此同时，“我”对“曼根姐姐”的痴迷暗恋，实际上是将她幻觉化了，是个人欲望和理想在他人身上的投射。小说丝毫没有从细节上渲染“曼根姐姐”的美丽，甚至她的五官特征都没有提及；相反宏观上，她的整体轮廓、服装和首饰对“我”产生的印象和视觉冲击跃然纸上：“她边说话边把手腕上的一只银镯转来转去……从我们门对面的那盏灯发出的光投到她白色的颈项上，衬托出她颈项姣好的曲线，并且亮泽了她那倾泻在颈端的柔发，随后顺着发梢下泻到她那扶着栏杆的手上。光线射到她衣裙的一侧，刚好衬托出在她随意站立时碰巧看得见的衬裙的白色花边。”^[7](p.32) 所以这个虚幻的、而且有着朦胧的光亮的邻家小女孩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所指，只

是成为“我”白日梦的内容和对象。

无独有偶，布朗的冒险之旅开始于黄昏，而“我”出发之际，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此时，大多数人开始准备脱离现实中的自我存在，转而进入梦乡；在这夜深人静之时，个体中的“本我”开始挣脱现实社会里诸多戒律的束缚，转而迎接心灵的召唤，踏上了追梦之旅。

三、在路上

“一旦穿过阈限，英雄就在奇怪的，变幻不定、模棱两可的，梦也似的景色中活动，他必须在这种环境中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并活下来。”^{[6](P.95)}

布朗一离开日常生活的村庄，立刻进入到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世界：走在凄清的小路，周围都是遮天蔽日的阴森树林，蔓延开来的树叶仿佛把道路都封闭起来，每棵大树后感觉都藏着鬼怪精灵。一旦踏上旅途，面对现实的，抑或潜在的困难和危险，常人都难免踌躇犹豫，最终会知难而退，返回出发地。但是真正的英雄在旅途上，虽然也会有短暂的犹豫和畏惧，有时也会遇到似乎难以跨越的鸿沟，但最终会在拥有超自然神奇力量的帮助者的扶持下，一步一步向着目标前进。陪伴布朗走完旅程的神秘人物五十岁开外，无论外表还是神情都酷似布朗，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给人印象是谙于世事，见多识广。更神奇的是他随手带有一根黑色手杖，雕刻精美，仿佛一条扭来扭去的大黑蛇。其实这个神秘的引路人，不是别人，正是布朗的“本我”。

“如果任何人——无论他在何种社会之中——有意或无意地到黑暗领域去冒险，下降到他自己精神迷宫中的曲折小巷里，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已处于充满象征人物的景色之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能把他吞食掉，这种景色与荒凉的西伯利亚险阻和圣山同样神奇。”^{[6](P.98)}在冒险的征途上，布朗的“本我”和“超我”一直处于激烈的对抗过程中。一方面，他妻子的名字菲思，英语是 Faith，乃“忠诚”和“信仰”之意，指涉着清教主义。由于惧怕宗教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谴责，布朗几次试图挣脱“本我”的诱惑，重新回到菲思身边（重拾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邪恶的本能欲望的好奇和向往，加上沿途发现许许多多素日令人敬仰的人——威严的总督、德高望重的教长、孩提时的老师、乃至自己纯洁的妻子——莫不都在参加魔鬼大会，他更加坚定了前进的步伐。村庄象

征着社会人的现实生活场域，人们的思想行为无时无处不受到宗教思想和社会道德的约束，黑森林则象征着自然人的潜意识领域，充满了本能和狂野的欲望。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失望，“本我”从背景走向前台，逐渐彰显出强大的统治力，最终促使布朗远离村庄，迈向森林的深处去领悟人性的真谛。

无独有偶，《阿拉比》里的小男孩的寻梦之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和艰辛。表面上，因为迷恋曼根姐姐，小男孩执意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冒险去未知的阿拉比集市选购礼物；事实上，这种朦朦胧胧的情欲只是他诸多妄念的浓缩和象征而已。在旅途上，布朗内心中“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使主人公备受煎熬；小男孩所受到的困扰却是“妄念”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寻梦这个阶段，“用神秘主义的话来说，这是‘道’的第二阶段，是‘净化自己’的阶段，在这阶段中感官被‘洗净和贬低’，而精力和兴趣则‘集中于超凡脱俗的事务上’。”^{[6](P.98)}对于这次“神圣的旅程”，他婶婶不仅没有像他所期盼的那样给予热情的支持，反而担心他会参加不好的宗教活动而加以怀疑。他叔叔虽说当天一大早就允诺资助他，事实上也是敷衍他，根本没有当一回事，所以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到家，使得去阿拉比的计划被耽搁了很久。这一切无疑给他的旅程带来了困难和心理上的打击。“这种奇怪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意识地认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而生活实际却很少与我们所意识的相一致。”^{[6](P.118)}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列车，可是列车不知什么原因又推迟了许久才出发。两次延误反映出在现实面前，小男孩内心的妄念显得十分苍白。一路上，空寥的车厢里，始终只有他一个人。虽然小男孩并没有遭遇到世俗意义上的危险和麻烦，但是孤独和无助，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精神上莫大的痛苦和折磨。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婶婶的怀疑，固执地等待叔叔回家，最后在常人入睡之时鼓足勇气一个人乘火车来到阿拉比，充分体现了英雄特有的不屈不挠的气质。

四、归来

无论冒险的征途多么漫长，多么险恶难料，也无论最终命运如何，英雄始终要回归原先生活的世俗世界。正如布朗所经历的那样，“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互不相同，这两个世界的差异就像生和

死,白昼和黑夜一样。英雄离开我们所知的世界到黑暗世界去冒险……他的归来就像从那遥远的地方回来。然而——这两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神的世界是我们已知世界的一个被遗忘的方面。英雄的业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去探索那个被遗忘的方面。”^[6](P.223)

对于布朗来说,短短的一夜之行,恍如隔世。次日早晨回到熟悉的村子,他再也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笃信上帝的纯真小伙了。经过这次心灵洗礼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人类的本性,但是由于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幻灭,丢弃了自己原先的清教主义信仰,对人性的邪恶有着前所未有的洞察。此后每当看到教士们在虔诚地布道传教,他嘴角边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讥讽和不屑;每当自己家人一早一晚跪下祈祷时,他就满脸阴云,恶狠狠地盯着妻子,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可以想象的是,他会在一些场合,比如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挑战和质疑宗教的虚伪和信徒们的无知,但是他的经历和论调都会被众人呵斥和嘲笑。从此,他被从世俗社会里排斥出来,成了“局外人”(outsider),成了一个“疯子”。虽然他寿命很长,但由于悟透人性本质以及世俗社会的虚妄,无形中周围世界水火不容,导致心灰意冷,直至在寂寥中走完人生之路。

不同于布朗对于宗教思想以及人性本质的领悟,表面上看,小男孩历险所收获的是对情感的顿悟。他把所有个人美好的情感都寄托在曼根姐姐身上,而阿拉比则是实现自己理想的美好“精神家园”。然而漫长的等待,加上阿拉比途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集市上那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之间的打情骂俏让他顿然醒悟过来:理想中的阿拉比和现实中的阿拉比有着天壤之别,而自己所追求的纯真情感到头来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幻想破灭之后,小男孩不免陷入到噬人心肺的痛苦和愤怒之中,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随后必然直接导致他降低了对自己的个人价值评估。然而,对于现代主义大师的这部经典小说,我们不能局限于“爱情破灭”,甚至“宗教幻灭”的浅显主题上,而应该从更广阔的现代主义视野中去解读作品。众所周知,现代主义作家们一直困扰于人类理想的缺失,正如“上帝死了”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对宗教的不信任和摒弃,而是反映出现代社会中个体长期漂泊在精神的“荒原”上,找不到心灵的归宿。《阿拉比》实则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宣言书”,是所

有不甘沉沦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发自内心深处彷徨和无望的呐喊。

五、结语

根据对古代神话的研究,不难看出悲剧性的故事都呈现出以下这样一个结构:社会中的英雄起初执迷于一个不为常人所认可的“观念”,由此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然后必然要做出不同寻常的艰难选择,从此踏上了实现自我的漫长艰苦旅途,一旦到达旅途的终点,找到了某一个人生重大命题的答案之后,他难免遭受更大的心灵上的痛苦。从出发,到上路,再到归来,布朗和小男孩不断跨越阈限,他们的历险更大程度上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同样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探险。历险归来,代表英雄走完人生旅途的一个阶段,这恰好复制了“生——死——复活”神话模式。虽然他们重新回归到原先的社会当中,但是已然不是原来的自我。他们透过人生的表象,探索到人性的邪恶以及理想的虚妄,无疑是个体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心灵的成长所带来的精神升华,对于人类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有着普世意义,所以“叙事和小说剥揭了人生的重重真相,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皆心悬其上。唯有此类叙事,人若时时出神阅读,便处于直面自身命运的境地。”^[8](P.397)

[参考文献]

- [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荣格文集,卷九,一分册[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
- [2][英]魏伯·司各特. 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 [3][英]布林·莫利斯. 宗教人类学[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 [4]袁可嘉. 现代派论·英美诗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5]Campbell·Joseph. *The Power of Myth* [M]. New York: Doubleday,1988.
- [6][美]坎贝尔·约瑟夫. 千面英雄[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7]James·Joyce. *Dubliners* [M]. London: Penguin Books,1956
- [8][法]罗兰·巴特. S/Z[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南山)

《郊区佛爷》主题意义的认知诗学视角解读^{*}

陈俊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淮安 223003)

[摘要] 《郊区佛爷》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巴基斯坦移民后裔作家哈尼夫·库雷西的首部半自传体特点的小说,它以主人公克里姆的成长为中心,描写了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及其后代在英国伦敦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本文尝试以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来分析该小说图形化人物的刻画,进而挖掘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与主要人物的心理认知互动过程,从而更加充分地解读小说的主题意义。

[关键词] 认知诗学; 图像—背景; 人物刻画; 主题意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78-03

引言

《郊区佛爷》的作者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是当代英国颇具影响力的巴基斯坦裔作家,他以这部发表于1990年的小说获得了惠特布莱德(Whitebread)文学奖。《郊区佛爷》主要以半自传体口吻描述了主人公克里姆——这个出生于伦敦、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英国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所经历的第二代巴基斯坦移民的生活。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小说时,就会发现作者哈尼夫·库雷西除了对小说中人物的成长、身份的转变这条主线着以重墨描述,作者还藉此来反映更为深刻的主题思想。因此,笔者尝试运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来分析读者与小说中人物的互动认知过程,进而更为充分地解读小说的主题意义。

一、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

认知诗学是21世纪初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 Tsur(1992,2008)首先论述了认知诗学,他认为“认知诗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运用了认知科学的一些分析工具,来

探究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如何影响和制约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为文学文本结构与所感知效果之间的关系做出系统的解释。^{[1][2]} Gavins & Steen (2003)合编的《认知诗学实践》为认知诗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认为,认知诗学是既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又与认知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研究。Stockwell (2002,2007)认为,认知诗学是“关于文学的阅读”^{[3](P.165)},就是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3](P.5)},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式”^{[4](P.135)}。认知诗学的理论主要包括概念隐喻、图形—背景理论、脚本和图式、文本世界理论、可能世界理论以及心智空间等。其中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诗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最早由丹麦心理学家Edgar Rubin提出,即人的知觉场在头脑中被分为图形和背景两个部分,图形就是感知的突显和注意的焦点部分,这与文学批评中的“前景化”相对应,“文学创新和创造性表述可以被看作以日常非文学语言为背景的前景化”^{[3](P.14)};背景指的是为了突出图形的衬托部分。Stockwell (2002)还认为,“在大多数叙事虚构作品中,人物是图形,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背景”^{[3](P.15)}。文本叙事者通过聚焦的选择,通过各

^{*} [基金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511049046X),淮阴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GC1417)

[收稿日期] 2015-09-20

[作者简介] 陈俊,男,江苏涟水人,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种各样的方式取得文本表达的前景化,如不寻常的命名、独特的描述、偏离常规的语言、丰富多样的文体特征以及创造性隐喻的使用等”^{[3](P.14)},让读者在与小说文本的互动过程中,让自己的注意焦点在图形与背景两种不同的信息中转换,在认知上紧紧跟随更重要、更突出的前景化内容——图形,并在焦点所组成的背景里,实现对小说主题意义的探索和解读。

二、《郊区佛爷》的主要人物图形刻画

1. 主人公克里姆

《郊区佛爷》构建了以男主人公克里姆为图形,以伦敦郊区、伦敦市区以及纽约为物理背景,以所涉及的其他人物如克里姆父亲哈龙、克里姆母亲玛格丽特、哈龙的情人伊娃、伊娃的儿子查理、叔叔安瓦、安瓦的女儿杰米拉、安瓦的妻子琪塔、钱格兹、雅米、海伦、导演派克、伊琳诺等一系列人物作为小说主要人物克里姆的人际背景,从而展开故事的情节。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克里姆毫无疑问地充当了这篇小说的图形性人物。那么,主人公克里姆是如何被“前景化”、成为感知的突显和注意的焦点部分的?即克里姆这一人物是怎样成为图形的?

《郊区佛爷》这部小说是这样开篇的:“我叫克里姆·阿米尔,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人们常认为我是那类可笑的英国人,就像是从两种古老历史里冒出来的新品种。^{[5](P.3)}”这样的开头是一段自我介绍,交代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地、血统等。而且这样自述性的口吻,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Stockwell(2002)在其《认知诗学导论》中提出,“在视觉视野或文本视野中,相对于静止的背景而言,移动的物体更易在文本中得以突显”^{[3](P.15)}。在小说《郊区佛爷》中,克里姆从一开始在其出生地伦敦南郊的没有归属感、对自己身份的迷茫、渴望刺激和变化,到一天父亲回家的神秘举动,继而通过父亲认识他的情人伊娃及其儿子查理,接触到性、暴力、烈酒、音乐等令他刺激的元素,再到克里姆这一“混血”身份在舞台上的表演,最后转到纽约又回到伦敦,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家的归属感。克里姆自己听到了、见到的和身体体验、感知到的人和事,构成了他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体。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跟随克里姆一同经历了这些“鲜活”人物和事件,这无疑将克

里姆这一“移动的”人物形象突显在小说中其他人物前面,让读者认识到克里姆这个图形化人物。图形化人物克里姆的生活、学习、工作(戏剧表演)的变化,使得物理背景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作者让克里姆从其出生地伦敦南“郊区”的家庭,移到社区,到学校,然后到伦敦市中心,再到纽约,最后又回到他的家乡伦敦。图形化人物克里姆在这一系列背景中存在、活动,并得以突显,成为被注意的焦点。

2. “郊区佛爷”哈龙

克里姆的父亲哈龙作为第一代印巴移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印度来到英国,根据克里姆的叙述,“爸的家族送他来英国是为了接受教育。……爸将会回到印度,成为标准的、优雅的、在大厅里翩翩起舞的英国绅士律师”^{[5](P.37)}。然而父亲哈龙初到英国时,生活比较贫穷,后来和英国人玛格丽特结婚后,感觉生活变成了牢笼,与妻子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工作也很无聊。可以说,这时哈龙感觉自己并不成功。直到有一天,他在布朗商业街酒吧楼上的“快乐写作班”里认识了伊娃,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逐渐对东方的古典哲学感兴趣,每天工作一回到家,就让克里姆给他读《女子瑜伽功》的书,而且要一字一句念清楚,自己跟着学习、练习瑜伽。哈龙对东方的古典哲学、佛教思想的“研究”(实际是一知半解)、对瑜伽的勤奋练习,使得他在西方人看来具有东方的智慧。因此,在情人伊娃的引荐下,他经常在南伦敦郊区白人们场所里出没,为在精神、思想方面遇到困惑的人们排忧解难,这样他便很快成了南伦敦郊区白人们精神方面的“指导老师”,摇身变成了“郊区佛爷”,作者使用了这一不寻常的命名。

克里姆的父亲哈龙,自从他移居英国以来,就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地道的英国人,而在他一步一步成为“郊区佛爷”的过程中,他是被“前景化”的人物,是突显的部分和注意的焦点。这时在家里,哈龙是图形化人物,他要求儿子克里姆为做事,如拿报纸、读瑜伽书,妻子玛格丽特为他在厨房里忙活,而家里的客厅、卧室、厨房等充当了物理背景,这时的克里姆、玛格丽特、克里姆弟弟则成了人际背景;而在社交场所,哈龙像个“魔术师”、“圣人”,成为白人追随者们模仿、学习的对象,继而跻身于伦敦的上流社会。这时情人伊娃、白人追随者们成为背景性人物,而哈龙突显于这些背景性人物,成为图形化人

物,实现了该人物的“前景化”,成为除主人公克里姆之外的又一位主要人物。

三、《郊区佛爷》主题意义的突显

小说作者通过对文本中的某些内容突显,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小说的叙事焦点,这一焦点被前景化,同时作者能借此充分地表达小说的主题意义。后来学者们将前景化理论引入文学认知的研究。苏晓军认为,“一方面,某些前景化手段的存在会引导读者进行语篇的解释与评价;另一方面,读者也会为满足自己阅读文学语篇的审美而去寻找这些手段”^[6]。因此,前景化与读者对小说语篇的解释、评价、审美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对小说主题意义的解读。”在小说《郊区佛爷》中,作者哈尼夫·库雷西主要通过语篇层面的叙述以实现文体的前景化,通过对叙述者的突显来引起读者的关注,让读者在其阅读的过程中用自己的认知去判断、选择图形与背景,同时随着作者所建构的图形化人物,运用自身的知识背景和阅读文本时刻的联想,更加深入地探究小说的主题意义。

小说《郊区佛爷》的开头便是克里姆的自我介绍,特别交了自己的出生地伦敦南郊,虽出生于伦敦,却觉得自己“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并感觉自己“身上有不同大陆和血统的奇异混合、归属感似有似无”。这样开头叙述方式极易激发读者阅读的好奇心:为什么克里姆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什么他身上具有混合血统,归属感飘忽不定?在读者找寻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使得读者与文本之间产生互动,读者将注意力聚焦于叙述者克里姆身上。作者通过“我”即主人公克里姆的视角,叙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反映克里姆的心理体验,向读者展示了克里姆的心路成长历程,也反映了这群印巴移民在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反文化运动这一特定时期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以及后殖民、后帝国时代伦敦的社会变迁。

封宗信认为,“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篇的书面形式对阅读过程中的认识系统信息处理和记忆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7](pp.22-28)小说《郊区佛爷》通过主人公克里姆的自我叙述来透视人物内心,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从而让克里姆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克里姆得以前景化、图形化,读者聚焦于此,仿佛有种身临

其境之感,跟着作者的文本聚焦、主人公的叙述,进入到他的成长世界,体会他的心路历程——心理变化、精神成长、身份判定,进而引导读者对这一语篇的理解、评价和审美。其间在主人公克里姆的生理、心理成长过程的相关人物、场所成为背景。小说从开头的身份模糊、没有归属感到将要去伦敦表演前遇见白人查理,并心想“我要变成他,我妄想拥有他的才智、相貌、风度,我想一觉醒来这一切全都转移到我身上”,然后到认识查理后接触到的当时伦敦社会所存在的性、暴力、毒品、烈酒、音乐等流行元素,此时克里姆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着空间变换所带给他的全新感受,到后来伦敦表演时让他扮演印度人物角色,再到后来的纽约短暂之旅,让克里姆对派克、伊琳诺、查理等人有了清晰的认识,也使得他不由得怀念起生他养他的伦敦,最后克里姆心里这样想着,“我坐在我深爱的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央,而它本身便坐落在一座小岛的最低处。我身边围绕着我所爱的人,快乐和忧伤同时涌上了我的心间。我想,以往经历的一切多么混乱,但将不会一直是这样。”更是将读者的注意点吸引到经历了生活、工作、甚至那个时代洗礼的主人公克里姆这个角色上,作者也正是籍此来反映当时时代变迁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族、阶级、身份等社会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2]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Second,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M]. Brighton/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 [3]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4]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J].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2007(1).
- [5] 哈尼夫·库雷西. 郊区佛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 [6] 苏晓军. 认知文体学研究: 选择性述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7] 封宗信. 论文学语篇理解的认知心理学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S1).

(责任编辑 南山)

李翊云小说中异化与归化的语言策略

李 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英语系, 江苏南京 211156)

[摘要] 李翊云是继哈金之后又一位得到美国主流文坛认可的华裔作家。李翊云的英语小说内容大多聚焦于现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和内心书写。为了生动地描写小说中的中国元素,作家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手段将大量的中国成语、俗语、古诗词、中国特色词汇等巧妙地翻译成英文,形成了一种有中国韵律的、独特的语言风格。李翊云小说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不但增添了作品的异域情调,强化读者的审美体验,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

[关键词] 李翊云; 异化; 归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81-06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1996年赴美攻读免疫学博士。1997年凭兴趣参加社区英语写作培训班。老师一句“你应该好好写,争取有一天能让作品发表”的鼓励,使她毅然弃理从文。2003年开始,她的短篇小说陆续在《巴黎评论》《纽约客》等著名文学杂志上发表。目前,李翊云共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金童玉女》;两部长篇小说《漂泊者》《比孤独更温柔》。虽然步入文坛的时间不长,作品也不是很多,却屡获国际大奖。2004年获得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年度新人奖。2005年获得海明威小说处女作奖,《卫报》新人奖,并以全票获得了奖金最高的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2007年入选《格兰塔》杂志评选的美国21位35岁以下最杰出青年小说家名单。2010年被《纽约客》评为全美20位40岁以下最值得关注的年轻作家之一,同年还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基金。

美国评论界普遍认为李翊云的英语运用自如,娴熟得如同母语一般。李翊云小说的特色之一就是有用中国韵律的英语,以跨越中美两国文化的视角,写中国人的故事。一位文学编辑曾经对她说:“有些话只有你能写出来,而别人写不出

来。这就是你要当作家的原因”^[1]。

一、李翊云小说的文化翻译性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从本质上看,跨民族的行为是翻译性的^[2]。文化翻译自然离不开两种语言的互动,不过这里所说的文化翻译者的“原文”,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原文”,是文化翻译者所理解的家园的文化和历史。他的译文可以是一部文学作品或一件艺术品^[3]。李翊云作为一个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中国移民作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跨民族旅行者,她故事的内容均来自她过去的“家园”中国,虽然她的小说不是译著,她用英语创作中国故事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翻译性。

和其他移民作家一样,李翊云面临着要描述的中国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在英文中没有对等表达的困境。如果把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内容限制在标准英语的范围内,那么作品的中国特色和作家的中国身份就会丧失殆尽。哈金说过“一旦我们在小说中进入外国领土,标准英语可能不得不延伸以便覆盖新的版图”^[4]。李翊云在其作品中常常用到的让美国读者读来颇为新奇的有中国韵律的英语,就是哈金提到的“标准英语的延伸”。这

[收稿日期] 2015-07-10

[作者简介] 李冰,女,黑龙江大兴安岭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英语系讲师。

种中国英语在李翊云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在《漂泊者》中,一个老妇人以为男孩童童要偷她的鸡,就对他说,“你看我的鸡干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打的什么小算盘。”为了体现出这句话的中国特色,作者把它写为“Don't think I didn't hear that little abacus clicking in your belly when you looked at my chickens.”^{[5](P.154)}。可以看出作者在处理这句话时,为了使译文符合英文的逻辑和习惯,添加了hear和clicking两个汉语原文中没有的词,但句式和措辞保留了中文的说话习惯,这句中文司空见惯的习语,对英语读者来说却是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

二、异化与归化

为了使小说中的中国英语既不失英语的规范,又保留独特的异域特色,李翊云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认为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6]。“归化翻译的本质,是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规范,使译出语的文化特色基本消失不见,‘洋味’不显,‘重神似不重形似’,甚至是‘得意忘形’。译入语读者读这种译文时,感觉仿佛是在读一篇用母语写成的作品,从而产生认同感、融合力,或者说是一种亲和力。”^[7]异化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翻译的宗旨,就如同让一个人到国外去旅游,所希望的是尽量使旅游者看到异域风情、他国民俗^[7]。

在相互关联的全球化空间里,差异的表述已是文化和政治的需要^[3]。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里,人们似乎更喜欢从其他民族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文化。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的作品在美国大受欢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那些中国著名作家的中文小说的英文译本,在美国却少有人问津。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曾经说过,“美国人不怎么看重翻译的东西,他们对翻译总是有些怀疑,而美国人又懒得学外文,所以就只看英美的作品”^[8]。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红高粱》,在美国的发行量十几年累计下来也只有区区两万册。许多中国小说的情节翻译起来没有问题,但其叙事语言的不可译性是很明显的^[8]。而李翊云以移

民作家身份在美国创作的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人故事为主题的英文小说,却能成功的突破美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叙事语言的不可译性两道障碍,成功的在美国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与其能巧妙的运用异化与归化的语言策略,成功的将陌生的中国情境带入英语世界有很大的关系。以下将以《千年敬祈》、《金童玉女》和《漂泊者》三部作品中的语料为例证,来分析李翊云小说的语言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法在李翊云小说中的运用

李翊云小说语言堪称异化与归化翻译法的完美结合。文学评论家 Ciabattari 盛赞李翊云为“中国的契科夫”,认为“她的英语甚至比许多美国作家都好”^[9]。李翊云小说语言一方面简洁、明快、流畅,颇具海明威的风格,另一方面其小说语言中又明显的带有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印记:如一些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如“古老的银杏树”,“an ancient ginkgo tree”^{[10](P.134)};“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a white lotus blossom untouched by the surrounding mud”^{[11](P.72)};一些中文习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译为“for each drop of water one received has to repay with a well”^{[11](P.26)};“菩萨心肠”译为“a Buddha's heart”^{[5](P.126)},等等。这种独特的语言生动的表现了小说的中国情境,不但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也使作品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1. 异化法在小说语言中的运用

刘宓庆在《文化翻译纲论》中把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由表及里、由简到繁、由有形到无形地分为四层:物质形态层、行为习俗层、典章制度层和心理活动层,并最终归统于语言文化之中^[12]。李翊云与其他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汤婷婷、谭恩美等不同,她不会去描绘中国人在吃、穿、住、行等表层方面或物质层面的不同,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大多体现在中式思维方式和心理层面。李翊云小说语言的中国文化信息及中国情调,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词语,中式比喻和习语,及古诗词和典籍的运用等几个方面。

(1) 中国特色词语

中美两国文化差异巨大,许多中国特色词语在英文中是没有对等语的。如何将这些词准确而又不失中国风味的翻译成英文,是一个作家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移民作家纳博科夫曾这样描述

从母语俄语转到英语写作的感受,“自然语汇的缺失”是他在英语里“作为一个作家的秘密缺陷”,这种经历真是痛苦不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4]。而李翊云用异化法将一些中国特色词语翻译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英文。

1) 称呼语

反映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家庭关系的称呼语,中英两种语言中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体现这种差异,增强读者阅读的异域感,李翊云作品中,中式称呼语随处可见。在她的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中,她用了“Teacher Gu”来称呼“顾老师”,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某某老师作为称呼语,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尊师重道的传统。在英语中,老师是一种职业,是不用作称呼语的。短篇小说《多余》中的“Granny Lin”“林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她没有亲人,由于中国文化中对年长者的尊敬,人们会称年纪大的女性“奶奶”,这并不意味着和这个人有什么亲属关系。同样“Auntie Wang”“王阿姨”是对另一位老年女性的称呼,她也并不是谁的姨妈。小说《漂泊者》中的妮妮家有六个女儿,由于孩子太多,父母又重男轻女,对于家里的女孩,他们都已经懒得给她们起名字。家里不上学的孩子都没有名字,直接用出“Little Three”,“Little Four”,“Little Five”,“Little Six”,“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来称呼她们。生气的时候,连这个序号都没有了,直接都被统称为“Debt Collector”“讨债鬼”了。70年代的中国物质严重匮乏,整日为生活所困的中国父母是绝对不可能像西方父母那样把孩子叫做“sweet heart”(甜心),或是“honey”(蜜糖)的。

2) 音译特色词汇

一种语言中的词语或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无等值词的情况,即出现语义空白的情况是时有发生。此时译出语与译入语的差异为最大,翻译时往往不可能直接从形式上或语义上入手。音译便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起码是一种权宜之计^[13]。在小说《漂泊者》中,作者采取了音译加解释的方法,把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直接翻译成了“Ching Ming”,并解释了这个节日的含义“the day for people to bring their ancestors and their recent dead freshly steamed rolls painted with spring grass, newly brewed rice wine, and other offerings”。在短篇小说《内布拉斯加公主》中,将京剧中的“男旦”

直接音译成了“Nan Dan”并附带了解释“a male actor who plays female roles on stage of Peking Opera”。在短篇小说《儿子》中,从美国回国的瀚,是众多女孩眼中的“钻石王老五”。“钻石王老五”被直接音译为“Zuanshi - Wanglaowu, a diamond bachelor, earning American dollars and holding American citizenship”。虽然在翻译中国特色词语方面,使用音译法既简洁、直接又能保留词语独特的民族风味,但音译词汇往往需要附加解释,使文字变得繁琐冗长。为了使文字流畅简洁,李翊云小说中音译法采用的并不多。

3) 时代特色词汇

李翊云成长在70年代的中国,她小说中许多故事都以那个时代为背景。因此小说中和中国社会六七十年代相关的词汇有很多,基本上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文的时代特色。如:“红星服装厂”译成“Red Star Garment Factory”,“东风体育馆”为“East Wind Stadium”,歌曲名《社会主义好》译成“Communism is Good”,《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译成“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 We Don't Have a Life”,部队训练口号“战士流血流汗不流泪”译成“a soldier shed sweat and blood but never tears”。

(2) 中式比喻和习语

李翊云的小说中,直译汉语习语和比喻方式俯拾即是。中式习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习惯使用的,形式简洁而意义独到的词组或短语。许多中式习语中都包含有恰当的比喻,并能引起丰富的联想,而这种联想是由中华民族的现实环境和传统文化所决定的。由于中美两国在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许多中式习语在英语中是找不到对等语的。为了准确的表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李翊云采用了异化的直译法,将大量的中式习语直译成英文。

1) 中式比喻

中国人喜欢用“东方露出鱼肚白”来表示“天快要亮了”。英文中并没有此种说法,李翊云在小说《漂泊者》中将天刚刚亮时的天色直译为“but the eastern sky had taken on a hue of bluish white like that of an upturned fish belly”。这些中文中司空见惯的比喻,通这种直译的异化翻译手段进入英文,西方读者读来顿时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的异域风格也得到了突显。在短篇小说《仁慈》中,女主人公感慨自己青春已逝时,说过这

样一句话,“I was becoming less desirable by the day, like a fresh lychee that had not found a buyer in time.”。“我已韶华不再,就好像曾经新鲜的荔枝错过了它的买主。”比喻中的喻体“荔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难以保鲜的水果,在这个比喻中李翊云用中国特色水果“荔枝”来比喻女性的青春美貌,则突显了小说的中国特色。

有的比喻还描写了北京的气候特点。在短篇小说《花园街三号》中,李翊云写到,夕阳红舞蹈俱乐部的会员们,想要充分利用北京短暂春天里的好天气而增加聚会的次数。她将北京春天的短暂比喻成小姑娘为剪了难看的发型而难过一样转瞬即逝。会员们要充分利用酷热难耐的桑拿天开始之前的短暂的好天气。毫无疑问,炎热的天气同样不会成为他们减少聚会次数的理由。“Spring in Beijing was as brief as a young girl's grief over a bad haircut and they might as well not waste the good days before the sauna weather set in, though no doubt by then they would have more reasons to keep the schedule despite the heat.”句子中的短暂的春天的比喻,描写了北京特有的气候特征,而闷热难当的“桑拿天”更是北京夏天的符号。

2) 中式习语

小说中出现的习语,大都采用直译法,翻译这类习语中本体和喻体大都有很强的关联性,其中一些与英语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对于这类习语,李翊云采用的都是直译法。小说中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He who suffer the insufferable would one day become a man above all men.

②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I've eaten more grains of salt that you've eaten rice.

③小姐身子丫鬟命。

A princess trapped in the fate of a handmaiden.

④人要脸,树要皮。

A tree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bark. A man cannot live without a face.

⑤车到山前必有路。

There is always a road when you get to a mountain.

⑥自古红颜多薄命。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always has the saddest

fate.

3) 成语

成语是中国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是汉语文化的一大特色。将成语译成英文一直被视作译者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为了保留成语的语言特色,李翊云小说中的成语,大都采用了按照字面直译的异化翻译手段。短篇小说《多余》中写到,在“中国私立学校和私营企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虽然在英语中“雨后春笋”的对应比喻为“spring up like mushrooms”,但为了传递中英两种语言在文化及比喻定式方面的差异,李翊云没有采用归化的套译法,而是将其直译为“sprouting out like bamboo roots across the country after the first spring rain”。在短篇小说《仁慈》中李翊云把成语“镜花水月”译成“a flower in the mirror, a moon in the river”。“无欲则刚”译成“When you desire nothing, nothing will defeat you.”。对于这些本体和喻体关联性强,中英文说法不大的成语,李翊云大都采用了异化的直译法,从而最大限度的模仿了原语的结构和特征。

但成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典故。这类成语往往用于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简单的字面直译是不能传递出成语本身的丰富含意的。对于这类成语,一般要采用意译法。如“叶公好龙”,一般翻译成“Professed love of what one really fears”。李翊云并没有采用这种归化的意译法来翻译成语,是采用讲故事的方法,将成语背后的典故,介绍给读者。在短篇小说《约定》中,李翊云用简短的两句话就将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交代的十分清楚,“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man who loved dragon so dearly that he had dragons painted everywhere in his mansion. And when a real dragon came to visit him, he was scared out of his wit.”。

(3) 古诗词和典籍

李翊云从小热爱阅读各类文学作品,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诗歌是汉族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形式简短、生动,是最富表现力的中国语言。在作品中,她经常信手拈来一些诗词掌故,为其作品增色不少。在短篇小说《仁慈》中,这首源自唐代流传至今的五言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被李翊云翻译为“I was not yet given a life when you were born;

when I was born you were old already. How I wish I had not come this late, but death has placed mountains and seas between you and me.”李翊云在翻译这四句诗时,将异化和归化法杂糅在了一起。前两句基本是字对字的直译。但是后两句却运用了英语中特有的虚拟语气,将二人因时光阻隔而不能厮守在一起的惆怅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短篇小说《儿子》中,瀚的母亲趁瀚回国之际想要说服他皈依基督教,母子在对话中均引用了《论语》中的内容来说服对方。母亲说:“学习真理永远不晚。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瀚反驳道“孔子也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妈妈你都已经六十岁了,怎么还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小说中《论语》的引文,“朝闻道,夕死可矣!”李翊云译为“Confucius said If one gets to know the truth in the morning, he can die in the evening without regret.”“五十而知天命”译为“Confucius said when one reaches fifty, he is no longer deceived by the world.”母子间的对话不但展现了孔子思想在中国人心中的根深蒂固,并且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论语》中常见的引文。

在长篇《漂泊者》中,顾老师替自己在文革时当红卫兵首领的女儿向老华夫妇道歉,因为在文革中,他的女儿顾姗曾经批斗过老华夫妇。虽然,老华夫妇早已经原谅了顾姗,认为她那时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还不懂事。但是身为父亲和老师的顾老师却自责的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两句幼童启蒙时学习的三字经被李翊云直译为“A student's wrong doing lies with the teacher's incapability. A child's fault is the father's fault.”。这些古代典籍在人物对话中的运用,不但使人物对话变得更加简洁生动,更具中国特色,同时也促进了中式思维和中国哲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然而,如果小说语言过度异化,就会影响文字的流畅性,使西方读者读来感觉生涩拗口,从而影响小说的接受度。异化译法虽好,但是也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行不通的时候还是要借助归化法^[14]。

2. 归化法在小说语言中的运用

长篇小说《漂泊者》开篇正值春分时节,寒冷的中国东北在春分时仍然天寒地冻,但昆虫、树木、飞鸟和河流的细微变化,表明春天已经悄然而至,只是感觉迟钝的人们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

临。李翊云在小说中这样描写人们感知的迟钝“How many miles of river melting and how many trees of blossoms blooming would it take for the season to be called spring?”读到这里,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这句话是在仿写鲍勃·迪伦著名的反越战歌曲《随风而逝》(“Blowing in the Wind”)中的歌词“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作者用这句描写季节的仿写,似乎也暗指了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人们对鲍勃·迪伦那种追求自由和挑战权威精神的渴求。

除了借用鲍勃·迪伦的歌词,李翊云小说中也使用了美国俚语。短篇小说《千年敬祈》中的史先生是一位“rocket scientist”。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一位火箭科学家。其实,在美国英语中,人们用“rocket scientist”来泛指一切智商非常高的天才科学家。在美国,人们会常常听到这句话,“You do not need to be a rocket scientist.”。这句话所传递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很聪明就能了解一些事”。在美国热播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天才科学家谢尔顿的孪生妹妹对他说,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经常对朋友们说你是个“rocket scientist”。谢尔顿听了之后大为恼火,对他妹妹解释说,“我是理论物理学家,不是什么‘火箭专家’。”妹妹说,“可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谢尔顿最后愤愤地说,“如果你对别人说我是‘火箭专家’还不如说,我是金门大桥收费员呢。”可见,普通美国人会把凡是特别聪明的天才都称作“rocket scientist”,但科学家是不会以“rocket scientist”自称的。

史先生退休之前究竟是做什么的,作者在小说开头并没有具体交代。“rocket scientist”这个词是史先生在和一个美国人交谈中学来的。以后他逢人便说自己是“rocket scientist”。由于“rocket scientist”在美国英语中有这样的弦外之音,所以一般人在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应该不会用“rocket scientist”来自称的。小说结尾时,读者才弄明白,这个对家人和外人自称了一辈子“rocket scientist”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火箭专家。由于年轻时和女助手多说了几句话,而被免职,以后一直干着文书的工作。史先生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家庭,一直在和家人说谎。在女儿的逼问之下,最后才说出真相。史先生为之奋斗一生,而终不得的保密职业“rocket scientist”,在美国人口中却变成了稀松平常俚语,则更加凸显了史先生的辛酸和

无奈。

对于许多中国特色事物,李翊云在翻译时,并没有都采用时下最流行的音译加注释法,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了英文中对等语来翻译,从而使文字变得更加简洁、流畅。煎馒头是中国北方家庭常见的一种早餐,作者并没有将馒头直译成“steamed bun”或是音译为“mantou”,而是将它翻译成了英文中的对等语“fried bread”。在她的作品中“四合院”译为“quadrangle”,“剩馒头”译为“leftover bun”,“花卷”译为“steamed rolls”,“炕”译为“brick bed”,“bed table”表示“炕桌”等等。

在称呼语方面,李翊云采用的归化法也比较普遍。在李翊云的小说中 Mr. Shi, Mr. Pang, Mrs. Pang, Mr. Song 之类的称呼很普遍。虽然,“顾老师”采用了异化法,翻译为“Teacher Gu”,但是顾老师的妻子就采用归化法翻译为“Mrs. Gu”。拾荒老人“老华”采用异化法翻译成“Old Hua”,但是老华的老伴则采用归化法翻译成了“Mrs. Hua”。这种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法,不但显示了小说的中国特色,还增加了文字的流畅性,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

四、结语

李翊云用她那“比许多美国作家都好的英文”,把大洋彼岸发生的中国故事,以跨越中美两个民族的独特视角,引人入胜的讲给了整个世界。她采用的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文化翻译方法,很大程度的保留了汉语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李翊云小说中运用有中国韵律的英语,成功的将中国语言中一些特有的比喻方式、习语、成语、古代诗词、典籍等内容翻译成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中西方文化和人性的共通之处,使李翊云小说里中国人过去的苦难和遭遇,及现代中国人内心的困境和追寻,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到了共鸣。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李翊云用英文书写的中国故事,必将吸引到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读者。国内的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李翊云的作品来学习英文写作和翻译。对于故乡中国,作为一个身处美国的获得

语作家,她可以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审视;对于西方世界,她的作品又有鲜明的中国风味,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和跨民族视角造就了李翊云的写作传奇。

[参考文献]

- [1]陈雪莲,李翊云. 移民作家书写人性共同点[EB/OL]. 2013-03-13 [2015-02-15].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313/177072.shtml>.
- [2]陈榕. 异化为表,归化为里——解析哈金的中国情境小说[J]. 广西社会科学,2008(7).
- [3]童明. 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J]. 中国比较文学,2005(3).
- [4]哈金. 为外语腔辩护[EB/OL]. 2008-08-01 [2015-01-13].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wk/200808/Article-200808014736.shtml-73k>.
- [5]Li Yiyun. *The Vagrant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9.
- [6]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8.
- [7]李建中. 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
- [8]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2009(6).
- [9]Ciabattari, Jane. *Yiyun Li Takes on Evil* [EB/OL]. 2014-02-27 [2015-02-17].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2/27/yiyun-li-takes-on-evil-in-kinder-than-solitude.html>
- [10]Li Yiyun. *Gold Boy and Emerald Girl* [M]. New York: Random House,2010.
- [11]Li Yiyun.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6.
- [12]章艳. 探秘文化翻译的奥秘——评刘宓庆著《文化翻译论纲》[J]. 中国翻译,2008(1).
- [13]黄德新. 音译法的使用与误区[J]. 山东外语教学,1996(2).
- [14]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2002(1).

(责任编辑 南山)

19世纪与20世纪女性书写中 女性欲望与女性多重身份构建对比

——以《呼啸山庄》与《BJ单身日记》为例

黄 思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女性欲望是具有女性诉求的欲望,包含了女性自我对生存、安全感及归属感、爱情、自我实现等等的一种本能以及文化的需要。女性欲望的言说与表达不仅代表着女性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也是构建女性身份的重要驱动力。《呼啸山庄》与《BJ单身日记》从多个层面塑造了在不同的女性欲望驱动下,女性或是压抑欲望,或是任由欲望驱动的种种行为,刻画出了复杂的女主人公形象,构建出集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女性形象。通过对比《呼啸山庄》与《BJ单身日记》,能够看出19世纪与20世纪女性书写中女性欲望有着不同发展。而在这些不同女性欲望的驱动之下,也呈现出19世纪与20世纪女性不同身份构建。

[关键词] 女性; 欲望; 身份; 女性写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87-04

一、引言

从文艺复兴时期女权意识的萌芽,到17世纪启蒙时期有自我女性意识的文学崭露头角,及至18世纪末女性作家大量涌现,女性文学蓬勃发展,进入了真正的“女性文学的黄金时代”。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一个个惊才绝艳的女作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文学史上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其中,艾米丽·勃朗特以《呼啸山庄》对浪漫主义思潮做出积极回应,大胆地揭示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逐渐进入文学主流、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而进入20世纪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日渐强大,女性主义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批判一切宏大社会理论及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后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强调跨学科性与政治实用性,着眼于女性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随之在文学领域,女性创作也呈现出多元性景观。海伦·菲尔丁于1996年发表

的《BJ单身日记》被誉为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细致的探讨了后女性主义下女性对爱情、事业、独立、性等问题上有别于传统的看法和态度。

从《呼啸山庄》到《BJ单身日记》,从经典主义女性文学到后女性主义文学,凯瑟琳与布莉琪,一个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在希斯克利夫的爱情与19世纪父权价值观中挣扎,最终抑郁而终;一个是现代社会的独立职业女性,却仍然渴望爱情和家庭的温暖,并最终找到了爱情的归宿。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却又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她们代表着在不同时空,女性对自我意识的追求。而在她们逐渐或业已觉醒的女性意识背后,深藏着仅属于自己的、女性的、特有的欲望。如果说女性意识代表了女性人格的外在方面,那么深藏在女性意识背后的女性欲望则包含了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女性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呼啸山庄》与《BJ单身日记》从多个层面塑造了在不

[收稿日期] 2015-06-20

[作者简介] 黄 思,女,江西九江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同的女性欲望驱动下,女性或是压抑欲望,或是任由欲望驱动的种种行为,刻画出了复杂的女主人公形象,构建出集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女性形象。

那么什么是女性欲望呢。拉康曾这样定义欲望,“欲望,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其最大特性是永远追求满足。这就使欲望成为这样一个怪物:首先,它是对生命的肯定。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了人的生命,世上的一切都将失去对人而一言之价值和意义。”^{[1](P.3)}而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看来,欲望与需要相关。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多层,分别是:第一,生理需要,也是生存需要,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但它并不是需要的全部。在它之上或之外还有:第二、安全需要;第三、归属与爱的需要(在马斯洛看来,爱与性是有区别的);第四、尊重的需要;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由此看来,欲望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既包括生理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毋庸置疑,人的需要分属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而女性欲望,便是在这些欲望的一般概念之上出现的所带有女性诉求的欲望。女性欲望,就是指女性的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望,是女人作为人的一种欲望,包含了女性自我对生存、安全感及归属感、爱情、自我实现等等的一种本能以及文化的需要,是女性所特有的。在《呼啸山庄》与《BJ单身日记》中,作者均意识到,女性欲望是激活女性生命的源泉,女性欲望的言说与表达不仅代表着女性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也是构建女性身份的重要驱动力。

二、凯瑟琳:欲望的压抑与反抗

1. 对自我需求的欲望追求——父权制外的“野丫头”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于英国爆发,这是一场彻底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伟大革命,女性的生活状况自然也被卷入这场时势变化的洪流之中。这一时期,社会对理想女性的塑造极其生动地体现在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摩尔的《家庭天使》中,“她以丈夫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她是慈爱的母亲,勤勉的主妇”^{[2](P.266)}。这样的“家庭天使”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男子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也成为社会对理想女性的界定。而从此时开始,社会空间也开始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女性开始被禁锢与家庭生活之中。

而在《呼啸山庄》中,凯瑟琳从不甘于父权制

做宣扬的“家庭天使”身份,相反,在艾米丽笔下,凯瑟琳是一个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叛逆女性。荒凉而又狂野的呼啸山庄赋予了凯瑟琳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正如管家耐莉所说的,她“长大了都大有希望变得像野人一样粗野”^{[3](P.55)},野性是深刻在凯瑟琳精神上的烙印,是凯瑟琳渗透到灵魂深处的自我。她仿佛天生就具有实现自我意识的强烈需求与欲望。而所谓自我实现的欲望,是指向个人理想,抱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所期望的人物的。只有实现这样的欲望,才能感到最大的快乐。基于这样的欲望,她不顾礼法,与被文明社会所排斥的吉普赛弃儿希斯克利夫成为了朋友。在对辛德雷的同仇敌忾中,少女也悄悄情窦初开,爱上了希斯克利夫。这种爱,不仅仅是对爱的追求,更是对自我的追求,正如凯瑟琳直言:“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3](P.98)}在凯瑟琳看来,希斯克利夫同她不仅仅是玩伴,更是灵魂契合的情侣,甚或于希斯克利夫就是另一个她。同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满足了凯瑟琳对自我需求的欲望,而此时,尚未受到世俗文明熏陶,在自我需求欲望驱动下的凯瑟琳则是一个叛逆的不合于父权制礼法的“野丫头”。

2. 对女性欲望的自我压制——父权社会中的“贵妇人”

如果说呼啸山庄代表着文明之外的荒原与野性,画眉山庄则呈现出了同呼啸山庄截然不同的景象。画眉山庄有着豪华、高雅、和谐、宁静的文明氛围。无论是山庄抑或是山庄中所居住的乡绅,他们的原始本性都受到了宗教伦理、社交规范的修饰和改造,画眉山庄的一切都闪耀着文明的光辉,与呼啸山庄的自然野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当时的文明社会是绝对的男权社会,在绝对父权制的主导下,女性欲望总是被压抑无从表达。在父权制下的男性看来,欲望一词与女性毫无瓜葛,而女性则顺从男性的意愿拼命压抑自己的内在欲望,认为欲望是不洁的、有罪的。在这样对个人欲望的压抑之下,她们变得愈发温驯、忠诚以及服从由他人定义的人生,甘于接受各种压迫。在父权社会下,女性真正的自我欲望被压制,所表现出来的,是已经异化的,表现为男性欲望的女性欲望。女性成为了男性欲望的载体与实现对象而失

去自我欲望。

在凯瑟琳闯入画眉山庄之后,这个在父权制礼法之外的野丫头开始逐渐被文明社会所驯化。凯瑟琳被资产阶级的文明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所吸引,那个在荒原上赤脚追赶希刺克利夫的“野丫头”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衣着“雍容华丽”,举止“温文尔雅”,言语“乖巧而又亲切”,留神自己的举止的“贵妇人”。在一脚踏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同时,凯瑟琳开始压抑对自我需求的欲望,而用以往所不屑一顾的“家庭天使”形象来要求自己。而在丰厚的财产,高贵的地位,优雅的生活方式的蒙蔽之下,凯瑟琳答应了林顿的求婚,背弃了希斯克利夫,也背弃了真正的自我欲望。在同林顿结婚之后,这个曾经叛逆的“野丫头”也不得不屈服于父权的压制之下,成为了一个空有躯壳的“贵妇人”。

3. 女性欲望的苏醒——婚姻中的背叛者

凯瑟琳被画眉田庄的表象所吸引,嫁给了林顿,但是画眉山庄如同牢狱一般禁锢住了她原始自由的天性,让她愈发空洞压抑。而希斯克利夫的离开也代表着凯瑟琳另一自我的远离,在女性欲望被压制的画眉山庄之中,凯瑟琳如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而当希刺克利夫消失多年后意外地出现时,凯瑟琳再也无法保持冷静,长久压抑的爱欲与自我欲望如火山一般爆发。在强烈反弹的女性欲望的驱动下,她无法控制对旧日情人的感情,成为了婚姻中的背叛者。然而,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深受文明社会的影响,数年来对男性意愿的顺从已经让她被驯化。在女性欲望与父权驯化的影响之下,凯瑟琳陷入了无止境的分裂和撕扯之中,一边代表她对女性欲望追求的希刺克利夫的爱,一边是应遵守的社会道德与父权威慑,凯瑟琳的灵魂在其间游移不定,难以取舍。而最终,凯瑟琳被折磨得病入膏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困惑与癫狂,最终绝食而死。

二、布莉琪:自然性女性欲望与社会性女性欲望的冲突

普遍认为,女性意识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女子气阶段——即通过模仿把传统艺术的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二是女权主义阶段——反对上述标准和价值,开始强调自主权,提倡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三是女性化阶

段——也就是从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自我发现、寻求自身价值的内在转变阶段。“而女性欲望作为女性意识核心,也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状态,经历着不同时期的转变。其中,一种为男性欲望的想象性表达,另一种为女性自身特有的不同于另一性的欲望。前者为‘社会性女性欲望’,后者为‘自然性女性欲望’”。^{[4](P.15)}在布莉琪身上,明显的呈现出了自然性女性欲望与社会性女性欲望的冲突。

1. 对性欲的追求——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女性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后女性主义”阶段,身体政治成为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关于女性身份探索的重要领域,作家对女性身体、情欲和性爱等话题的讨论更加大胆。《BJ单身日记》作为后女性主义的标杆作品,是在西方社会单身女性数量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出版的,被称为单身文学的代表。经过两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洗礼,现代女性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自由与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权利。而逐渐改变的社会地位让现代女性更为大胆对生理需求进行言说。在19世纪绝对主导的父权制社会下,作为女性独立存在标志的身体遭到了男性的抹杀。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和体验被男性描述所替代,女性身体仅被看做是男性的欲望对象,用于反射男性的价值利益。在福柯看来,对身体的掌控呈现出了对权利的掌控。不同于在父权社会下,毫无权利的女性对身体主控权的被剥夺,现代女性已经获得了对身体的主控权。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男性的欲望对象,而成为言说女性欲望的载体。在《BJ单身日记》中,布莉琪抽烟喝酒,选择开放性感的装束,张扬大胆而独立。布莉琪所代表的新时代女性不再是男性性消费对象,而成为有意识利用自身女性气质的性别主体,追求开放的性关系,并自由享受这一性别所带来的乐趣。

2. 对自我实现需求的欲望——独立的职业女性

在进入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之后,现代女性的对自我实现需求的欲望不再止步于19世纪女性单纯的对女性权利的强调,而转为更深层的自我发现,寻求自我价值。从《BJ单身日记》中可以看出,布莉琪是伦敦一家报社的调研员,她有着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完全没有经济上的担忧。经

济独立所带来的独立而自由的女性空间,布莉琪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她可以穿着睡衣,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所以,布莉琪对自我实现需求的欲望并不局限于对权利与身份的争取,而更多的是对如何达到新的工作高度,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等更深层次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文中写道:“很显然,《纽约客》中的蒂娜布朗是个在宴会中长袖善舞的高手,漂亮高明地游走于各个团体,……,希望像蒂娜布朗一样,虽然我不是她。”^{[5](P.88-89)}而在开篇的新年计划中,布莉琪也写道:“转换更好的工作环境,找一个更有潜力的工作机会。”^{[5](P.3)}这表明,布莉琪渴望能够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独立职业女性,同时也需求更广阔的工作成长空间。

3. 对社会女性欲望的追求——传统女性气质

在《BJ 单身日记》中,布莉琪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典型人物,她张扬独立,开放自主,日记中随处可见酗酒、抽烟、贪嘴等字眼。但同时,布莉琪每日的日记又总是以计算卡路里的方式开始,她有意识的减肥节食,希望能够保持一个苗条的身形,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完美的丈夫,她渴望爱情,希望能够得到家庭的归属感。即使是在挑选服饰时,布莉琪所考虑到更多的是男性审美标准而不是为了单纯的舒适感。“开始挑内衣。该洗衣服的时候就是手边的内裤仅仅只剩下那些又大又土的白色纯棉内裤了。实在太没有吸引力了,……,找了件黑色小小的有蕾丝花边的——穿起来会刺刺的,但总比那些老太太穿的可怕大内裤要好得多了。”^{[5](P.84-85)}由此可以看出,布莉琪虽然对自己的身体具有主控权,但是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呵护、打造、塑形”时,更多的是在社会女性欲望,也就是男性欲望想象性表达的驱动之下所作出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事业独立,经济自主,但是在父权消费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又不由自主的依照男性欲望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打造。她为了自己的体重而烦恼,为了减肥而节食挨饿,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大的满足男性欲望的标准。这种对社会女性欲望的追求,又让她成为了一个渴望获得爱情,渴望家庭幸福的传统女性形象。

也是现代女性最大的矛盾之处。

三、结语

从 19 世纪黄金时代,到 20 世纪后期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悄然兴起,女性书写经历了从女权主义阶段到女性化阶段的转变。而女性欲望,作为女性意识背后女性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也从男性欲望的附属品与想象性表达逐渐转化为女性所特有的对爱情、事业、甚或与性行为的大胆追求。本文通过凯瑟琳与布莉琪的对比,展现出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女性在不同女性欲望的驱动之下所构建而成的多重女性身份。其中,凯瑟琳的女性欲望更多的是多自我需求的欲望,她渴望被尊重,渴望获得自由追求爱情的权利,但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之下,她的女性欲望被轻易压制,她也从一个叛逆的“野丫头”转变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贵妇人”形象,并最终在两种身份的割裂与挣扎中悲痛而亡。布莉琪的女性欲望则层次丰富而鲜明,她独立自由,大胆张扬,追求事业,爱情,性欲。然而在对这些自然女性欲望的追求下,她又不由自主的受到男性欲望标准的影响,企图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具有传统气质的女性而得到家庭的归宿。这种种表明,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抑或是现代社会,女性欲望总会受到男性欲望的影响,也总会存在矛盾与冲突,而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赋予了女性身份构建的复杂性与多种性,让女性书写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满。

[参 考 文 献]

- [1]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SALLY M.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6.
- [3][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4]艾尤.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与欲望[J].艺术广角,2008(02).
- [5][英]海伦·菲尔丁.BJ 单身日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南山)

城市中的荒岛求生

——《摩尔·弗兰德斯》的荒岛小说特征分析

胡文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英语系, 江苏南京 211156)

[摘要] 《摩尔·弗兰德斯》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所写的一部以城市背景为题材的女性成长小说。尽管故事发生的环境和人物背景不同,笛福仍然赋予了小说不少荒岛冒险小说的特点。城市的环境与荒岛从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而主人公的性格也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特点。《摩尔·弗兰德斯》其实是一部另类的荒岛冒险小说。

[关键词] 丹尼尔·笛福; 《摩尔·弗兰德斯》; 荒岛小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91-04

一、引言

《摩尔·弗兰德斯》是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丹尼尔·笛福在成名作《鲁宾逊漂流记》之后又写了不少作品,有类似于《鲁宾逊漂流记》的冒险类小说《辛格顿船长》,也有描述普通人生活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摩尔·弗兰德斯》中笛福以女主角摩尔·弗兰德斯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孤女摩尔·弗兰德斯一生追求富足生活却总是遭遇不幸最终堕落但是最终获得救赎的故事。故事的原名基本可以概括出小说的具体内容:《摩尔·弗兰德斯,出生在新门监狱,在六十年丰富多彩的生活里,除了童年以外,当了十二年妓女,嫁了五个丈夫(其中有一个是她的亲弟弟),做贼十二年,八年作为重犯流放到弗吉尼亚,最后发了财,过诚实的生活,忏悔后离开了人间》。在以往对于《摩尔·弗兰德斯》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笛福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在这部小说里,笛福通过塑造摩尔这个人物表现了对贫穷的女性的同情,并且展现了女性依附男性的不公。虽然《摩尔·弗兰德斯》不属于荒岛冒险类小说,

但是笛福给这部小说加入了不少荒岛冒险小说的元素。《摩尔·弗兰德斯》可以说是一部另类的荒岛冒险小说。

二、笛福荒岛冒险小说的特点的分析

说起笛福就不得不提起他的成名作《鲁宾逊漂流记》。笛福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发表后便大受欢迎。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英国荒岛小说的起源的话,那么《鲁宾逊漂流记》就是正式将荒岛小说这一作品类型带入了英国文学。小说的主人公鲁宾逊具有冒险精神,在第三次出海的时候遇上海难,只有他活了下来漂流到了一个荒岛上。从此他利用荒岛上的有限资源,独自生活了二十四年。后来,他救下了一个野人取名“星期五”并将其收为奴隶。在荒岛生活了二十八年后,鲁宾逊又一次回到了英国。但是他不满足于安定的生活,再次出海,并探访他曾经生活过的小岛。这部小说由于第一部太受欢迎,又随后写了两部,延续了鲁宾逊的冒险故事。

《鲁宾逊漂流记》这样类型的荒岛冒险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如此受欢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

[收稿日期] 2015-07-20

[作者简介] 胡文涛,女,江苏南京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英语系助教。

到大时代背景的影响。《鲁滨逊漂流记》成书于18世纪初,正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期。更何况这本书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所描绘的鲁滨逊的故事积极推进了当时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的发展。鲁滨逊不安于现状,具有强烈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他本身并不向往流浪冒险的生活,而是想要去通过航海去英国以外的地方做生意。这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扩大贸易,努力拓展市场的行为。鲁滨逊最初的几次航行中有去非洲进行奴隶贩卖的行为,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奴隶贸易盛行的情况。而鲁滨逊最终将荒岛宣布为自己的殖民地也反应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殖民意识。^[1]

笛福荒岛类小说的首要特点就是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传统的荒岛必然是杳无人烟的孤岛。荒岛上有没有驯化的野兽,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生活物资,充满了危险和不便。笛福的荒岛与传统的荒岛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岛上没有直接可以使用的物资,却有经过改造可以变成工具的原材料。岛上并不是没有任何人,只不过岛上的人没有受过教育,无法帮助主人公。主人公只能通过驯化当地的土著才能和平生存。这样的荒岛给主人公的生存留下了一线生机。同时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荒岛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储备,也就是进行贸易的资本。与众不同的荒岛环境是笛福的荒岛探险小说的一大特点。

鲁滨逊第三次航海时因为海难漂流到了一个荒岛上。除了沉船里的少许补给,荒岛上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利用生存的物资。于是鲁滨逊自己制造工具,驯养牲畜,开垦荒地,甚至自己制作日历记录时间。本来鲁滨逊对宗教并不热衷,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就是一本旧《圣经》。鲁滨逊身上具备了新兴资产阶级所推崇各种优秀品质。生命力强,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可以顽强的生活;有创造性,会根据已有的条件制造出生存的必需物品;热衷奴隶贸易,愿意驯化土著人并将他们收为奴隶;有着虔诚的信仰。鲁滨逊式的人物是几乎是笛福的荒岛冒险类小说的必备的主人公。这是笛福荒岛小说的第二种特点。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塑造了当时英国社会所需要的模范资产阶级的形象。这是小说真正受欢迎的原因。

三、《摩尔·弗兰德斯》文本的荒岛小说特性分析

1.《摩尔·弗兰德斯》小说背景与荒岛的共通性

《摩尔·弗兰德斯》小说的背景是18世纪的英国,这是笛福的小说一贯采用的时代背景。摩尔·弗兰德斯出生于英国的新门监狱,出生后便被送出监狱,和游民流浪过一段时间就被送到某个教区由“阿妈”抚养。在“阿妈”去世前,摩尔的生活和一般的孤儿一样,与养母一起生活学习必备的生存技能。在这段时间,摩尔的生活背景唯一与荒岛相通的特性就在于物资的贫乏,但是她可以利用身边的资源,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一时间的摩尔属于“被驯化”的人群。

长大后摩尔被带到市长家作女佣,随后就开始了她跌宕的一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虽然中间也有过钱财散尽捉襟见肘的日子,摩尔的前半生靠着美貌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这与资源匮乏的荒岛生活相去甚远。实际上,在城市中生活的摩尔与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一样孤独。和鲁滨逊一样摩尔没有真正的朋友和家人。男人最初喜欢的是她的容貌,在她成为寡妇后则喜欢她的财产。而她身边的女性,年轻的时候都不喜欢她,因为“我(摩尔)要胜过我的小姐”^[2]。摩尔成了寡妇以后,她身边结交的女性大多也都是冲着她的财产才和她结交,也没有什么朋友。摩尔生了很多孩子,但是大多都送走了或者留给前夫抚养。所以对于摩尔来说,冷淡的人际关系以及亲人的匮乏使她的心理状态就像鲁滨逊生活在荒岛上一样寂寞。

在摩尔终于年老色衰不能再找丈夫结婚的时候,她无奈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当了小偷,因为这时的摩尔身边已经没钱了,做杂活的钱也不够养活自己的私生子。这时摩尔的生活环境成了真正的荒岛,不仅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生活物资,而且连可以加工产生物资的原材料都没有。摩尔为了生存当了小偷,却也结识了难得的朋友——帮她照顾孩子和销赃的老保姆。尽管最初她们的关系只是因为金钱维系,但当摩尔被抓快被判死刑时,也是这位老保姆帮她活动交了钱让她免于死刑。这种妇女间的团结使摩尔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支撑的力量^[3]。在物资匮乏的时候,摩尔不仅找到了朋友,也找到了一位曾经的丈夫——这位丈夫是

强盗却欺骗了她。在监狱里摩尔和这位丈夫再次相遇,也就找到了度过余生的伙伴。于是摩尔救下了那人一起改判了流徙去了美洲。正如鲁滨逊在独自生活的第二十四年后遇到了快被食人族吃了的野人星期五。鲁滨逊救下了星期五。星期五在成为鲁滨逊的奴隶的同时,也是在和孤独了很久的鲁滨逊作伴。流徙去美洲的机会也是为摩尔提供了一丝生机。正如笛福荒岛小说中一贯的风格:虽然已经进入绝境,但是终会碰到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或是自己发现继续存活希望。

最终摩尔和丈夫被流放到了美洲这一新大陆。故事的环境再次回到了荒岛小说的最基本地理特点。美洲大陆在当时已有一些白人居民。尽管不像鲁滨逊的荒岛那样杳无人烟,但也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的美洲大陆还是英国用来流放重刑犯的地方。摩尔的母亲也是因为偷窃被抓,因为怀孕而免去了死刑,最终被流放到了美洲。在美国摩尔的母亲开启了新的生活,“靠着她的勤勉同善理家务”,“她将那块新垦地改良到那是那样的地步”,“所以大部分的地产是她得来的”。在美洲开垦土地正是符合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本,这些都是殖民地可以提供的。而资产阶级认为,只要自己足够的勤勉,正如摩尔和摩尔的母亲那样,他们也可以在殖民地发财开始新的生活。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虽然没有依靠贸易发财,但是同样开发了荒岛。所以离开的时候,他将荒岛宣布为他的殖民地。开发荒岛的作用不仅仅是可以发家致富。笛福认为在殖民地里辛勤工作,最终可以洗清曾经发下的罪孽,得到救赎。正如摩尔的母亲回忆起前半生的偷窃生活时认为“我回忆到这些事情时,还觉得一种高兴,因为它们是带我来这块地方的媒介”。而在笛福的荒岛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总会带着在殖民地上得到的财富回到英国颐享天年,这在《摩尔·弗兰德斯》中也得到了验证。

2. 摩尔·弗兰德斯的人物性格中的荒岛人物特征的分析

摩尔·弗兰德斯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是小说的唯一主人公。笛福塑造的这一女性形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被主流价值观接受,包括小说的中文翻译者梁遇春先生都曾将这部书翻译成《荡妇自传》。在主流人群眼中,摩尔·弗

兰德斯所代表的是没有羞耻心的荡妇。她的行为也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但是笛福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却是带着同情理解的感情的。摩尔·弗兰德斯是出生于新门监狱的孤儿,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更没有什么财产。笛福却将这样一位具有无产阶级的物质特征的女性塑造成了一位另类的资产阶级。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逊一样,都是自由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笛福的荒岛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一位不时陷入绝境的资产阶级做主角。摩尔·弗兰德斯正是符合了这一特点。

在摩尔·弗兰德斯最初被老阿妈抚养时,她不想服从服役的命运,而是想要成为“贵妇人”。从摩尔不想成为仆人伺候别人的心态来看,注定了她在今后的生活里,即使贫穷潦倒也不会去做女仆。不过当时的摩尔对“贵妇人”的理解有偏差,她认为“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要出去服役的人就可说是一位贵妇人”。这样的想法可以说贯穿了摩尔的一生。不论以后的摩尔做了多少道德沦丧的事情,即使沦落成窃贼,她都是秉承这样自食其力的原则生活^[4]。“自食其力”是资产阶级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是靠着自食其力的品质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偷窃也可以说是一种自食其力。当摩尔和丈夫流徙到美洲之后,她的丈夫显得无所事事,每天只能靠打猎打发时间。而摩尔却因为自食其力的品德,利用自己做贼期间积攒下来的财富,再加上母亲留下的遗产,通过买地开垦以及买卖货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身为女性摩尔承认自己“具有女性共有的虚荣心”,曾经试图通过婚姻找一个好丈夫依靠,也曾坚持着“一个女子绝不要给人养做外妇,当她还有钱自养时”。但是当她意识到这些无法实现后,摩尔立刻转换心态“自食其力”继续生活下去。相比较摩尔曾经的丈夫们,没有哪一位有摩尔这样的魄力和精神。从这点上看,摩尔·弗兰德斯是具备资产阶级的重要品质的。

摩尔·弗兰德斯具备资产阶级的另一特征就是有资本意识,有生意头脑。从小说开始的时候,摩尔·弗兰德斯就被形容为“长得漂亮”、“态度总是非常严肃同谦卑,礼数也很周到”。长大之后去一家贵妇人家做工,陪着小姐们学习,摩尔的天赋开始显现。她甚至学得比小姐们都要优秀。这样优秀的摩尔吸引了那家里两个儿子,并被大儿子引诱。摩尔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却做了我(摩尔)堕落的种子”,却没有指明美貌也是她赚取好生活

的一种资本。大儿子最终为了财产抛弃了摩尔，摩尔只能嫁给了小儿子。可以说，这是摩尔第一次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本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富足生活，尽管这次摩尔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资本。可惜不久丈夫便去世了，摩尔得到了一大笔钱离开了那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金钱决定了社会地位。而女性的社会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她的丈夫。摩尔是有钱的漂亮寡妇，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追求。这时的摩尔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于是就利用自己的钱和美貌，挑了一个自己满意的丈夫。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易，丈夫看中的是她的财产，而摩尔则是为了找一个丈夫。随后摩尔的几次婚姻，摩尔都会聪明的利用这两样资本，找到自认为好的归宿。当她没钱的时候，她也会装作有钱的样子。这说明摩尔·弗兰德斯已经充分了解了自身资本的重要性，并学会了用这些资本做交易得到自己想要的。当摩尔最终年老色衰也身无分文时，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做生意的资本，被逼无奈做了小偷。然而摩尔到了美洲后她的做生意的才能得到了发挥。她胆大心细，利用手上仅有的财富发家致富，最终带着大笔的财富荣归故里。摩尔·弗兰德斯的聪明才智，尤其是在贸易方面的聪明才智正是资产阶级最需要的一种能力。

摩尔·弗兰德斯最终的结局也符合笛福小说里主人公的一般结局。笛福会让自己的小说主人公在年老时回归宗教，成为虔诚的教徒，认真反省自己做过的错事^[1]。这也是成为资产阶级的要素之一——成为虔诚的教徒。多年陪伴鲁滨逊的是一本《圣经》，鲁滨逊通过诵读保持了语言能力，并且在诵读的过程中心灵受到了洗涤。《圣经》可以说是鲁滨逊的精神支柱。《摩尔·弗兰德斯》是摩尔·弗兰德斯老年时期的回忆录，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了教徒。从文章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角度，这

位叙事者每做一件错事，都会说是自己的“堕落”，“受到了魔鬼的引诱”，充满了反省。在入狱后摩尔便开始频繁的见牧师，深刻反省自己的前半生，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忏悔。她在美洲的垦荒和劳动可以算作她的一种赎罪的表现——不再靠欺骗偷窃生活，而是诚实地活着，就像她的母亲曾经那样。小说的最后笛福也写道：我们决定在英国过我们的余生，去诚恳地忏悔我们以前所度的罪恶生涯。综上所述，摩尔·弗兰德斯是笛福笔下的典型的荒岛小说中的资产阶级。

四、结语

《摩尔·弗兰德斯》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笛福最成功的作品。笛福既塑造了摩尔·弗兰德斯这样立体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典型的女性形象，也维持了他的作品中一贯的冒险元素，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先进性，赞扬了资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尽管小说的背景是城市，却是一部另类的荒岛冒险小说。摩尔·弗兰德斯这位传奇的女性形象也将伴随着笛福的作品一直留在英语文学的历史中。

[参考文献]

- [1]何赫然. 丹尼尔·笛福作品中的殖民主义意识[J].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4(1).
- [2][英]丹尼尔·笛福. 摩尔·弗兰德斯[M]. 长春: 吉林出版社, 2012.
- [3]郭玉英. 妇女权益的维护者——简析笛福《摩尔·弗兰德斯》中的女权主义思想[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4).
- [4]胡凡. 英国作家笛福文学作品中的“荒岛文学”艺术特色[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0(2).

(责任编辑 南山)

绿色绘画

——再论玄色体系绘画

熊 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摘要] 玄色体系绘画中的文人的水墨画与水墨淡彩画,完全从模仿客观物象的色彩解放出来后,以其朴素、沉稳、清雅、淡泊的玄色,对绘画的题材、内容、风格、形式等,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这种绘画是基本上未受污染的一种比较洁净的绿色绘画。创作与欣赏这种作品,不仅有助于人们修身养性,而且有益于人们的养生。

[关键词] 玄色体系绘画; 绿色绘画; 水墨画; 水墨淡彩画

[中图分类号] J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95-03

玄色体系绘画包括以墨色线条为“骨、筋”的彩色画、纯水墨画、水墨淡彩画和彩墨画等数种,其中以文人的水墨画艺术水平为最高,是中国画的代表。

文人水墨画与水墨淡彩画,完全从模仿客观物象的色彩解放出来后,以其朴素、沉稳、清雅、淡泊的玄色,对绘画的题材、内容、风格、形式等,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在优秀的玄色绘画中,我们看不到庸俗、腐朽、衰败、死亡的东西,洋溢的是超功利的逸气、远离媚俗的雅气、体现民族气节的正气、刚正不阿的刚气。这种绘画是基本上未受污染的一种比较洁净的绿色绘画。创作与欣赏这种作品,不仅有助于人们修身养性,而且有益于人们的养生。在科学与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绿色食品,而且更需要“绿色精神食粮”。

中国优秀的玄色绘画(特别是其中的水墨画),是怎样从哲学、政治、迷信、世俗的干预,怎样从模仿客观物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步磨练成绿色绘画的呢?

一、气韵·人品·画品

大约是在一些有文化知识与修养的文人参与绘画创作之后,美术界就很重视人品与画品的统

一,即画家的品德与作品的气韵、形神等的统一。

就“画品”而言,谢赫以来,画家们强调“气韵第一”。“气韵”中的“气”是什么呢?《周易·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气”包括自然之气,包括《周易》说的阴气、阳气、以及天气、云气、岚气、水气等。没有自然之气,万物就不能生长。人的精神之气,是指人的仁、义等道德、品行以及人的气质、气节、气概、气度等。人有正气与邪气。中医认为人有正气则健康;人有邪气则有病。画家有了正气就能发挥正能量,阻断污浊的东西进入画面,创造出好作品来。因此,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画家、评论家,都强调树立正气,做到人品与画品的统一。南齐谢赫把“气韵生动”放在评画优劣的第一位。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绪论》中直接把人品与气韵联系在一起,他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1](P.52)}

一些优秀的文人水墨画与水墨淡彩画,虽然其题材多为山川、花鸟、鱼虫、禽兽,但逸气、雅气、清气、正气充满其间,故而画面洁净,难见污浊之气。

[收稿日期] 2015-09-10

[作者简介] 熊 炜,男,安徽宿松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南宋画家马远画山水,有时只画山的一角;郑所南画兰不画土;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密密排列的刚劲松树,如同奔赴前线杀敌的将士;王冕《荷花》题款:“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等,都蕴涵着一股文天祥式的正气。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赵孟頫是一位官位很高,诗、文、书、画“无不精通”的画家,可是“在他的作品上是说不上有多少进步性与现实创造性……只不过是尽了妩媚、细润、工整之能事(这和他的为人倒是有关的,他以宋宗室之后,历任元代王朝显宦,对于元人统治中国尽了最大的“忠诚”,画策献计,唯恐不至)。”^[2](P.278)

中国画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不仅赞美画中正气,同时也欣赏画中的逸气、雅气、刚气。中国水墨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很多表现了放逸、清雅与淡泊功利的作品。这些基本上没有污染的绿色作品至今仍有艺术生命力。

二、淡泊人生

文人水墨大多是一些有较高审美趣味的文人创作出来的。他们有的是才能得不到发挥而愤世嫉俗,走向山林;有的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或为民请命而得罪上司,回归里野;有的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自顾无长策,空知返归林”的。他们大都是看透了社会腐败而淡泊功利,追求无丝竹乱耳,无灯红酒绿伤目,甘愿过清贫、淡泊生活的人。

佛教认为,人们不受控制的欲望的膨胀,是一条“毒龙”。这条“毒龙”应让它离潭而去,使潭水洁净,不再污染人,不再毒害社会。唐以后,优秀的文人诗、画差不多有半数表现这种渴望遏制人欲、清除污浊,保持淡泊情怀的。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一幅经典的作品。有人说,此画是富春山水的真实写照,这只是表象。《富春山居图》完美表现了什么?请看黄公望同时代的几位散曲家对富春江的描写:“龙虎昭阳殿,冰霜函谷关,风月富春山。不受千钟禄,重归七里滩,赢得一身闲,高似他云台将坛。”(徐再思《梧叶儿·钓台》)“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朗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叫千古圣贤评。”(鲜于必仁《塞儿令》)“李翰林身何在,许将军血未干,播高风千古严滩。”(张可久《水仙子》)“万里玉门关,七里钓

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休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霜。”(邓玉宾《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月小潮平,红蓼滩头秋水冷……一蓑全却子陵名,五湖救了鸱夷命。尘劳事不听,龙蛇一任相吞并。”(无名氏《驻马听》)

富春山在浙江富春江岸。山水有严光当年的钓鱼台,江中有七里滩。传说东汉隐士严光拒绝光武帝封给他的官职,到富春江垂钓,远离险恶的官场,保全了名节性命,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与黄公望同时代的这几位散曲家的有关富春江的描写,看起来好像是画家的《富春山居图》的一种文字注释。画面上虽然没有严光,但这里的潮平浪隐,风清月朗,远离朝廷,可以过清贫却比较安全的生活。这些与散曲中写的完全相同。元代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压迫深重,民不聊生的时代,对元蒙统治者采取不支持、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抒发了倪云林式的“胸中逸气”,表现了文人画家淡泊的胸怀。

不满于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而向往严陵过的生活,是一种淡泊,完全寄情于山水,超越功名利禄,又是一种淡泊;安居陋室,回避案牍之劳神,是一种淡泊,“擢去乌纱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又是一种淡泊。淡泊造就了绿色作品;淡泊铸就了“绿色人生”。

在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本来就不富裕的封建社会,曾付出高额学费、受过教育的文人,要绕过功利,淡泊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在污浊与洁净之间,许多人选择了洁净、淡泊。玄色(特别是其中的淡墨色)是一种清淡、透明、低调的颜色。淡泊人生的人选择了清淡的玄色,清淡的玄色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淡泊人生。倪云林的画到了明代,“江南人家以有无为清浊”,正说明表现清逸之气的绿色作品是一种可供大多数人欣赏、受益的作品。

淡泊并不是时髦的“流行色”,即使在可供选择的职业较多、生活比较富裕的现代也未过时。于丹在《有梦不觉人生寒》一文中说:“《老子》曾讲到‘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后世也一直继承赞美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如白居易《问秋光》一诗:‘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表达的就是心无杂念,凝神安适,不限于眼前得失的那种长远而宽阔的境界。”^[3]玄色画家信奉“恬淡为上”的心境,

欣赏“烟景弥淡泊”的境界,尽力避免浮躁,对权欲、财欲、色欲保持克制、淡定的态度,并把这种心境变成画境。这是他们战胜“毒龙”,避免污浊,保持心灵洁净,以达到养性、养生的良方。

三、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要食用绿色食品,以维持身体健康,就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利用、改造自然,不能无节制地污染开发自然,破坏生态平衡。这样就要求我们与自然建立友好关系,保持和谐相处。

玄色画家之所以能创造绿色绘画,原因之一是,他们投身自然怀抱以后,没有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乐山、乐水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将自然人格化,另一方面又将人自然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物我合一。

将自然人格化的画家很多。石涛说:“山之得休也以位,山之荐灵也以神,山之变幻也以化,山之蒙养也以仁,山之纵横也以动,山之潜伏也以静,山之拱揖也以礼,山之纤徐也以和,山之环聚也以谨,山之虚灵也以智,山之纯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石涛画语录第十八章》)廖燕认为,山水不仅有“动作”,而且有“表情”。他说:“天下之最能愤者莫如山水。山则巉峭嵒巖,蜿蟺磅礴,其高之最者,则拔地插天,日月为之亏蔽,虽猿鸟莫得而逾焉。水则汪洋巨浸,波涛怒飞,顷刻数十百里,甚至溃决奔放,蛟龙出没其间,夷城郭宫室,而不可阻遏。故吾以为山水者,天地之愤气所结撰而成者也。”(《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将人自然化,在中国玄色画家中很多。罗大经谈曾无疑工画草虫:“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鹤林玉露》卷七)现代一位画家在谈到画小鸟时说:“在一个活动着的时空里,画家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在这小小的鸟身里装上最神秘的中国古代艺术的万世灵丹……画家的自我。”(甄巍《油画与水墨》)将自然人格化、人自然化的结果是,二者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合一。

玄色绘画大多不以逼真的形与色来塑造人物性格,编造故事情节,而是以描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我合一的意境见长。这种意境大都是净化了的,和谐的,充满诗意的。

重视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完善,淡泊以成全自我生命,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诠释心灵,是优秀文人画中绿色绘画的主要特征。这种绘画是富有个性的并渗透了民族的某些共同心理。因此,它拥有过去,滋润现在,警示未来。

[参考文献]

- [1]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A].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上卷)[C].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
- [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 [3]于丹.有梦不觉人生寒[N].大江晚报,2015-08-05.

(责任编辑 南山)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发展分期^{*}

刘 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发展分期,是以活动参与的画家数量多寡、举办次数多少以及是否有标志性宫廷绘画活动中心作为标准的;可以仁宗即位、文宗病逝及顺帝即位作为时间节点划分。初兴期(1271-1310)宫廷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翰林兼国史院和集贤院,主要画家有何澄、赵孟頫、刘贯道、和礼霍孙等;高潮期(1311-1332)宫廷绘画活动中心为秘书监、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活动较频繁,代表性画家有商琦、王振鹏、李肖岩、李士行、柯九思等人;至衰弱期(1333-1368),宫中已无著名画家供职,更没有形成宫廷绘画活动中心,画家仅赵雍、张彦辅、周朗几人而已。

[关键词] 元代; 宫廷绘画活动; 分期; 秘书监; 奎章阁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098-06

艺术史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高峰过后难免走向衰弱,低谷之时必在孕育向上力量。宫廷绘画史的发展亦如是。在经历两宋高峰之后,加之朝代更替带来的外部环境及机构体制的变更,使得宫廷绘画在元代进入低潮期。但是,低潮期的元代宫廷绘画并非一无可取。由于元代统治者采取开放性文化政策,追求物质享受,对绘画并不排斥,宫廷之内与绘画相关机构亦有设置,遂使元代宫廷绘画活动获得一定发展。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演进,因为帝王支持力度不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可以分为初兴、高潮和衰弱三个阶段。

一、初兴期

1271年,元朝建立。元初,在世祖忽必烈的主持下,基本完成了宫中各类与绘画相关机构的设置,如翰林兼国史院、集贤院、秘书监、梵相提举司、将作院和大都留守司下的画局。这些机构设立之后,立即搜集人才,容纳画家,为元初宫廷绘画活动的展开提供人才保障。当时,大都是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大都为中心建立起的文化圈以其开放的文化态度,主导着国家文化的发展

方向。当时宫廷之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长于绘画的文人和匠师,如何澄、刘贯道、张孔孙、和礼霍孙、李衍、阿尼哥等等。一时间群贤毕至,元代宫廷绘画立即步入初兴期。

元初宫廷画坛,基本承袭金代画风。山水以李郭风格为主,人物则继承唐、北宋、金以来宫廷绘画的写实传统,更具民族特色。除此之外,金代张瑀敦厚淳朴的人马画以及王庭筠洒脱不羁的水墨梅竹,以金代文人为纽带也进入元代宫廷绘画视野之内。^[1]元初宫廷画家大多来自北方汉地,或者是较早归入蒙古帝国的西域、吐蕃等地区。南北一统之后,江南画家北上而来加入其中。但是,由于政治地位不平等,南方画家在这一文化圈内尚不能起到实质影响作用。当时宫廷之内,起主导影响的是继承金代画风的北籍画家,如何澄、李衍、和礼霍孙等。南方画家进入大都文化圈后,因为大都文化圈所具有的向心力,开始学习当时大都文化圈内流行的绘画风格,如赵孟頫对李郭山水进行系统学习就是在北上大都之后。

初兴期的宫廷绘画活动,主要在翰林兼国史

^{*}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课题“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元代绘画风格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5YJC760060)。

[收稿日期] 2015-09-23

[作者简介] 刘 凯,男,山东泰安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院和集贤院供职的文人及文人画家间展开。但是,应该认清的是,当时在两院任职的文人多是以文学修养和理学才智著称,对是否要拥有绘画才能没有具体要求。这就使得绘画在元初大都宫廷及相关雅集活动中不能占据主要地位,理学治国、诗文酬唱才是最主要内容。所以,元初宫廷绘画活动呈现出分散性和附属性特征。所谓分散性,是指元初宫廷绘画活动更多是画家与统治者间的单向流动,宫廷画家之间横向的群体活动并未普遍展开。如和礼霍孙在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奉命写太祖御容,十六年(1279)二月又奉命写太上皇与太宗御容放置在翰林院以供祭祀;^[2]刘贯道于至元十六年(1279)因画真金太子称旨,补御衣局使;^[3]至大二年(1309)九月,赵孟頫收到皇太子命其绘制河间等路进献嘉禾、有异亩同颖及一茎数穗者这类政治性绘画任务。^[4]附属性,是指元初宫廷绘画,一般是作为诗文雅集这类活动的附属内容而存在,以书、画为主题的雅集性活动在元初尚不多见。由于元初纯粹的宫廷绘画活动很少,这种附属性就在由蒙古皇室主导、仕宦文士集中参与的文人雅集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元代前期最著名的文人雅集是雪堂雅集。雪堂雅集是至元年间僧人雪堂,在自己的禅房天庆寺举办、由当朝多位名公参加的文士雅集活动。这一雅集中,出现有几位在内廷任职且擅长绘画者,如张孔孙、赵孟頫等。

雪堂,俗姓张,名普仁,字仲山,号雪堂。早年随其父在丰州(今内蒙古绥远),因“机锋灵峻”得到蒙古附马阔里吉思的赏识,请他主持当地的法藏院。至元九年(1272),雪堂奉世祖诏入大都,阔里吉思又出重资购得遭受过兵火的永泰寺遗址,作为他待问驻锡之所。至元二十二年(1285),皇孙甘麻刺于永泰寺旧址为雪堂重建寺院,是为天庆寺。从世祖忽必烈到皇孙甘麻刺,雪堂都可说是皇室贵宾。可见雪堂与蒙古皇室关系之密切。雪堂在“禅悦余暇”,又乐于从士大夫游。^[5]自己的禅房天庆寺便成为当时朝廷名公的雅集场所。雪堂雅集的参加者多是当时的著名文士仕宦,如商挺、张九思、王磐、燕公楠、徐琰、李谦、阎复、徐世隆、王恽、胡祗遹、张孔孙、夹谷之奇等。从雅集参与者王恽《秋涧集》卷十八《题雪堂雅集图》、卷四

十三《雪堂上人集类诸名公雅制序》、卷五十七《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以及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题雪堂和尚雅集图》等文可知,在至元年间天庆寺举办了多次雅集聚会。

雪堂雅集系列活动中,较为重大的一次是有商挺、王磐、徐世隆、李谦、王恽等十九人在参加的“即寺雅集”。雅集以赋诗作文为主要形式。就是在这次雅集之后,雪堂将十九人所作诗与每人画像并刻为“雅集图”以留存。^[5]可见,绘画在这类雅集活动中仅是附属性内容。再后来,南方士人逐渐加入到雅集中来,使队伍更加壮大。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后的一次雅集,盛况空前,有二十八位士人参加,来自南方的赵孟頫亦在列,但除他之外,大抵皆北方士人。^[6]赵孟頫官位在这二十八人中为最低。他能参加这一雅集,乃因在京名士的提携。雪堂雅集中或有人已知赵孟頫的书画才能,但在当时的大都文人群体中,赵氏不仅因官位低、资历浅,也因文艺观的种种不合拍,尚无法扮演重要角色。

除却翰林兼国史院、集贤院这类宫廷文人间的雅集活动外,工部、将作院以及大都留守司这类宫廷绘画机构的日常工作也正常开展。蒙古统治者将从全国各地征虏而来的画工分散在每个机构之下,为满足皇室之需而日夜劳作。画匠每年要完成固定的徭役任务,故而缺少人身自由,交流性质的绘画活动基本少见。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初兴期大概持续了四十年。至1311年,武宗驾崩仁宗继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仁宗推行“以儒治国”政策,带来新的文化政策,加之前期的充分积累,使宫廷绘画活动一跃进入到高潮期。

二、高潮期

1311年,仁宗即位,推行“以儒治国”政策,裁撤冗员,整顿朝纲。仁宗统治时期是元代政治、文化的转折期。皇庆二年(1313)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同年十一月下诏恢复科举,考试内容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2]这表明,理学在元代被确立为官学。大力推行文治,使仁宗身旁开始聚集起大量文人儒士,“仁宗皇帝临御之初,方内晏宁,乃兴文治,一时贤能才节之士,悉置左右。”^[7]当时有姚

隧、阎复、洪革、赵孟頫、李衍、元明善、张养浩、袁桷、虞集等名士在侧。

仁宗“通达儒术”，对汉文化极为推崇和喜爱，不但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科举制，还下令将儒家经典《尚书》、唐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宋人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以及司马光撰写的史书《资治通鉴》等书翻译成蒙古文，以加快蒙古族的汉化进程。除此之外，仁宗对绘画亦甚为重视。即位之后，仁宗尽力召回在世祖朝任过职的文人画家，亦十分器重前朝遗留画家，如赵孟頫、溥光、李衍，以及工笔画家刘元、任仁发等，使他们在离世之前将自身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至。并且，仁宗还招纳商琦、李士行、王振鹏、李肖岩、唐棣等著名画家入宫任职。这样前后相继，掀起了元代宫廷绘画的第一个高潮。

仁宗在位期间，秘书监成为继翰林兼国史院、集贤院之后，宫廷画家聚集的又一重要机构。在此任职的画家多是技艺精湛的专业画家，如秘书卿商琦、典簿王振朋、书画辨验直长唐文质。尤其商琦和王振鹏，特别被仁宗看重。虞集在总结仁宗朝的文治盛世时，于绘画仅提及此二人：“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备。自其在东宫时，贤能才艺之士，固已尽在其左右。文章则有翰林学士元公复初，发扬蹈厉，藐视秦汉。书翰则有翰林承旨吴兴赵公子昂，精审流丽，度越魏晋。前集贤侍诗学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艺笔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盖 upper 于绘事，天纵神识，是以一时名艺，莫不见知也。而永嘉王振鹏其一人也。”^[8]从虞集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仁宗朝宫廷绘画的核心其实是商琦。商琦，山东曹州人，父商挺，是元初名臣，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商琦知遇于仁宗朝，又连续享誉于英宗、泰定帝两朝。大德八年（1304），商琦拜见成宗铁穆耳，当时就与尚为皇太子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交往密切。仁宗即位之后，于皇庆元年（1312）授商琦集贤侍讲学士、朝列大夫，延祐四年（1317），升侍读官、通奉大夫。至治三年（1323）十一月初二日，以通奉大夫自集贤侍读学士上升为秘书卿。商琦擅画山水，宗法李成、郭熙一脉，笔墨俊雅，亦有高趣，师法古人亦师法造化，以切身感受入画，声誉于时，与高克恭、赵孟頫并称“元初三杰”，有

“天下无双比”之誉，对元代中后期画家有一定影响。商琦在当时画名极高，尤其在山水画领域，甚至赵孟頫亦有所不及，这可能与他多为皇室宗亲作画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他曾为也先帖木儿作山水壁画，并有赵孟頫的题诗。此也先帖木儿即一显赫之蒙古贵族，于1280年袭封云南王，武宗立后又改封营王。

1328年，元文宗即位。文宗是元代另一位力主推行文治的皇帝。在他被封在集庆（今南京）为梁王时，就已开始招揽各类人才，颇有贤名。后来奎章阁中的著名文臣柯九思，就是文宗尚在金陵时经人引见而结缘。文宗推行文治的举措，吸引了大批文人前往投靠。当时在黄岩任职的李士行，因听闻文宗在南京善纳人才，便计划转去投靠，可惜竟卒于途中。文宗喜用南方文人，并且爱好书画，身旁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擅书画者。据《元史》记载，文宗书法受赵孟頫影响而宗晋人，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铭》遗风。他亦曾命近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图》，大年以自己未尝至其地而请辞，于是文宗索纸运笔，先作一稿，大年惊服，谓格法周匝停匀，虽积学专工，莫能及也。^[9]正是在文宗的鼎力支持之下，元代宫廷绘画活动得以继续繁荣发展。

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兴圣殿西廊奎章阁设立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术文监。奎章阁自此成为文宗推行文治的重要场所。在奎章阁办公的这两个机构，开始容纳画家，成为中期重要宫廷绘画机构。奎章阁学士院成立之后，虞集拜奎章阁侍书学士，举荐陈旅、揭傒斯为奎章阁授经郎；至顺四年（1330），柯九思被委任艺术文监鉴书博士一职，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自此，奎章阁成为元中期宫廷绘画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在奎章阁之内，文宗常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雅琥、李术鲁朮、阿璘帖木儿、忽都鲁而迷失等文臣论说国事或品赏书画，^[9]文人之间亦以书画为中介相互交流切磋。天历二年（1329），在奎章阁，柯九思向文宗进呈《曹娥碑》；十一月，奎章阁联衔进呈赵幹《江行初雪图》；十一月，柯九思、虞集等人一起鉴识江参《千里江山图》；至顺元年正月七日，奎章阁诸臣审定重装李成《寒林采芝图》，后有诸臣的题款，如李术鲁朮、柯九思、雅琥、虞集、宋本、宋璩、

李讷、林宇等；正月二十七日，柯九思为欧阳玄作墨竹一幅，虞集为之题。^[10]这一时期，奎章阁内书画活动异常频繁，柯九思和虞集则是活动的引领者。二人同在奎章阁，柯九思每作画，虞集必题，此举在当时朝中传为美谈。

高潮期宫廷画家的组成，体现出南北融合的时代特点。仁宗朝时的宫廷绘画活动仍是由北籍画家主导。来自山东曹州的商琦，是当时宫廷绘画活动的核心画家，但是南方画家已经在大都文化圈中占据一定地位，并开始发挥影响。如来自浙江永嘉的王振鹏，因为画艺“受知”于仁宗而“累官数迁”，成为当时宫廷绘画活动的重要代表画家。此外，赵孟頫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以在杭州文化圈中形成的书法风格来改造大都书风，在绘画领域亦是创作与理论并举，积极引导当时的宫廷绘画向唐及北宋前期传统回归，影响了元代宫廷绘画的发展方向。至文宗朝，引领宫廷绘画发展的主动权，已经由北籍画家之手完全转入南方画家手中，尤其是以柯九思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画家，成为当时宫廷核心画家。宫廷绘画活动的核心画家由以北籍为主转到以南籍为主，反映出元代南北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加深。

高潮期的大都雅集，书画开始成为主要内容。这从侧面印证了元代宫廷绘画活动高潮期的到来。当时大都有一个与艺术相关的重要雅集——皇姐雅集，主人为仁宗的姐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祥哥刺吉系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太子真金孙女，答刺麻八剌的女儿，武宗的妹妹，仁宗的姐姐，嫁驸马都尉阿不拉。1307年，武宗继位后封其为“皇妹鲁国大长公主”，其夫驸马阿不拉被封为鲁王。1311年元仁宗继位期间又封其为“皇姊鲁国大长公主”，后来她的侄子元文宗继位后，又封其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她被认为是皇室中最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这位蒙古贵妇受汉文化熏染，喜欢历代法书名画。至治三年（1323），由祥哥刺吉召集，在天庆寺举行了一次重大雅集活动。这次宴会有众多文人参加，祥哥刺吉拿出自己珍藏的书画若干卷，让与会文儒各尽其能题识于后。留下书跋的诗人有袁桷、魏必复、李洞、张珪、赵岩、杜禧、赵世延、王毅、冯子振、陈颖、柳贯、吴全节、王观等14人。祥哥刺吉收藏的

书画都留有“皇姊图书”或“图书珍玩”的鉴藏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王振鹏的《伯牙鼓琴图》卷，根据图后冯子振、赵岩等人的跋文断定是祥哥刺吉的收藏遗存，也许这张画就在公主举办的某次品鉴书画的雅集上被冯、赵二人题跋的。天庆寺雅集的规模之大堪称元代之最，在整个中国书画鉴藏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高潮期仅仅持续了二十几年。1332年，文宗去世，宫廷之内北方保守势力重新掌权，他们开始驱逐南方文人。之后，柯九思、虞集等人相继南归，宫廷之内繁荣不再，宫廷绘画活动亦开始走向衰弱。

三、衰弱期

至顺三年（1332）农历八月，元文宗在上都病逝。为弥补当年毒死兄长的内疚，文宗在去世前下遗诏立其兄明宗之子为嗣。文宗驾崩之后，皇后卜答失里与大臣燕铁木儿拥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但宁宗在位一月即卒。于是明宗的长子妥懽帖睦尔被从广西迎接到大都，次年即位，是为顺帝。

元代是个特殊的时代，帝王更替对文化环境带来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更为明显。顺帝对中原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尤其喜欢书法，对绘画亦有兴趣。据《元史》记载，顺帝曾“览宋徽宗画称善”，以致招来大臣康里巎巎的批评；^[2]亦曾在阅览张彦辅的绘画作品之后赐其官职；^[11]曾诏张彦辅、周朗图画西域拂郎国遣使进贡的骏马；^[12]至正十五年（1354），此时全国已是战火纷飞，清宁殿建成之后，顺帝仍不忘“敕画史图其壁”，赵雍为此推荐江南画师六人，只因道路不通未能成行。^[13]依此来看，顺帝朝宫廷绘画理应获得较好发展。但事实却完全相反。

顺帝在位的前期，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权臣伯颜手中。伯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朝中排除异己。除擅权之外，伯颜还特别仇视汉人。至元元年（1335），他上章罢停了当年礼部科举。在朝廷之内亦着手驱逐汉人官宦，大量南方文人因此被迫南返。即使之后顺帝掌权，但他为清算文宗毒死明宗的罪行，“诏撤文宗庙主”，由文宗创建的奎章阁自然难逃被裁撤命运，虽然时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的康

里巉巉向顺帝进言得以幸免,被迫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但是,顺帝对待宣文阁,始终不如文宗对奎章阁那般重视,不再笼络文人画家至此。再加上元末社会矛盾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全国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使得南北交通阻隔,宣文阁繁荣不再。这样的时代环境影响下,顺帝朝的宫廷绘画活动自然跌入了低谷。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衰弱期,始自元统元年(1333)。这一年,朝廷风云已变,以伯颜为代表的北方守旧势力重新掌权,南方士人的处境越发艰难。1333年春,柯九思与虞集、甘立道别,和陆友仁一起南归。同年六月,虞集以病谒告归临川。文宗时期奎章阁书画活动的两位关键人物纷纷南下,表明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高潮期已然结束。顺帝掌权之后,对文宗弑兄夺位事件进行清算,文宗朝遗留大多被驱散殆尽。文宗一手建立起显赫一时的奎章阁亦濒于废弃。萨都刺有诗形容奎章阁的衰败情形,诗云:

奎章三月文书静,花落春深锁阁门。

玉座不移天步远,石碑空有御书存。

花落春深似去年,无人再到阁门前。

当时济济夸多士,争进文章乞赐钱。^[14]

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顺帝“罢天历以后增设太禧禋等院及奎章阁”^[2],时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的康里巉巉向顺帝进言,他说:“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这样一番苦谏才使顺帝改变主意,“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巉巉董治。”^[2]改制之后,宣文阁不再设置大学士,加之顺帝对书法的喜好胜过绘画,宣文阁下的鉴书博士,更注重文史、品鉴和书法方面的才能,^[15]绘画的存在空间被大大削弱。最鲜明的就是:柯九思之后的奎章阁及宣文阁八位鉴书博士,没有一位能擅长绘画的。^①自此,宣文阁再无著名画家任职,各类相关史籍中鲜有绘

画活动记载。

衰弱期的宫廷绘画活动几乎停滞。相关宫廷绘画机构,翰林机构和宫廷收藏机构少有画家任职,仅有集贤院、秘书监之内还有画家任职,见诸记载的宫廷画家有赵雍、张彦辅、班惟志、刘融、周朗、何思敬几人而已。至正初,元顺帝曾诏赵雍进京,为新建成的宫殿台阁图绘壁画。至正十五年(1354),赵雍再次奉召入京,得以在曾经云集了元代众多文人画家的集贤院担任集贤待制一职。但在至正十七年(1356),赵雍授湖州路总管府事,随即南返故里。班惟志于顺帝时授集贤待制,但其书名大于画名许多;刘融于至元三年(1337)以中宪大夫自诸司局总管升任秘书太监,至正十七年(1356),升任秘书监,善画山水,师法李郭;何思敬曾任秘书监丞(从五品),善画山水。但后三人基本没有参与当时宫廷绘画活动的记载。

衰弱期最重要的宫廷绘画活动,是在顺帝至正二年(1342)七月,意大利罗马教皇委派佛罗伦萨人、方济各派教士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noli)到大都,向顺帝进呈教皇信件以及一匹拂郎国的骏马。这匹被当时称作天马的法国巨形马,引起了顺帝及朝中大臣的惊叹和赞美,为了这匹异马,顺帝在朝中举行盛会,命文人学士和画家,或著文或作画,来记述这一盛事,于是就有张彦辅作《拂郎马图》、周朗作《拂郎国献马图》的宫廷绘画创作。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衰弱期,已经很难出现由皇室赞助、以书画为主要内容的文人雅集活动,绘画只是作为宫廷政治活动及日常生活的点缀。这主要是因为元代后期文化政策的转变,以及全国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使得蒙古统治者早已将文艺之事抛却脑后,怎样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固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并且,在元代后期出现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杭州、苏州取代大都成为

^① 柯九思之后,在奎章阁及宣文阁任鉴书博士一职的共计八人,分别是奎章阁时期的王守诚,宣文阁时期的王沂、周伯琦、麦文贵、归旸、郑深、李黻和刘某。1333年,柯九思南返之后,王守诚继任奎章阁鉴书博士一职。王守诚长于书法,学褚遂良得其秀整。大概是由于其时顺帝年幼,未留意于书画。所以王守诚在鉴书博士任内也就无所事事,不像柯九思那样,日日侍御,为人瞩目;另一可能的原因是王守诚任鉴书博士为时甚短。至元六年(1340),顺帝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次年五月又将崇文监(原属宣文阁,其前身为奎章阁下之艺文监)改属翰林国史院。到了这个时候,宣文阁下已经没有隶属机构,也不再称“学士院”。当然也就不再设大学士和学士,而鉴书博士无形中便成了此机构的主要官员,而且当时的鉴书博士大都兼经筵或史官,于是鉴书博士的职责,已不再是“专一鉴别书画”,而扩延到历史与文化的工作上。如周伯琦、王沂、麦文贵都曾参与修史的工作,与翰林国史院有密切的关系。至于归旸、郑深、李黻等,元代文献中甚至无其书画才能记载。(见姜一涵《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新的文化中心,文人雅集活动的中心由大都转到了苏、杭二州。文人及书画人才大多南下苏杭,直接导致大都宫廷绘画活动缺少了参与者,呈现衰弱之势也就难以避免。

四、结语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分期,帝王更替在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初兴期(1271-1310),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元初,宫中各类绘画机构设置完成,立即搜集人才,容纳画家,宫廷绘画活动得以开展。此时宫廷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翰林兼国史院和集贤院,代表性画家有何澄、赵孟頫、刘贯道、和礼霍孙、张孔孙等。高潮期(1311-1332)历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七朝。由于仁宗与文宗对文治的提倡,使得宫廷绘画在二十年间持续繁荣。秘书监、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是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活动中心,代表性画家有商琦、王振鹏、李肖岩、柯九思、唐棣等。衰弱期(1333-1368),横跨顺帝统治时期。顺帝对书法的热情大过绘画,使得此时宫中无著名画家供职,更没有形成宫廷绘画活动中心。当时的常态是:宫廷有所需时即征召画家进宫,带有很大随意性。这一时期的宫廷画家仅有赵雍、张彦辅、班惟志、刘融、周朗、何思敬几人而已。后期宫廷绘画活动的衰弱,印证了蒙古政治统治的衰微。1368年蒙古皇室退居漠北,元代宫廷绘画活动在经历了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后也就走向了终结。

[参考文献]

- [1]余辉.元代宫廷绘画史及佳作考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3).
- [2][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3][元]夏文彦.图绘宝鉴[M].北京:中国书店,1983.
- [4]王似峰,黄惇.赵孟頫年表[J].历代书法资料库,2009.
- [5][元]王恽.秋涧集·卷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元]姚燧.牧庵集·卷三一[M].四库备要本.
- [7][元]苏天爵.慈溪文稿·卷十[M].适园丛书本.
- [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九·王知州墓志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 [10]万新华.中国名画家全集·柯久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1][明]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六·山庵图序[M].四库备要本.
- [12][元]陈基.夷白斋稿·外集[M].四库备要本.
- [13][元]刘仁本.羽庭集·卷六·赵仲穆丹青界画记[M].四库备要本.
- [14][元]萨都刺.雁门集·卷三·奎章阁感兴[M].四库备要本.
- [15]姜一涵.奎章阁及奎章人物[M].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

(责任编辑 南山)

复述与创新*

——明清绘画品评中的崇古标准及价值

高 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 明清时期的绘画表现出浓厚崇古现象,品评标准上带有鲜明的崇古特色。此时的绘画品评既有崇古意识,同时又不泥古,而是倡导借摹仿、借用古代绘画的图像,抒发自我性灵,创造新的艺术。本文从崇古评画成因及表现、摹古及创新、价值及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启示等方面展开评述。

[关键词] 明清; 绘画品评; 崇古; 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104-04

明朝在文化思想上推崇汉魏盛唐文化,复古思想浓重。这股思潮在文学、书法、戏曲、绘画方面影响都很大,前后贯穿了一百多年。这个风气在清初再度兴起,成为封建社会末期强大的文化思潮。“虽然中国思想文化历来有厚古薄今的传统,但明代艺术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崇古泥古意识还是令人感到惊异,有明一代的艺术批评也正是在这种整体价值取向中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形态建构。”、“明代艺术批评中的崇古意识首先表现为在艺术批评标准上普遍的崇古观念。”^{[1](P.298)}明清绘画品评有崇古意识,同时又不泥古,而是倡导摹仿、借用绘画的图像,抒发自我性灵,创造新的艺术。

一、崇古评画成因及表现

重视前人绘画的艺术成就,六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谢赫的“六法”专门列“传移摹写”,“传移”指的是复制作品,做资料性的流传;“摹写”是模仿和学习,便于掌握特定的格式和技巧。学习绘画,首先从掌握前人的程式开始,因而摹古以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进入到了中国画创作的基本法则中,印证学习古人的重要性。在绘画创作还不够

成熟的上古时期,以前辈为尺度的标准评价绘画已经为中国画的品鉴确定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是中国画风格和艺术传统的特殊传递方式。六朝到唐代,创造出了许多理想的典范,各种“样本”大量出现,吴中画家张僧繇创立南朝绘画“疏体”风格,世称“张家样”;北朝宫廷画家曹仲达创“密体”风格,世称“曹家样”;唐代宗教人物题材“吴家样”、仕女画题材“周家样”、动物题材“六扇鹤翔”等,概括了图像式样,也为艺术入门乃至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借鉴学习的样本。像“吴家样”,则成为被后代临摹最多的范本,连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唐人以吴(道子)集大成而为格式,故多似。”到了唐代,张彦远对品鉴绘画者还提出了要求,“所宜详辩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2](P.169)}“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2](P.166)}“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2](P.174-175)}指出了认知范本,熟知众家艺术特点的对欣赏绘画的重要性。

以古今为标准评价绘画的优劣高下,宋代更为突出。郭若虚说:“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

* [基金项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才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明清绘画品鉴史”(项目编号:2015R069)。

[收稿日期] 2015-09-23

[作者简介] 高 阳,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鱼,则古不及近。”^[3](P.50) 郭若虚并没有简单的以古今时代为标准评价绘画水平的高低,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出答案,像六朝时期顾、陆、张、吴的人物画,唐代韩幹和戴嵩擅长画牛马,学习者众,而后学者终未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是近代不及古人。而当朝(北宋)李成、范宽的画,前不凭借老师,后不再有接踵的人,所以是古人不及近代。郭若虚对待古画今画的态度,并未一味的厚古薄今,其评价是中肯的。其后,宋代品鉴绘画,复古主义的倾向逐渐浓重,体现在鉴赏绘画,要追究“师承”、“格法”、“古意”,韩拙说“凡阅诸画,先看风势气韵,次究格法高低者,为前贤家法规矩用度也。”“今人以天性耻于学,此所以去古逾远而业逾不精也。”(《山水纯全集》)韩拙品画,也有浓重的复古思想,除了主张学习古人的规矩法度外,还强调了学古人的目的是从古人的格法入手,再创造自己的画格,“凡学者宜先执一家之体法,学之成就,方可变异为己格,则可矣。”苏轼评价李公麟的画“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吴)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东坡续集》卷六)赞李公麟的画有六朝和唐代绘画的“古意”风范,这个品鉴标准显然和同时期的“四格”(黄休复)、“三品”(刘道醇)品第品鉴体系有异,显示出更为超脱的审美取向。

到了元代,复古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以画贵有“古意”为标准评价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在理论界逐渐占了上风。元代画家对古代绘画赋予了特殊的价值,那就是崇高、优雅的风格。赵孟頫《自跋画卷》:“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大德五年三月十日赵孟頫跋。”赵孟頫引晋唐北宋初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的院体画风,这“古意”蕴涵着质朴简率的风格。美国艺术史学家李铸晋认为赵孟頫的“古意”是一种“古典主义”规范,他有意识地唤起欣赏者对传统绘画审美韵味的重视:

“古意”是源自中国复杂文化传统的典型名词。这在西方术语中,并无相等的字眼,前文有些地方引述到时,便以(archaism)“仿古主义”来代替,但由于“仿古主义”的对象是指一些古老、陈旧和绝了迹的东西,且含意常是否定的;所以用这个字眼来代表赵孟頫画迹所反映的各种概念,并不

十分适当。为此,我们采用(classicism)“古典主义”这个比较肯定的西方名词。在一般用法上,根据韦伯斯特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这是指“在批评上,已公认为正式标准的文学或艺术所包含的理论和特征,这些理论和特征原属希腊和罗马的文学艺术,且具有清晰、简洁、庄严和正确的风格”。作为一个模范,古典主义常被用作评判的标准,带有理想的成份。^[4]

品评绘画,首先要看作品中前人画作图像因素的“摹本”植入、形式组合以及美学要素“气韵”的神会契合。比如柯九思欣赏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先就看出唐人绘画的渊源,有韦偃《暮江五马图》、裴宽《小马图》的影子,称赞赵画的“古意”是“岂公心摹手追,有不期而得者焉?至其林木活动,笔意飞舞,设色无一点俗气,高风雅韵,沾被后人多矣。”赞其不仅学古人画的笔墨气韵,重要的是在学习古人绘画的过程里,将自己崇尚中和美、古雅美和自然美审美趣味融合进去,成就了一家之体。在赵的艺术里,古代画风既是要借鉴和学习的伟大传统,也是表达观念的重要依据和表现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并不是要恢复古代绘画的保守主义,而是为绘画确立了一种新的艺术标准。

赵孟頫的“古意”绘画品鉴标准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他将“古意”置于首要地位,格法功力等标准则退到次要地位。从摹写“古典主义”规范入手,再结合自己的创作心得自创一格,这是很多文人画家的养成道路。元代诸大家,包括高克恭、黄公望、倪瓚、吴镇、王蒙在内的很多画家都在不同程度,师法、模仿和取法北宋唐代绘画。如倪瓚画树借鉴了李成、郭熙的范本,同时“参以北苑”,加入侧锋运用,形成了自己画树的程式;画石将“董巨”风范披麻皴转向折带皴,又借鉴北方画派的皴法,形成了自己的皴法程式;构图借鉴郭熙“平远”之法,将其“填充”、“组合”后成自己的构图程式。^[5]这种尊崇和借鉴古代绘画的行为,不仅是为了描摹图像、学习笔法,也不一定是为了保存珍本,还形成了文化心理上的对古代艺术的认知和认同。

二、摹古与创新

明清两代绘画,也有崇古摹古的风气。明清两代的绘画,集古典绘画之大成。历史上文化失范的朝代,人们更愿意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

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中国君主专制到明清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而文化专制也达到了登封造极的状态。明初，朱元璋就大兴文字狱，封杀异己思想，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文字狱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历史上少见。明清时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以程朱理学统御天下，控制士人的思想，钳制了读书人的创造性；同时加强了学术专制，大举编修古代图书，收集考证编撰大型类书。这些举措，使得明清两代文化和艺术弥漫着复古的风气，重视文艺的“模式化”、“正统化”，总结和整理前人艺术传统蔚为成风。所以，崇古和尊师是画史上摹古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明清的士人画家选择崇古风，尚古意，也不完全是文化高压下迫不得已，而是画家的自觉选择，沈周就曾经在元代画家王蒙的画《太白林峦图》上题跋：“黄鹤久仙去，白云空悠悠。斯人不可见，笔意千古留。遥遥太白山，落纸云烟浮。长松互溪屿，绝壑争泉流。高士挟琴坐，雅抱清如秋。”表达了自己对王蒙艺术成就的由衷推崇和仰慕。同时，崇尚古意也和明清时期世俗生活、商业背景、受众市场的接受程度有关。

明代早期画家，很多画家潜心临摹古人的绘画，虔诚学习前人的艺术成就，无论“浙派”学习南宋，其后的“吴门画派”取法宋元、后期的“松江画派”、“华亭画派”取法北宋元代，落笔未脱宋元的传统。他们继承前代艺术衣钵，吸取传统精华，“以古人精英为用”，都走过“师古”、“摹古”的道路，至于以“仿”、“摹”、“临”为题做画，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做法。而评价绘画也以有“古意”为贵。

明代的很多画家都有“仿古”作品，这个风气到清代更加盛行。这些作品，多以描绘北宋或元四家绘画为范本。姜绍书《无声诗史》评价这些画家，说文嘉“善书画，能鉴古迹，书法倪雲林。”陈淳“以元人为法。中岁斟酌大小米高房山间，淡墨淋漓，极高远之致。”陈治“善绘事，王元美论其山水喜仿宋人而出己意。”我们看一些画家的作品，明代中期苏州画家沈周，他40岁之前宗法董、巨，后来又师承元四家。他有很多仿北宋和元四家的画传世，如《仿雲林山水图》（1473年，上海博物馆藏）、《仿董巨山水图卷》（147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仿倪瓚山水图》（14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1487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清代这样的仿古作品也相

当多，光是临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画家，就有几十人之多，恽向、王时敏、王鉴、王石谷、王原祁、吴历、张庚、方薰都有模仿“富春样”画作传世。

明代画家不仅热衷于继承和整理、临摹前代绘画，崇古的理论也很多。董其昌将绘画史上的流派划分成了“南北二宗”，给文人画家从技法层面到审美风格都提供了范本。他崇尚南宗而贬抑北宗，留下了“士气”、“生拙”、“天真烂漫”等画品标准，完善了文人画审美标准的内涵，同时也巩固了复古主义美学思潮。清画家“四王”画派画家，大量摹古、师古宋元作品，在清代近一个世纪里被捧为画坛“正宗”。王原祁强调画要有“南宗正脉之气”，批评其他明代浙派、吴门画派用笔用墨的流弊，并以南宗传灯者自居。他以“理、气、趣兼到”来概括“正宗”派的审美内涵，提倡“清真雅正”的正宗主流审美风尚。明代末期画论家顾凝远也重视古代传统，他在《画引》中，提出了“生”、“拙”、“枯”、“润”等品画标准，参照的也是元代绘画的传统。清代画论家沈宗骞有一套系统的“复古”理论，他痛斥俗学，注重传统经验，代表了传统派和正统派的品鉴理想。《芥舟学画编》里列《摹古》《自运》等章节，强调了摹习前人的重要性。他推崇的审美趣味也是从揣摩古人入手，同时自出胸臆，达到“闲静恬适之意”、“韵如郑草江花”、布局应求“平中之奇”、用笔“老而似嫩”的境地。

摹古和创新，并不相悖。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在《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的自然风格》一书深入讨论了明末清初绘画中的临、仿等问题，将他们定义为创造性的临摹，并认为临仿古画在实践上并没有削弱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明清画家通过摩、仿前代绘画图式，将前辈的图像加以分析、解构、通过临仿绘画的取景方式、画面经营、空间传达、笔墨皴法、线条设色，熟练掌握绘画创作的基本语汇、思维模式、造型规律。在自己创作绘画的时候，将这些构图、墨法、线条借用，并进行再创造。这是摹古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摹古而少了画家的创新，会造成艺术样式化、程式化，会束缚绘画的生命力。一味仿古也会造成过份追求笔墨形式而脱离了现实生活，所以，很多理论家对绘画的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在哪里，怎样培养和保护画家的个性和创造力都发表了见解。明代初期画家王履，对待前人留下的艺术格法，报着“宗与不宗之间”的态度批判性的接受和取舍。自然山水千变万化，不能套用前人的表现方法，他

的这个态度是反对“以为乖于诸体”的复古者们。王履认为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在《华山图序》里表明主张,画家应该到自然中去,艺术的创新应该来自生活体验,他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以造化为师,才能冲出程式化的条条框框,使作品出新。很多赞成复古的画家,对待摹古的态度也是多面化的。一方面他们赞成学习古代传统,同时又反对泥古不化,即便是学习古人,该学的是神韵,而不是机械模仿。董其昌提倡学古要知变通,而且以造化为师同样重要,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画禅室随笔》)清代初年,既有“四王”这样的复古正统占据主流的画家,也有石涛这种倡导革新和创造的画家。石涛反对泥古,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有革新和变化,创作的目的是“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古代艺术流传下来的艺术规则和法度,应该有分析地接受,“有法必有化”,对待前人的艺术遗产应该持反省的态度,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再以创新的方式推出,以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

三、价值和启示

当代艺术创作,随处可见复述和引用传统符号,转化为当代艺术表现语言的现象,这在装置、影像、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十分常见。徐冰从《康熙字典》等字典与古书中找出许多偏旁部首,创造性地将其拼凑在一起,编出一套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伪汉字”,之后再将其一一刻印在木头上,排列成活字印刷板,占满了展示空间的四墙和天花板。对这幅长达几十米的巨幅书法长卷《天书》,徐冰认为自己是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去处理当代艺术:“它所表达的是坚定的中国方式与态度。不

管它的创作还是与观众的接触,都是一种发源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这也是这件作品的真正价值。”吕胜中从陕北剪纸“抓髻娃娃”中获得灵感,并将这个传统的造型元素经过自己的创作基本语言“小红人”,成功地完成了将其在当代艺术语境里的转化。从剪纸的形式来说是传统的,但是艺术观念和内核却是现代的。艺术家本人将这种传统符号的复述是深刻的、智慧的,也是充满了创造力。

继承艺术传统并非机械的复述,也不是割裂和简单地解构、组合和堆砌,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将文化精神内化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传统博大的艺术资源,蕴含激发艺术家灵感的丰富宝藏,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本土艺术家创新来说,仍然富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凌继尧. 中国艺术批评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何志明,潘运告. 唐五代画论[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 [3]郭若虚,邓椿. 图画见闻志·画继[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 [4][美]李铸晋.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下篇)[J]. 新美术,1989(3).
- [5]刘凯,徐子方. 倪瓒绘画的程式研究——以《渔庄秋霁图》为例[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责任编辑 南山)

浅谈教育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几种关键意识

——以《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为例

颜莹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教育期刊编辑要成为优秀的选择者、优化和传播者,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编辑素质,同时引领与超越意识、转化与加工意识、策划与创新意识等关键意识也应该弥散在编辑的工作意识、思维方式、具体实践中,这样才能使编辑工作从机械的流水作业走向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专业实践。

[关键词] 教育期刊; 编辑; 关键意识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108-04

在期刊杂志的出版过程中,编辑的基本功能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是选择,第二是优化,第三是传播。“教育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所进行的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一系列活动,就是对含有最新消息、情报和知识的教育信息的获取、选择、加工和传递的过程。教育期刊编辑的任务,就是通过编辑活动,将作者有关教育教学的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信息,准确、迅速、有序地传递给读者,使广大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及时沟通信息,进行知识交流,相互借鉴,开拓思路,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不断提高和发展。”^[1]

教育期刊编辑要成为优秀的选择者、优化和传播者,就要有良好的文化学术素养和文化判断能力,要及时了解教育动态,正确解读教育政策,深入教育第一线,丰富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练就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职业敏感。要有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稿能力,要有很好的文化学术素养、语言文字功底,要将最具实践价值和最有指导、借鉴意义的文章优化组合,精心编排,以放大优质稿件的效应。

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在选择、挖掘优秀稿件,优化组合、编排出版的过程中,除了这些基本素养和职业要求外,如下几种关键意识也应该弥

散在编辑的工作意识、思维方式、具体实践中,如此,才能使编辑工作从“机械”的流水作业走向“智慧”的专业实践。

一、引领与超越意识

编辑的本质是选择,出版的本质是传承,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实际上就是在为文化传承做去粗存精的工作。可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辩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加工焉。”^{[2](P.246)}教育期刊中的文章,是作者科研、教学、实践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对文章的内容、文字、结构、逻辑、学术价值等编辑要有一个全盘的把握。对创新性的内容、过渡性的文字、有疑问的地方,编辑要认真处理,弄清楚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价值所在,才能做出专业的选择和判断。

但仅仅从来稿中被动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是不够的,一本刊物要有自己的教育立场和主张,在贴近读者,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编辑也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要有适度的引领和超越意识,力求通过多种方式引领读者去关注先进,学习先进,超越自己已有的教学实践经验,在不断

[收稿日期] 2015-07-15

[作者简介] 颜莹,女,江苏常州人,《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实践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超越自我的基础上,达到引领读者发现与超越的美好境界。

2014年9月4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共有417项成果获奖。这是基础教育领域内由政府设立的最高级别的业务类奖励。因是首次评选,高校、基础教育机构与中小学数十年积累的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教学成果一同参与了评审。江苏作为科研大省和强省,也在这次评选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从2015年第1期起,《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开辟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巡礼”专栏,选取我省一些优秀的教学成果进行展示,希望读者能从这些成果中得到更多的启示。

在约稿过程中,很多课题主持人都表示,成果已以不同形式发表过,不希望重复,也难以就研究成果再成新文。栏目编辑针对此情况策划了“成果档案—成果简介—历程回眸—反思与展望”的栏目架构,用微缩和全景的方式让普通读者了解这些优秀成果的全貌,更重要的是,用“反思与展望”板块来引导课题在获奖后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很多课题主持人写完稿件后,都表示,这样的策划和约稿,让他们在获奖后及时思考,自己和课题接下来要往哪里去,而这种思考可能是获奖后更为重要的。

因此,当我们跳脱了简单的“选择甄别”和“原样呈现”,把研究和引领渗透其中,就能使稿件和栏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应。

二、转化加工意识

当一篇稿件出现在编辑面前,很多时候稿件不够完美或足够优质,但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如果文章有“亮点”和优质的“可能”,编辑一方面可以引导作者对文章进行重新加工,使其更为出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文章进行转化和加工,使其学术价值得到彰显。

1. 从“一篇”到“一组”,放大文章的社会效益

有的时候,作者在投稿时,只是一篇单独的個人文稿,但如果编辑能独具匠心的将一些相关稿件组合起来,重新加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集束效应”。

如有编辑在投稿平台审稿过程中,发现了这样4篇文章(1)如何观摩公开课?(2)同课异构听什么?(3)如何透过具体的教学设计进行更深层

次的本原问题的思考?(4)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节课的优劣?当时,该编辑敏感地意识到,这4篇文章虽是自由来稿,但可以组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因为听课,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现实中,听课任务化、程式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围绕这样一个教师教学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将这一组文章编发出来,可引导教师更深入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从多层次回答和引导教师的困惑。于是,该编辑策划了“话题热议”的栏目,围绕“听课,我们该怎么做?”编发了这4篇文章,每篇文章都用导读的方式,突显作者的主要观点,引导读者进行思考。让这样一个教师熟悉的话题陌生化,引导教师重新深入思考和实践。

正如汪家明先生所说,“出版者、编辑最重要的素质,并不在于其是否善于‘策划’选题,而在于其是否善于‘发现’选题”。同样,被发现的选题,策划得如何,就看出版者、编辑的高下了。一个选题,进行什么程度的内容和文字加工,采用什么体例,切入的角度、节奏感,编排和表现形式——这一切,不仅仅是作者的问题,更是编者的问题。”^[3]

2. “前因”牵“后果”,增强杂志的时空感

“人物”栏目,是《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的常设栏目,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品牌栏目,以介绍教育领域的优秀人物和团队为主。这个栏目,已经办了近10年,在保持其风格的基础上,我们一直随时代和读者的需求做调整,让品牌栏目常办常新。

2015年7月杂志推出的人物是常州市实验小学的优秀教师许嫣娜,8年前,她的校长、师傅李伟平成为我们封面人物的时候,她作为李校长的徒弟,曾深情动笔写了“大马和小马的故事”(两人都属马),反映李校长对青年教师的关爱。8年过去了,这位年轻老师已经成长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还获得全国阅读教学大赛的特等奖,江苏省辅导员素质大赛特等奖等高层次奖励,这个当年故事中的“小马”也成为了我们人物栏目的主角,我们根据她的特质,让她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幸运”为切入点,总结自己光环和幸运背后的努力和付出。然后,我们又邀请她的师傅,写写“大马眼中的小马”,从旁观者和领导者的视角总结一个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的经验,这样对内容的挖掘和牵引,让我们的两位人物穿越时空,用这样独特的方式相互勾连起来,仿佛让读者看到了两位教育领域中的

优秀人物是如何在岁月中相互见证彼此成长的,让文章更加耐人寻味。读者循着前因去找后果,又可以是牵着后果寻找前因,这种追寻的过程让他们仿佛在杂志中穿越了时空,领悟到了“人物”真正的精神特质。

3. 从“普通”到“特色”,重新开发文章功能

为避免杂志的同质化倾向,也为了让文章更好地符合自身刊物的定位和要求,对于一些稿件,编辑可以在约稿和编辑的过程中,立足读者和作者的现实需求,重新定位和开发文章的功能,使文章通过二次加工和开发,发挥新的社会效应。

作为一本教育类的刊物,一线教师常常投来一些记录自己公开课的课例,这些课例尽管是教师个人在实践中的得意之作,但如果缺少解读和转化,读者很难进入“课境”,看出课例背后的“教育意义”。作为编辑,如果对这样的稿件简单拒绝,其实也是浪费了实践中教师的宝贵教学财富。于是,2014年,我们推出了“课例研究”栏目,重新定位“课例”,开发“课例”。我们认为,每位教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要上一些公开课、研究课、比赛课,在这些经过精心打磨和研究的课例中,教师常常会更深入地收获一些关于教学的思考和感悟。引导教者重新梳理这些案例,通过对一节课的全程描述或其中若干件教学事件的描述,使之形成一个范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与其他杂志简单呈现教学过程的课例不同的是,我们要求课例要蕴含鲜明的研究主题,反映耐人深思和寻味的教学问题,呈现出解决教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性实践。不要面面俱到,不必完美无缺,也不能是过程性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事实证明,经过这样重新定位和开发的课例跳出了“教学示范”的套路和光环,成为一个蕴含了问题和研究的情境,一个可以讨论和拓展的话题,一条可以引发思考和实践的线索。使课例成为深度挖掘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深化教学研究、促进个人成长的有效途径,也为更多的教学研究者课后相互评论,共同改进教学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经过重新开发和定位的课例研究类文章,不仅增加了这类文章本身的研究含量,也打破了常规,超越了其他刊物的同类文章,受到了读者和作者的一致好评。

三、策划创新意识

“编辑活动不是自我封闭的、静态的结构系

统,而是一个多维交叉的、不断生成的过程,正是这种交叉性和生成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向未来开放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创造性过程。编辑活动就是将编者的知识、创想、才情、趣味、追求、理想等贯注于具体的筹划、整理、采录、润饰、撰修、编排、审定等编辑作业中去的创造性过程。”^[2]所以,编辑活动绝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编辑主体对文本客体的单向度的操作加工。期刊编辑要经常地征集读者、作者对办刊的意见和建议,自觉地搜寻读者和作者所关心的热点信息,还要及时了解作者研究的最新课题和有关信息,善于发现作者有创造性的学术见解,并能根据自己刊物的特色引导作者撰稿的方向。优秀的编辑,要培养自身的预见性和时效性,不仅要及时跟踪热点,而且要善于进行舆论引导;不仅要学会做好事后勤策,而且要加强策划时效性,培养自己全方位、多维度、多领域社会观察能力,善于挖掘文章的多维价值,提高信息产品的附加值。

1. 变“难点”为“亮点”,以超越读者的期待去满足读者的需求

编辑不是专题策划的唯一主体,读者也不只是观点的接收器,“对于读者来说,一个好的专题的价值在于满足他们的需求,吸引他们的参与,引发他们的思考,拓宽他们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得到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迪”^[4]。这种期待和关注,让编辑要时刻注意策划时的“受众需求”,更多倾听来自作者和读者的声音,“在对大量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归类的基础上,进行筛选、重构、增值、创造性地整合信息资源,在杂志最重要的位置,形成一种宏大话语,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兴趣与内心共鸣”^[5]。

每年我们都希望能推出一些特色栏目,在特色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打造品牌。如2012年,我们推出了特色的栏目——“教育写作”,为一线教师搭建了一个专业学习写作的平台,推出这个栏目的初衷是我们了解到,尽管教师受过不少写作方面的训练,但真正的“教育写作方法”在任何学历学习和培训中几乎都是一个空白,一到写论文的时候,老师总感到使不上劲。论文该怎么选题?开题报告有什么要求?教育叙事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吗?……这些问题盘旋在老师的脑海中,却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答案。写论文成为不少老师头疼的事,但大多数时候,老师们仍然只有靠自学自

悟,慢慢摸索,慢慢前进。

其实,教育专业论文也有各种文体,教育案例、教育叙事、调研报告、课题报告……不同类型的教育论文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但每一类文章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据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开设“教育写作”这一栏目,每期推出相关文章,分门别类地给老师们讲讲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论文的写作方法以及教育写作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请有经验的作者谈谈他们的写作体会,试图用这种方式让老师们找到教育论文写作的门道,让这个栏目能成为老师们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又一个载体和平台。

几年运行下来,老师们对这个栏目的反响非常热烈,很多的学校将这个栏目中的相关文章推荐给老师学习,作为专业学习的重要学习材料,这个栏目满足了读者的需要,确实起到了科研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成为我们杂志的一大亮点。

2. 增强敏锐性,适时开展重大主题策划

被动的“来稿选编”工作模式,常常使期刊脱离现实,在时效性上难以契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基层的需要,编辑要增强自己的策划和创新意识,适时进行重大主题和宣传专题的策划,增强杂志的敏锐性和时代感。

2009年,江苏省启动了“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这项工程实施几年来,因其视野远大、实施扎实、成效显著,在全省、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多方人士的认可。为了更好地总结、宣传“江苏人民教育家工程”的经验,引领广大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2013年4月,我们策划并推出了“苏派教育家,在这片沃土上成长”专题,专题分为四部分:(1)厅长访谈。约请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进行访谈,主要讲述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产生的动因、运作思路、政策支持、制度建立、运作成效及未来规划。(2)工程综述。全景式回顾

近年来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运行的主要情况、开展的主要活动、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关键突破等。用通讯特写的形式来写,力求生动、鲜活、感性。(3)专家视角。约请指导专家讲述在指导过程中的做法及感受。(4)人物捕捉。选取4位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的优秀学员讲述参加工程后的感受、收获。专题推出后,在江苏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工程”的经验和做法得到了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展示了江苏教育强省的风貌和名师的风采,也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教育家培养工程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获得了业内人士及江苏省教育厅的肯定和好评,成为我们当年杂志的重大策划和优秀选题。

编辑的工作,从提高素质和意识开始,又以展示素质和意识告终。要办好一本杂志,编辑除了过硬的职业素养,还要加强这样几种关键意识的培养,才能不断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形势,使自己能够穿行在读者与编者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把杂志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 [1]宋崇魁.教育期刊编辑与教育信息[J].编辑学刊,1994(2).
- [2]张建,夏光富,李金正.论编辑活动的一般特点[J].编辑之友,2013(8).
- [2]叶圣陶.叶圣陶随笔·生活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微观编辑出版[J].中国编辑,2013(5).
- [4]李军领.现代期刊专题策划多元主体模式初探[J].编辑之友,2001(9).
- [5]吴新宇.期刊专题策划的五个要素[J].编辑之友,2006(1).

(责任编辑 晨 晓)

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2005—2014年CSSCI来源期刊的计量分析

沈秀¹ 赵青² 李娟³

(1. 常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江苏常州 213164;

2. 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常州 213022;

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重构出版理念和出版模式, 期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探索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之路, 是破解不利局面, 持续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以2005—2014年间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期刊数字化”论文为基础, 对时间分布、机构分布、作者分布、来源期刊分布、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等进行计量统计分析, 并从学术期刊数字化概念、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转型策略和数字化经营管理等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 学术期刊; 数字化; 研究; CSSCI; 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112-06

2005年,我国开始提出“数字出版产业”的概念,其后的十年正是我国期刊从传统产业形态向数字化产业形态发生变革和转型的十年^[1]。至今,几乎全部学术期刊都完成了数字化编排和数据库传播等初级形态的数字化转型过程,部分期刊在网络采编平台建设和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学者们也对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便显出极大的兴趣,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在中国知网上以“学术期刊”“数字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可以搜索到期刊论文15657篇,学位论文49篇,会议论文112篇(数据截止时间:2015年6月20日)。为了给后续研究者指明方向,也有不少学者围绕“期刊数字化”研究进行了梳理和综述,譬如:唐凯芹^[2]归纳总结出“前期的研究围绕数字期刊的生存展开,侧重期刊数字化概念和发展进程,关注期刊本身的出版流程”;李仲先^[3]从期刊数字化的概念、数字出版途径、期刊数字出版的问题与策略、数字出版等方面对

2006—2010年间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顾金亮^[4]从商业模式的概念演进、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内涵、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方面梳理并评价了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诚然,现有的综述性研究文献在一定阶段内厘清了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状况和热点,成为研究者把握研究热点的参考。但随着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现有的综述性成果已经不能全面概括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梳理2005—2014年国内CSSCI来源期刊关于“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文献,并对文献的时间分布、机构分布、作者分布、来源分布、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等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为业界和学界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数据来自CSSCI

^{*}[基金项目] 2015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5SJB471)。

[收稿日期] 2015-07-04

[作者简介] 沈秀,女,湖北黄冈人,常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赵青,女,山西怀仁人,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李娟,女,江苏常州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来源期刊。以学术“期刊”为关键词对 2005—2014 年间目标期刊进行检索,并以“数字化”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为了确保全面检索到与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以“杂志”“电子”“网络化”等关键词分别作替代检索,一共获取文献 217 篇(截止 2015 年 6 月 20 日),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清洗和数据挖掘提炼,剔除掉资讯报道、杂志声明以及会议通知等干扰性文献,过滤出非学术期刊主题的研究文献,最终获得与“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关联度较高的有效文献 155 篇。然后利用中国知网导出的 EXCEL 表格为基础,自建数据库,按照文献题名、期刊、年份、作者姓名及单位、基金项目、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等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研究。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研究概况

(一) 时间分布

筛选出的 155 篇 CSSCI 来源文献按年度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2009 年之前,有关的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呈缓慢上升趋势。这一时期,一些较早市场化的期刊逐步一改先前的回避态度进行大胆试水,学者们也开始尝试相关领域的研究,但研究仍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2009 年 8 月 13 日,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上海联席会议上提出“数字出版是新闻出版产业的战略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良好的政策导向激起了学界极大的研究热情。随后的两年里,文献研究数量均保持 3 倍的增势,到 2011 年达到顶峰。然而,在中国数字出版总收入从 2006 年至 2011 年的 5 年间增长了将近 6 倍的良好发展势头下,数字期刊收入占比始终不到 1%^[5],贡献微乎其微。现实的残酷让业界和学界都开始了理性的思考,2012 年文献研究数量在 2011 年的基础上斩腰下降,其后一直保持正常的波动,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趋于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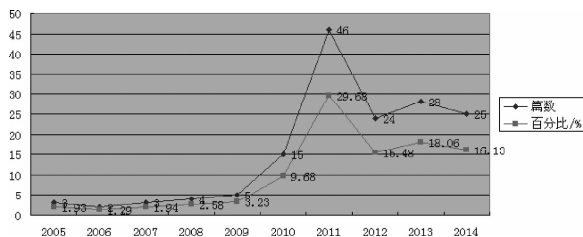


图 1 2005 - 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领域文献数量折线图

① 考虑到第一作者对研究贡献的重要程度,本文在了解机构和作者对“期刊数字化”研究做出的贡献时,均按照第一署名单位和第一作者进行统计。

(二) 研究机构和作者分布

本文筛选出的 155 篇文章由来自于 119 家研究机构的 146 位作者完成^①。对研究机构和作者进行归类(如图 2)发现,高校期刊编辑的文献贡献量最大,占文献总数的 18.4%,其次是高校其他科研工作人员,其他出版机构的编辑。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期刊主管机构的关注度最低。在对机构和作者发文量进一步统计(如表 1)发现,与其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集中度高和作者集中度高^[6-7]不同,学术期刊数字化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作者集中度相对很低。机构发文数量最多的不过 6 篇文献,发文超过 3 篇的研究机构仅为研究机构总数的 8%;作者发文数量最多的不过 3 篇,发文超过 2 篇的作者只有 8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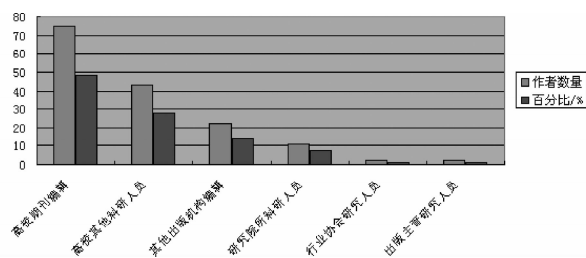


图 2 2005 - 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刊载“学术期刊数字化”论文的作者归类分布图

表 1 2005 - 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中“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文献的机构和学者贡献一览表

发文机构	发文量	发文机构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北京印刷学院	6(*1)	北京大学	2	余树华	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4(*1)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2(*2)	陈丹	2
重庆大学	4(*3)	内蒙古大学	2	程维红	2
华南理工大学	4(*4)	南京晓庄学院	2	胡政平	2
河南大学	3	攀枝花学院	2(*2)	任荣政	2
长安大学	3(*1)	上海理工大学	2(*2)	张建蓉	2
华中科技大学	3(*2)	中国期刊协会	2	张秀梅	2
四川大学	3(*2)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2(*2)	赵文义	2
湛江师范学院	3(*3)	中国政法大学	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	中华医学会	2(*2)		

注:考虑到统一单位(特别是高校)有学院教师和期刊编辑部编辑两种不同身份的研究者,故用“(*数字)”的方式特别注明期刊编辑部的发文数量。

(三) 来源期刊分布

本文筛选出的 155 篇文献分布在 16 种 CSSCI 期刊上(如图 3 所示)。文献的期刊分布十分集中。93.5% 的文献刊载于 8 种编辑出版类专业期刊上,只有 10 篇文献刊载于其他 8 种社会科学期刊上。具体而言,《编辑学报》和《科技与出版》刊载的文献数量最多,占到全部文献的 47%。尤其是科技类编辑出版专业期刊,较早也较多地关注“期刊数字化”这个从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主题;其次是《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和《中国出版》3 种综合性编辑出版专业期刊,其刊载的文献占到全部文献的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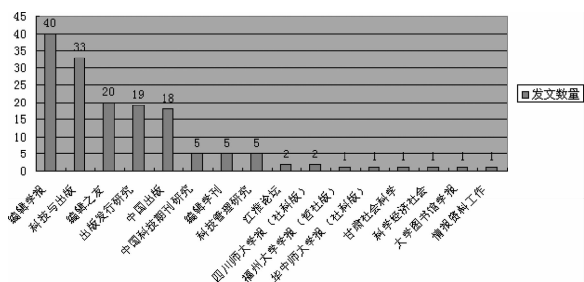


图 3 2005 - 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刊载“学术期刊数字化”文献的期刊分布图

(四) 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

1. 研究方法

对本文筛选出的 155 篇文献按照研究方法进行归类发现:规范性研究类 122 篇,文献研究类 3 篇,实证研究类 21 篇。进一步分析可知,在实证研究中,计量分析类文献只有 4 篇,调研研究类文献 17 篇(其中个案研究 14 篇)。十年来我国学者开展的有关“期刊数字化”的实证研究很少,仅占 12.9%,而且计量分析研究微乎其微,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虽然个案研究有助于积累资料和经验,但其也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导致错误的判断。在文献研究方面,虽然有学者围绕“数字期刊出版活动”“数字化出版理论”“数字版权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但都是对有关观点进行简单地综述,没有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这也突显出本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理论价值。

2. 研究层次

宏观层次研究主要从国家、社会和政府等视角出发,微观层次研究主要围绕具体某种期刊或者期刊社(编辑部)展开讨论,介于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之间的则是中观层次。目前,国内有关学

术期刊数字化研究聚焦在中观层次上,该层次的文献高达 140 篇,占比 90%,微观层次的研究文献只有 11 篇,宏观层次的研究文献只有 4 篇。

三、研究观点回顾

(一) 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概念

专门进行概念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研究多散见于研究文献的引言之中。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具有差异性,因此,其对概念的认定也具有多角度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杨桦^{[8](P.46)}(2007)从出版过程角度认为“期刊数字化是指传统期刊及其采、编、审、印、发和传播、应用过程,与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管理与知识挖掘技术)相结合”。李晶^[9](2010)认为期刊数字化是包括传播内容、表现方式等主体的数字化转变和数字版权、发行方式、支付平台及其服务模式等市场运作的数字产业化转变。黎娟^[10](2011)研究指出“数字化出版应是内容出版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用数字技术去深度表现传统出版的内容,依靠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出版业流程再造,从而形成一种以内容管理为核心的、全新的出版形态。”陈颖、陈玉霞^[11](2012)认为,期刊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传统期刊出版产业实行产业升级和业务创新,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升级。

(二)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现状

1. 总体上界定期刊数字化发展阶段

李晶^[9](2010)将中国期刊数字化发展分为 2005 年之前的单向发散型发展阶、2006 - 2009 年间的双向互动型发展阶段、2010 年之后的多维交互式发展阶段等三个阶段。王昕、方立国、骆瑾^[12](2009)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开放存取、RS 推送、预印本提前上网和单篇文献上网等多样化的内容服务,全程数字化的编辑过程基本实现,多媒体复合出版,全球信息融合,人性化的交互模式,个体和集约结合的网络传播渠道,互利共赢的经营模式正逐步形成。石峰^[13](2011)认为中国期刊数字化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产业形态初步形成,呈现出内容服务互动化、数字媒体移动化、赢利模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2. 具体分析研究某一类期刊的发展现状

丁岩、吴惠勤、龙秀芬等^[14](2011)指出,我国科技期刊虽然实现了网络化编辑,全球化交流信息,独立网站与集群网站共生发展,但整体发展仍

停留在将纸质期刊搬上网的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尚处于探索阶段。姚远^[15](2012)通过抽样调查发现,高校科技期刊加入网络数据库比例为97.3%,有40.45%的期刊拥有自己门户网站。郭飞、薛婧媛、胡志平等^[16](2013)研究发现,截止2012年6月,我国有7,920种加入中国知网,有7,397种加入万方数据库,综合普及率超过79.9%。刘锦宏、卢芸、徐丽芳^[17](2013)调研发现,64.5%的中文核心期刊建有独立网站。李静^[18](2013)调研发现,专业性小众学术期刊数字化参与意愿低,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魏太亮、周宇^[19](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图书馆学报学期刊在期刊网站(数字出版平台)、作者服务、数字出版渠道方面与用户期望存在较大差距,还停留在“管理过程数字化”环节。

(三)阻碍学术期刊数字化的转型问题

学者们主要站在出版行业的角度,分析学术期刊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亟待决绝的问题。譬如:刘茂林、饶邦华^[20](2008)认为版权问题、刊号问题、期刊参数问题、技术标准问题和数据安全问题等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吕靖^[21](2009)认为,盈利模式模糊,市场环境较差,人才缺口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瓶颈;刘碧云^[22](2010)认为,现行的期刊管理体制和优质出版资源欠缺是科技期刊数字化发展的隐忧;吴月红^[23](2011)认为数字出版标准不一致,缺少数字出版的科学评价机制,人才瓶颈难突破是数字期刊出版的劣势;闫东艳、齐婧^[24](2011)认为,期刊出版者的实力弱小无力适应数字化出版的技术要求,数字出版通道不畅导致期刊数字化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读者的阅读选择和对数字付费的规避也使数字发展束手束脚;徐兴华^[25](2012)认为学术性数字期刊的权威性是制约期刊数字化发展主要因素之一;于春生^[26](2012)构建经济学模型分析指出,网络出版运营商在市场博弈中占据了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压缩了内容供应商等其他环节的竞价空间,导致收益分配失衡,从而影响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协作发展;张维、邓强庭、冷怀明^[27](2013)指出,出版单位资源集聚度低整合力差,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不成熟,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主要挑战。也有些研究以某一类或者某一种期刊为例,剖析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譬如:李静^[18]

(2013)认为播能力不足,同构重合现象严重使专业小众性学术期刊不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步伐。总体不难看出知识产权、学术资源、人力资源、赢利模式、产业链、行业规范等等是普遍关注的问题。

(四)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策略

与数字出版产业强劲的增产势头相比,数字期刊的收入占比和增长势头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劣势^①,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更是不尽人意,这种状况不仅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纷纷为期刊数字化发展出谋献策,主要观点如下。

刘碧云^[22](2010)指出,丰富科技期刊出版内容资源,搭建垂直型数字出版网络营销平台,探索期刊集约化发展道路是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龙秀芬、吴惠勤、曾莉等^[28](2010)提出,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要转变期刊出版理念,重视数字出版队伍建设和期刊网络系统建设,加快国际技术标准数字化的建设,完善数字出版物和网络期刊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坚持内容和质量为王的原则。陈颖、陈玉霞^[11](2012)借鉴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提出期刊主办单位要转变思维方式,培养数字化人才,打造数字化流程,构建数字化传播平台,创新盈利模式等路径等具体数字化策略。汪新红、王国红、彭绍明^[29](2012)认为优先数字出版和独家出版是学术期刊数字化媒体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余树华^[30](2012)认为期刊数字化发展应该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相结合,要加大行政与市场的调节力度,通过建立数字期刊联盟、推行学术期刊托管机制、统一数字期刊编辑出版平台、实行学术期刊编辑业务集约化运作等改革措施,创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编辑出版体制。张维、邓强庭、冷怀明^[27](2013)提出,以集团化策略应对目前出版单位资源集聚度低、整合力差,以多元化经营应对目前盈利模式单一,以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对数字出版中利益分配和版权等问题。

(五)学术期刊数字化经营管理模式

理论研究方面,刘建昌^[31](2011)总结了目前国内期刊数字化经营的主要模式——网站,网上内容发布平台,手机模式和电子阅读器。余树华^[32](2012),国荣、靳光华、吕文红等^[33](2014)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学术期刊集约化数字发展平

① 历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显示,从2006-2014年年间,互联网期刊收入虽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但占比没有超过1%。

台(数字期刊联盟)模式,认为该平台可以实现期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发展的互利共赢。陈军梅^[34](2014)分析了目前网络广告、内容售卖、数字发行和移动业务等艰难赢利现状后指出,谋求传统期刊和数字期刊的双赢是解决盈利问题的关键。

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国外数字化经营管理经验介绍和国内数字化经营模式的探索方面。王旌、游苏宁、王云亭等^[35](2008)分享了其在独家邀标,合作创新,优势互补,深度开发等方面的经验,为期刊社探索数字化经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汪新红^[36](2012)从平台提供商的角度介绍了中国知网推进数字出版产业链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相继推出了个人/机构数字图书馆,数字出版物超市,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优先数字出版系统,期刊协同采编系统,并顺应云计算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完整的基于“云数图”的云出版模式。陈丹、董鑫、张玉洁^[37](2013)介绍了全球最大的专业信息提供商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的运营特点、赢利模式、营销战略以及其数字化发展中的两大战略方向——“搜索与发现”和“科研绩效的评估与规划”。陈丹、程小雨、齐媛媛^[38](2013)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科技出版机构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在作者付费,数字优先出版,个性化订制出版,内嵌式搜索引擎等方面的创新型做法。郑芹珠、黄文华、魏莎莎等^[39](2013)针对上海市科技期刊分散经营、力量薄弱的现状,探索一种类似“淘宝网”的“淘文网”经营模式,为各期刊单位自主建设“期刊店铺”,向机构或者个人用户售卖合法的“期刊内容”,获取合理的利益提供可能的运行模式。侯春彦、李富岭^[40](2014)介绍了《色谱》杂志在自有网站建设、发布HTML格式结构化全文数据、为所有论文注册和发布DOI号、使用电子邮件主动进行文献推送、应用二维码和建立参考文献链接等方面的经验,为科技类期刊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借鉴。李海兰、吴岩等^[41](2011),曾绚琦^[42](2013)分别分享了材料期刊网和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数字化集约化互利发展的成功经验,企图从实践上证明期刊的数字学术期刊联盟是解决当前期刊发展瓶颈良方。

四、述评与展望

最近十年,期刊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研究视觉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加深,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

步改进和完善。第一,在概念厘定方面,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多数讨论都是在预设结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厘定的概念有为其问题讨论服务之嫌,在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欠缺。而且,对“数字期刊”“电子期刊”“网络期刊”和“期刊数字化发展”“期刊数字化转型”等概念不加以区分,无法适应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媒体融合日益盛行背景下的“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研究发展。第二,在研究对象上,近40%的研究成果是以科技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再除去专门研究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综合性学术期刊和其他专门类别的学术期刊之外,以学术期刊这个大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占不到30%的比例,研究成果普适性不强,难以推广。诚然,科技学术期刊研究者由于其传播科技的便利,首先捕捉到有关“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无可非议,但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应跳出技术这个视角,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才能广开研究之路。第三,在研究主题方面,近70%的研究都集中在具体探讨某一类或者某一种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学界基本围绕数字版权保护缺乏,产业链不完整,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匮乏,技术标准不统一,业界对数字出版的认识等问题,结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排列与组合式研究。指出问题、分析危害停业留在粗浅的层面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不具备针对性。虽然也有学者对学术期刊数字化经营方面进行了探索,但多数都是停留在分享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层面上,鲜有借鉴其他行业的产业转型理论展开的研究。最后,缺乏高水平的综述性研究。一个研究主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是需要理性的反思和系统的梳理,而有关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综述型文献数量很少,而且仅有的少量文献基本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本身展开,围绕数字版权保护、产业链、资金技术人才、技术标准等具体问题的综述更是没有涉及,这种缺失不利于后续研究的开展。

[参考文献]

- [1]祝兴平. 期刊产业数字化传播十年特征解析——基于龙源期刊Top 100十年数据的分析[J]. 出版发行研究, 2015(4).
- [2]唐凯芹. 我国数字期刊出版活动的研究进展及未来动向[J]. 科技与出版, 2013(1).
- [3]李仲先. 2006—2010年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理论

- 研究综述[J]. 科技与出版, 2011(3).
- [4] 顾金亮. 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研究述评与展望[J]. 现代出版, 2014(3).
- [5]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课题组. 2011 - 2012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摘要 [EB/OL]. (2012 - 07 - 27) [2015 - 08 - 02]. http://www.chinaxweb.com/2012-07/26/content_247895.htm.
- [6] 陈奎庆, 毛伟. 大学生创业研究在中国: 回顾与展望——基于 2004—2013 年 CSSCI 期刊文献的分析[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 [7] 戴维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现状分析——基于 CNKI 和 CSSCI 统计[J]. 科学社会主义, 2014(3).
- [8] 杨桦. 中国期刊数字化发展状况分析 [A]. 第五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C], 2007.
- [9] 李晶. 我国期刊数字化发展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0.
- [10] 黎娟. 数字出版概念研究[J]. 新闻与传播, 2011(8).
- [11] 陈颖, 陈玉霞. 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路径[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 [12] 王昕, 方立国, 骆瑾. 当前期刊数字化发展的特征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11(10).
- [13] 石峰. 中国期刊数字化的现状和未来[J]. 编辑之友, 2011(2).
- [14] 丁岩, 吴惠勤, 龙秀芬, 等. 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转型初探[J]. 编辑学报, 2011(增 1).
- [15] 姚远, 汤晰, 赵军平, 等.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报告[EB/OL]. [2012 - 06 - 28] (2015 - 07 - 28). <http://www.chjjh.com/UploadFile/200726204318838.Pdf>.
- [16] 郭飞, 薛婧媛, 胡志平, 等. 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策略: 数据融合与信息共享[J]. 2013(1).
- [17] 刘锦宏, 卢芸, 徐丽芳. 我国核心期刊数字化现状分析——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 版)》的实证研究[J]. 科技与出版, 2013(6).
- [18] 李静. 数字出版环境下专业性小众学术期刊发展探究——以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为例[J]. 中国出版, 2013(15).
- [19] 魏太亮, 周宇.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数字出版评价研究[J]. 科技与出版, 2014(10).
- [20] 刘茂林, 饶邦华. 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J]. 科技与出版, 2008(3).
- [21] 吕靖.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瓶颈及出路[J]. 编辑之友, 2009(6).
- [22] 刘碧云. 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发展隐忧与出路[J]. 出版发行研究, 2010(8).
- [23] 吴月红.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 SWOT 分析[J]. 编辑学报, 2010(3).
- [24] 闫东艳, 齐婧. 我国数字学术期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科技与出版, 2011(3).
- [25] 徐兴华. 期刊数字化生存与转型研究[J]. 中国出版, 2012(24).
- [26] 于春生. 论数字期刊产业链价值创造与收益分配[J]. 中国出版, 2012(17).
- [27] 张维, 邓强庭, 冷怀明. 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及我国科技期刊的应对措施[J]. 编辑学报, 2013(2).
- [28] 龙秀芬, 吴惠勤, 曾莉, 等.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 科技管理研究, 2010(15).
- [29] 汪新红, 王国红, 彭绍明. 论科技学术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媒体化转型[J]. 编辑学报, 2012(5).
- [30] 余树华. 论期刊数字化与学术期刊体制创新[J]. 出版发行研究, 2012(10).
- [31] 刘建昌. 刊数字化赢利模式探析[J]. 中国出版, 2011(13).
- [32] 余树华. 基于期刊体制改革的数字期刊联盟问题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2).
- [33] 国荣, 靳光华, 吕文红, 等. 中国科技学术期刊集群数字平台的发展基础及可行模式[J]. 编辑之友, 2014(11).
- [34] 陈军梅. 探寻期刊数字化盈利之路[J]. 中国出版, 2014(11).
- [35] 王旌, 游苏宁, 王云亭, 等. 强强联合: 探索百年期刊数字化发展道路[J]. 编辑学报, 2008(5).
- [36] 汪新红. “云出版”是期刊社自主数字出版的全新模式[J]. 中国出版, 2012(2).
- [37] 陈丹, 董鑫, 张玉洁. 爱思唯尔期刊运营模式及数字出版研究[J]. 科技与出版, 2012(2).
- [38] 陈丹, 程小雨, 齐媛媛. 施普林格期刊运营模式及数字出版策略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13(2).
- [39] 郑芹珠, 黄文华, 魏莎莎, 等. “淘文网”: 新型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模式探讨[J]. 编辑学报, 2013(3).
- [40] 侯春彦, 李富岭. 科技期刊全方位数字化的成功探索[J]. 出版发行研究, 2014(4).
- [41] 毕淑娟, 李海兰, 吴岩, 等. 集群化材料类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材料期刊网[J]. 编辑学报, 2011(4).
- [42] 曾绚琦. 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及体制创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启示[J]. 科技与出版, 2013(1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四维度分析

章 诚

(南京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 江苏南京 211800)

[摘要] 高校学报作为高等院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专业报刊的论述是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重要理论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做出的有关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新闻出版的重要意见、决定为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提供了政策回应;展示最新理论研究成果、解读社会热点问题是高校学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重要表现形式;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精心策划选题,创新传播形式、抢占新型媒体阵地是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 高校学报; 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理论依据; 政策回应; 表现形式; 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10-0118-03

高校学报作为高等院校主办的学术期刊,既承载着展示学术成果、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责任,也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要社会功能。因此,高校学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关于高校学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界已开展了一些研究,如李自茂等认为,高校学报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其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敢于和善于引导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1];沈秀认为,应该在坚持学术性和质量第一的原则下,努力发挥高校学报的各项教育功能,让高校学报在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上述研究已经揭示了高校学报的思想教育功能,但是对高校学报为何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没有进行系统阐述。基于此,本文尝试对高校学报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理论依据、政策回应、表现形式以及建设路径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理论依据

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报纸和刊物给予了准确定位。恩格斯在回应资产阶

级政论家卡尔·海因岑的文章中指出,“党的报刊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有多少,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该联合哪些党派”。^{[3](P.199)}列宁最早提出了党的报刊原则问题,在其《论无产阶级政党》中指出,“党的报刊无条件服从党”^{[4](P.329)}。“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或者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5](PP.152-153)}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党的刊物发表过重要论述,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

[收稿日期] 2015-07-28

[作者简介] 章 诚,男,安徽青阳人,南京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编辑。

务”。^{[6](P.255)}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要把握好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宣传方向,把这些阵地牢牢掌握在我们党手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7](P.56)}胡锦涛同志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8]习近平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9](P.105)}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党的报纸和刊物的论述可以发现,党的刊物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党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载体,是把握舆论导向、引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抓手,这些论述为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二、高校学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政策回应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党和国家就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新闻出版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1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关于在出版行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培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出版采编人员,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认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要求,是打牢思想根基、增强把关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抵御错误观点侵蚀、解决当前出版导向问题的重要

举措。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主要内容,坚持出版工作的根本原则——党性原则。2014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根据《意见》制定了《关于在全省新闻出版行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培训的实施意见》,要求引导全省出版工作者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贯彻到选题论证、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制作复制等实际工作中去,把党对出版工作的要求贯穿到主题出版、典型宣传、思想引导、文化传承之中。

上述意见和决定或对整个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指导思想,或对出版行业的出版导向提出了具体要求,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具体要求,都要求出版行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为指导,这为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阵地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回应。

三、高校学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表现形式

1. 展示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想。在新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中国化理论仍然对当前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对于我们研究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对于我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0]。基于此,高校学报应坚持刊发有关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发挥其理论宣传、理论引导、理论教育等功能,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同这些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当中。目前,不少高校学报已开设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专栏,刊发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成果,还有的高校学报组织了相关专题文章,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 解读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互联网安全等问题爆发出来,这些问题由于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与社会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而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重视,成为

社会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学界会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基于此,高校学报应通过刊发观点客观、视角公正、论述清晰、对策合理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解读这些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社会成员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有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疏导社会成员因信息不足而带来盲目的愤怒、恐慌等情绪,维护社会稳定;教育社会成员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通过解读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一方面,高校学报可以充分发挥引导、疏导、教育功能;另一方面,高校学报可以借助这些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实现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提高,从而提升自己的办刊水平。目前,一些高校学报已经就上述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

四、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路径

面对社会发展和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常态,高校学报应该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

首先,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校学报在办刊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在日常工作中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不放松,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新闻出版的方针、路线、政策,所刊发的文章要能展示宣传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要能引导社会成员正确的价值取向,要能疏导社会成员的不利情绪,要能教育社会成员形成凝聚力、向心力。

其次,精心策划选题,多种形式展现。高校学报在办刊过程中,要精心策划专题,有学科支撑、宣传部门资助的高校学报要进一步加大展示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力度,且以系统化、规模化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没有学科支撑、宣传部门资助的高校学报也应该不定期策划专题,这些专题既可以是展示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也可以是解读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多种展现形式来使得高校学报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作用得以发挥。

再次,创新传播形式,抢占新型媒体阵地。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体飞速发展。根据腾讯网发布的2015年业绩报告显示,在2015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数达到5.49亿^①;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截至2014年第四季度末,微博月活跃数到达1.76亿^②。新型媒体使得信息的传递变得空前快捷。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报应该适应新型媒体的发展态势,主动与新型媒体实现“无缝对接”,通过建立门户网站、微博推送平台、微信出版等数字化形式将自己的出版物推送到新型媒体,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出版物的传播范围,更好的发挥理论宣传、理论引导、理论教育等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抵御新型媒体上一些错误的言论、捏造的言论对社会成员思想的冲击,从而帮助社会成员提高认识、端正看法。

[参考文献]

- [1]李自茂,王会珍.论高校学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2).
- [2]沈秀.高校学报的教育功能探析[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5(2).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列宁.列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吴绮敏,孙承斌.唱响奋进凯歌 弘扬民族精神——记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N].人民日报,2008-06-21(01).
- [9]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 [10]李捷.论马克思主义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责任编辑 晨 晓)

① 2015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http://www.ithome.com/html/it/152417.htm>.

② 周文琦.微博年用户增长量创新高.[EB/OL].[2015-09-08].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5-03/11/c_1114605664.htm.

2015 年总目录

(作者姓名后的数码是刊期和起始页码)

【政治学研究】

- 邓小平政治改革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汪春劼 魏 忠(1.1)
- 论“双百”方针的历史建构与转变之原因 孟令蓉(1.5)
- 社会转型视域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研究
司 甜(1.11)

【哲学与宗教研究】

- 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构造 沈振东(1.15)
- 从新教三大教派看宗教改革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意义
桑 田(1.22)
- 韩非和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 刘 赢(1.26)
- 唯一神教对盖斯凯尔夫人的影响 吴庆宏(7.60)
- 试析奥古斯丁人学思想中的二重性 刘 林(7.64)
- 近三十年来宋濂与佛教研究述评 贾素慧(7.69)
- 追求尊儒与宗道的协调
——缪播《论语》注的学术影响 蒋鸿青(10.69)

【历史与文化研究】

-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持海外侨校的举措试析
——以侨务委员会为核心 关 冰 陈国威(1.29)
- 浅析汉代服饰中的紫色应用
——以考古学为视角 郭羨雅(1.35)
- 梁启超新民史观及其对历史学科公民教育的启示
崔恒秀 韦 茜(10.41)
- 1927 - 1937 年东吴大学教师薪俸状况初探
吴 琼(10.17)
- 南京大屠杀前后《东京朝日新闻》的宣传策略探析
赵佳鹏 刘继忠(10.49)

【社会管理研究】

- 经济欠发达地区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研究
——以驻马店市为例 叶亚杰(1.39)
- 人的安全研究:渊源、概念与特征 邢瑞利(1.44)
- 服务提升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完善研究 杨 军(1.50)

【民主与法制研究】

- 陈云对民主执政问题的探索 鞠 健(4.1)
- 中国人大民主文化的理念定位与形成途径 潘国红(4.5)
- 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因素分析
——以苏北 G 县为例 封 顺(4.11)
- 我国民间救助法律规制存在的缺失与完善
王 琦(4.17)
- 我国非讼立法的现状及重构 刘执昂(7.74)
-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略论 周斐奇(7.79)
- 略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孔令仙(7.83)
-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研究 李 鲤(7.87)

【国际关系与经济研究】

- 当代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影响与对策
王 翼(4.22)
- 纺织服装皮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基于 DEA - Malmquist 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张艳艳(4.27)
- 汉代汝南郡的农业经济发展新探 方婷婷(4.32)
- “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济事业
池子华 徐 璐(4.36)
- 1946 年的上海霍乱及政府与社会的应对 张迪诺(4.46)
- 北洋政府时期苏常镇守使略论 郝 芹(4.51)
- 试释北邙元魏墓志中的辟除制度 刘 军(4.55)
- 丘浚《江右民迁荆湖议》年代考 唐柳琴(4.60)
-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成立时间考辨 苏芝军(4.64)
- 刊物从作者个人性知识生产到集体性知识生产
——1978—2007 年《世界历史》作者分析
舒小昀 袁勤俭(4.67)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初探 赖 风(7.92)
- 1992 年美国对台出售 150 架 F - 16 A/B 战斗机的决策过程分析 周凤伟(7.97)
- 基于供应链视域下的生产运营计划制订和管控研究
董 鹏 刘立军 汪雁飞 余呈先(7.101)

卢作孚与北碚的交通运输建设

韩健洛 李一翔(7.110)

国际性城市与国际组织总部的双向选择动因

王锐兰 茅磊江 王 恬(10.28)

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制度探析

——基于法制保障视角 赵 艳(10.33)

建国初期“斯大林模式”下我国工业化战略问题的思考

时 攀(10.37)

【本刊特稿】

论全球化中的焦虑及其解除之道

——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张康之(10.1)

【核心价值观研究】

论“和谐”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李安林(10.9)

“四个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引领

张琴芬(10.1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王静波(10.18)

关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李东晓(10.2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镜花缘》的文昌、魁星信仰与科举人格 王学钧(1.56)

论明清小说中的民间制度文化语汇 韩希明(1.62)

《西游记》情爱世界与游戏世界的同构 丰 竞(1.67)

文学史家视野下的江苏明清小说创作

——兼论中国文学史编写范式及其走势

冯保善(7.1)

《红楼梦》作者研究平议

沈新林(7.9)

《红楼梦》多元创新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刘欢萍(7.16)

【古代文学研究】

后人对元稹诗文的误断

吴伟斌(4.75)

论汉赋对《山海经》的接受

顾晔峰(4.81)

高唐神女传说和宋玉作品辨伪

黄震云(7.20)

论谭献的诗学思想

——以《谭献日记》为中心

朱泽宝(7.26)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百年史述

蒋成德(1.71)

关于文论研究存在问题的思考

江守义(7.30)

避谤仍兼雉尾藏,药方只贩古时丹

——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心路历程再审视

龚郑勇(7.34)

城乡忧思与阉割美学

——贾平凹小说《废都》与《秦腔》比较

曾海津(7.40)

【外国文学研究】

访谈:跨学科研究与专业建设

托马斯·德皮耶罗 周 韵(1.83)

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福克纳短篇小说 薛瑞东(1.86)

哈金小说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许 钺(1.91)

“道”载万物

——论库切的动物观 洪 芸 姜礼福(1.98)

向死而爱

——论《灿烂的星》中死亡与永生的对立统一

方娇艳(1.104)

论法国“新小说”对余华和马原创作文本的影响

姚公涛(4.85)

偶在世界的向善之旅

——从《黑王子》中看艾丽丝·默多克的人文关怀

刘晓莹(4.89)

重拾信仰:《天使之门》主题探析 孙 妍(4.95)

《黑猫》与《白猫》中“妻子”形象的对比分析

景佳惠 唐承贤(4.99)

论《纯真年代》中的空间压迫与主体性建构

王菲菲 石云龙(7.45)

语域理论视角下的《早秋》和格式塔质 周 玲(7.49)

双重边缘化的他者

——《继承失落的人》之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张培芳(7.52)

《四季随笔》的生态主义初探 李 倩 刘须明(7.56)

英雄心灵的成长

——《年轻小伙布朗》与《阿拉比》比较研究

叶 青(10.73)

《郊区佛谷》主题意义的认知诗学视角解读

陈 俊(10.78)

李翊云小说中异化与归化的语言策略 李 冰(10.81)

19 世纪与 20 世纪女性书写中女性欲望与女性多重身份构建对比

——以《呼啸山庄》与《BJ 单身日记》为例

黄 思(10.87)

城市中的荒岛求生

——《摩尔·弗兰德斯》的荒岛小说特征分析

胡汶涛(10.91)

【文艺评论】

论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的系统功能作用 张利群(10.54)

重识、重建与重塑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危机、抉择与担当

许 诺(10.59)

于深渊看见天上:鲁敏小说中的“暗疾”叙事

陈舒劼(10.63)

【美术研究】

早期现实主义油画本土化进程及当代性演变

朱 平(1.108)

“以中为本”“以今为魂”

——论关山月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的发展观

张曼华(1.113)

霍利·霍比的迷人世界

——图画书《嘟嘟和巴豆》艺术性简析

贾如丽(1.117)

绿色绘画

——再论玄色体系绘画

熊 炜(10.95)

元代宫廷绘画活动的发展分期

刘 凯(10.98)

复述与创新

——明清绘画品评中的崇古标准及价值

高 阳(10.104)

【音乐研究】

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探微

薛 雷(4.112)

《图画展览会》不同演奏版本对比分析

——以霍洛维茨与基辛的演奏版本为例

俞 寅(4.117)

论《长短的组合》中的节奏特点与演奏 张 璟(4.121)

【英语研究】

语境分析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

祝东江(4.103)

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的调查与规范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张 芳(4.106)

量词与名词相互选择制约的语义关系及其对英语量词翻

译教学的启示

徐 蕴(7.115)

试论英语歧义现象

张小雪(7.119)

【编辑学研究】

浅谈教育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几种关键意识

——以《江苏教育研究》(实践版)为例

颜 莹(10.108)

学术期刊数字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 2005—2014 年 CSSCI 来源期刊的计量分析

沈 秀 赵 青 李 娟(10.112)

高校学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四维度分析

章 诚(10.105)

The Problem of Anxiety and Solutions in Globalization —Comment on *Society Under Siege* by Zygmunt Bauman

ZHANG Kang - 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n the existent lifestyle and behavior pattern makes people fall into the deep anxiety. The reforms in the worldwide since the 1980s has aimed to eliminate anxiet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 of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ey not only fail to create a way for leading a happy life, but also deepen people's anxiety. In fact,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when people enter the real world without the family protection, they feel increasingly anxious, for the separation of society from families enables people to solve the anxiety from the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ir family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decline of families indicates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place for curing people's social anxiety. Nowaday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nxiety does not mean seeking a way ou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centered community and families; instead, it can be realized in people's cooperative actions. Actually, anxiety will no longer come into being as long as the difference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liquidity condition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post-industrialization; culture; anxiety; cooperative actions

Approaches to Implement the Values of “Harmony”

LI An - lin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must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practice and expand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values of “harmony”, the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serves as a way for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ubject forms an internal path; practice acquisition functions as an external path; system arrangement play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cultural fusion provides the environment support. The above five approaches, relating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 constitute a path system to implement the values of “harmony”.

Key words: Harmony; values; practice approach

Systematic Functions of Assessment System in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Li - qun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as an assessment system to evaluate the writing work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endowed with the apprais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Derived from the values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his value and assessment system is based on and dominated by the core values, which is not only the driving force consisting of creation and critic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a self-discipline mechanism for self-adjustment, self-restor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in literary criticism. All these highlight the systematic funct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overall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assessment system; systematic functions; value source

To See the Sky from the Abyss: On the Narrative of “Unmentionable Disease” in the Novels by Lu Min

CHEN Shu - jie

(*Literature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of “unmentionable disease” in the novels by Lu Min covers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y, emotion and behavior, which highlights that “unmentionable disease” is uncontrollable and obstinate and has already been a part of daily life. The disease outlines the individual's internal loneliness and interpersonal barriers, with the great ability to shape individual's spiritual world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ress value identification in Lu's novel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complicated symptoms of the unmentionable disease, Lu conveys the expectation towards happiness and the criticism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situation.

Key words: Lu Min; “unmentionable disease”; narrative

Ecological Painting —On Black Color Painting System

XIONG Wei

(*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1106, China*)

Abstract: The ink wash painting (Chinese brush painting) and light color ink painting in the black color painting system have already completely liberated themselves from copying the color of the material objects, and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on the theme, content, style and form of the paintings via the plain, steady, elegant and simple black color. And this sort of painting is regarded as an ecological painting, unpolluted and relatively clean. Creating or appreciating these works not only helps improve people's self-cultivation, but also has some benefits to their physical health.

Key words: Black color painting system; ecological painting; ink wash painting; light color ink painting